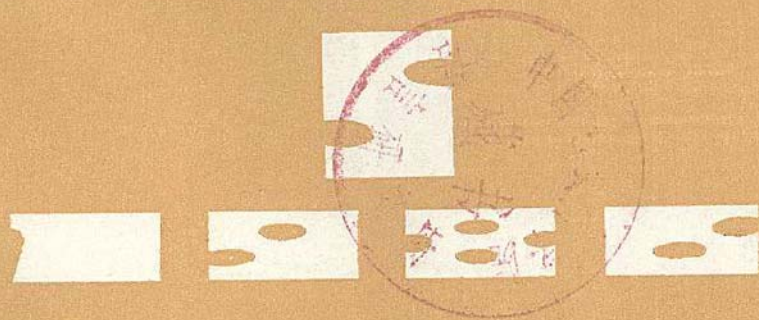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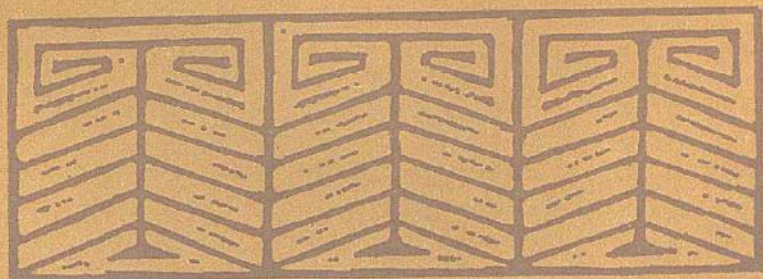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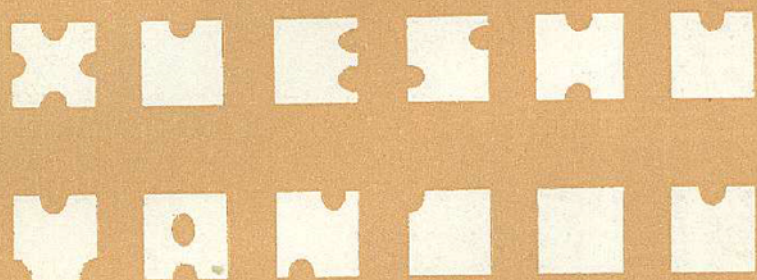


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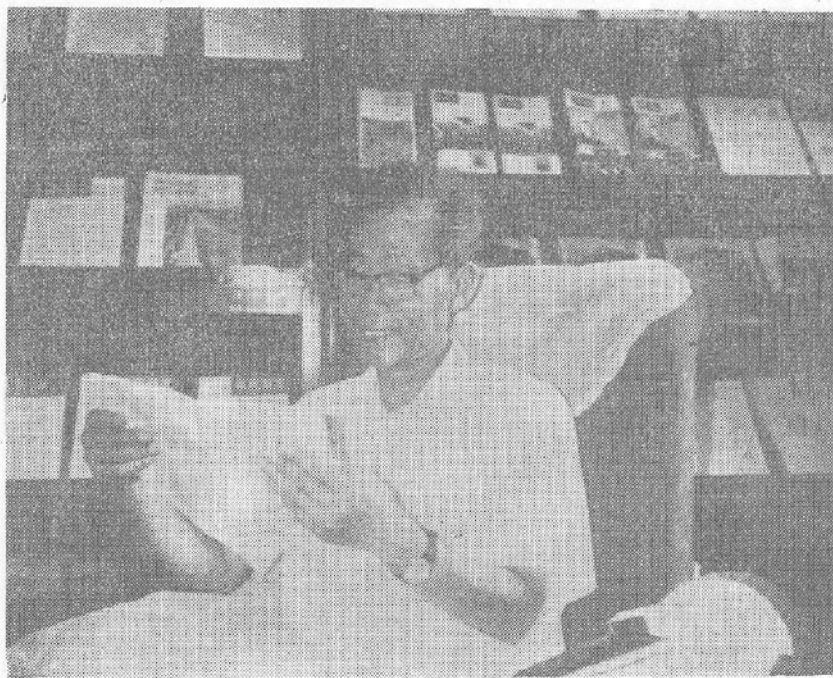
术

研

究



刘嵘，哲学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蔡馥生，经济学家，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目 录

孙 中 山 研 究	5	论“三大政策”的时代性	王 杰
	14	孙中山与传统儒学	马克锋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18	政治文明初探	范贤超 周建平
	23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	李长域
	28	珠江三角洲文化新发展阶段和我们的选择	张锡洪 梁桂全 黄濯缨 康 钟
广东经济 发展战略	35	广东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战略决策	曾志云
经济特区 研 究	41	特区经济发展方向和商品流通	何佳声
经 济	47	论全民所有制改革	杨昌俊
	51	再生产的一个类型——缩小再生产	李永乐
社会主义 辩 证 法	54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	李江涛
	59	全国第三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讨论 会论点综述	
哲 学	62	再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哲学 基本问题的概括	张江明
	67	道家哲学的把握方式	冯达文
华 侨 史	71	近代加拿大华侨述略	沈 毅
史 学	77	洪秀全政治思想平议	陈华新
	82	从商品经济的发展看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	郭 媛

广东文坛	88	我的文学批评观 ——广东青年文学批评家十人谈	
	92	关于岭南文化艺术的历史观察与美学 思考(研究提纲)	许翼心
文 学	98	詹安泰词论追记	邱世友
	105	粤词概述	陈永正
美 学	110	论“多向型”审美意识	蔡 列
来 稿 摘 编	114	董仲舒未持“天变,道亦变”的观点	周乾霖
	115	《金生色》——理学观念的图解	阎勤民
新书评介	116	《科学社会主义》一书的特点和不足	林锦峰
广东专家 动 态	118	在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刘嵘教授访问记	
	120	蔡馥生教授谈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	
书 海 酌 蠡	104	《采薇》并非“以哀景写乐”	吴观澜
	58	《论语》“畏”字正解	唐钰明
	109	刘兰芝自请遣归说辨伪	陈一平
	84	《曹植集校注》志疑一则	熊清元
	27	关于陆游妻唐琬再嫁的丈夫赵士程	官桂铨
学术会议	122	广东社会科学界讨论精神文明建设规划问题	
论点综述	128	青年学者孙中山学术讨论会论点简介	
封面设计		王造星

CONTENTS

On the Epochal Character of the "Three Great Policies".....	Wang Jie (5)
Dr. Sun Yat-sen and the Traditional Doctrine of Confucianism	Ma Kefeng (14)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Political Civilization"	Fan Xianchao and Zhou Jianping (18)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hina.....	Li Changyu (28)
The Period of New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Choice We Should Make	Zhang Xihong, Liang Guiquan, Huang Zhuoying And Kang Zhong (28)
The Challenge Confron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Problem of Our Strategic Decision	Zeng Zhiyun (35)
The Orientation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He Jiasheng (41)
On the Reform of the Ownership by the Whole People.....	Yang Changjun (47)
A Type of Reproduction——"Reduced Reproduction"	Li Yongle (51)
A Tentative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ist Society.....	Li Jiangtao (54)
More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From Matter to Consciousness and From Consciousness to Matter is the Summing-up of the Basic Problem of Philosophy".....	Zhang Jiangming (62)
On the Mode of Grasping as Practised in Taoist Philosophy	Feng Dawen (67)

A Brief Accoun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Canada in Modern Times	Shen Yi (71)
Prosaic Views on Hong Xiuquan's Political Thinking --- (Hong Xiuquan was the chief leader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1851-1864)	Chen Huaxin (77)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as Viewed from the Ang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Guo Yuan (82)
My Views of Literary Criticism --- A synopsis of the views put forward by ten young literary critics in Guangdong	(88)
Concerning a Historical Survey of, and Aesthetic Thinking on, "the Culture and Art of Ling Nan" (a Research Outline)	Xu Yixin (92)
A Follow-up Comment on Zhan Antai's Essay in " <u>Ci</u> Poetics"	Qiu Shiyou (98)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Creation of <u>Ci</u> Poems in Guangdong	Chen Yongzheng (105)
On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the "Multi-Orientation Type"	Cai Le (110)
Apply and Develop Marxist Philosophy in Actual Struggles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u Rong.....	(118)
Professor Cai Fusheng's Opinions on Product Economy and Commodity Economy	(120)

论“三大政策”的时代性

王 杰

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曾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替我们想出来的”，“是共产党代我们定的，也是共产党在替我们宣传”。^①由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决议案、会议记录以及孙中山在一大前后的讲演确实没有提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文字，因此，也有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事实上，三大政策名符其实。它是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革命需要；它加速了国民革命的节奏。

时代催生的革命成果

孕育三大政策的年代（1918—1928年），是一个风云际会，催人奋进的时期。这个时期以其所显出的特点，给正在探索出路的孙中山及其战友以许多启示和鞭策：

第一，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帝革命的轴心，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开始搭架一道桥梁，建立起新的反帝革命战线。为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进一步联合，列宁根据世界革命的特点，指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②他关心和期望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1922年1月，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国民党及共产党等各革命团体参加莫斯科远东民族会议。列宁扶病接见中国代表，询问国共两党能否合作。这次会议的《决议》，特别批评了中国、朝鲜的资产阶级把美国当作亚洲“解放者”的错误观点，强调“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只有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从而展示了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前途和发展道路。共产国际的帮助，特别是远东民族会议的召开，对于推动国民党接受列宁关于在中国建立民主革命的暂时联盟的理论，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中国年轻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影响，使一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试图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结合，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就领导了1922—1928年的全国性第一次工人罢工高潮及农民运动，显示出它蓬勃的生机和具有领导民主革命的潜在力量。正是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工农运动兴起这三大事件的合成力，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拉开。从此，历史宣告了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中国革命将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援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了国共合作的形式及原则，“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此前后，共产党人李大钊、林祖涵等在上海与孙中山研究“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次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申明“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③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所表示的敬意以及热诚的帮助，对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总结经验，焕发精神，跟上潮流继续革命，具有关键的意义。

第三，民族的凝聚力正在增强。辛亥革命“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清尤甚”。^④中国社会各进步阶级无时不在痛苦的挣扎中思索着中国的出路：

民族资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便遭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和排斥，加上民国后军阀混战的破坏，从未过上“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的日子。它为了改变受压抑受控制地位，以图兴旺和发展，要求联合起来与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其参加五四时期的排日运动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靠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便是这种要求的表现。

小资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在洋货压制和民族资本的排挤下，时刻遭受破产和失业的威胁，具有摆脱各种压榨，希望自由发展的迫切要求，“这个大量的群众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⑤

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致使他们长期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军阀的暴征，生活于极端穷困的境况之中。农民要求得到土地，这正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从速组合农夫劳动者的团体呵！我们从速联合起来，争回衣的、食的、住的、用的支配权……”^⑥即是他们强烈的呼声。1922年元旦，广东海丰成立县总农会，会员达十万人。凡此可窥见农民革命动向之一斑。

工人阶级是新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具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随着共产党的诞生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开始显示了他们的伟大力量。

根据中国各阶级趋于联合的动向，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C·P·C”的决议案》中明确表示：“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

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并阐述了本阶级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政治态度，一方面邀请国民党等组织互商联合办法，一方面积极在各城市集合工会、农会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会、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对民国以来的政治局势进行反思，进而考虑挽救中国，成了孙中山所代表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全国各爱国阶级的共同愿望，由此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日渐增强。尤其是1921年底“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的华盛顿会议以后，各爱国阶级民主联合阵线的形成，已成为一种新的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对于触发国民党尊重民意，因势利导，解脱其孤军苦战的困境，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启迪。

如果说上述三点，为三大政策的产生提供外因条件；那么，下述之第四点，则是促成三大政策产生之内因，这就是——时代前进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改变了，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尚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正处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中的孙中山和国民党，仍不失为民主革命队伍中的重要一员：孙中山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民主革命旗手；国民党虽分子复杂，但还是一个比较革命的政党。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来说，严酷的现实是，过渡时期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旧民主革命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务须深刻总结，以免重蹈覆辙；二是要以辛亥革命的热情，继续解决辛亥革命留下来的包袱，为完成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重新奋斗。

孙中山不愧是一位急流勇进的革命家。他对待苏俄、共产党以及工农运动所采取的正确态度，是他顺乎潮流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经过深刻的反思，逐步看清了潮流的方向和国情的要求，认识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关键时刻迈出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一步。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和政策的确立，是孙中山及其政党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摆脱自身危机的明智的重大的抉择，是国民党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于历史剧变中积极寻找出路的成果，也是孙中山革命学说实现飞跃的标志。孙中山在世界和中国处于大动荡、各阶级大分化的时期，即在苏俄政权初建、中国共产党初创、工农运动初起，“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的鱼龙混杂、良莠并茂的时期，便选定苏俄、共产党及农工阶级与之联盟，这种真知卓识，达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识水平的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政策从酝酿到确立，历时几年；而从它确立到被人们广为认识，誉为法宝，予以正名，也历经近三载。

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的演说几乎言必称苏俄与农工，并对共产党人表示敬意，他的战友如廖仲恺也曾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但这些言谈还未对三大政策的概念作出完整的概括。1925年12月，《中国国民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开始提及“与世界革命先进之苏俄联合战线”，“必须结合农工民众之势力”，“容纳中国共产党党

员”三大内容。⑦ 邓中夏在欢迎“二大”代表的演说中，把“一大”政策归纳为三方面：“对外之联俄政策，对内之工农政策、和共产党合作政策。”⑧ 这就勾画出了“三大政策”概念的雏型。至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特别会议，在《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中首次明确地完整地使用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概念，号召“继续孙中山、廖仲恺三大革命政策”。仅隔一旬，即同月25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沿用了“关于国民党三大政策”（即“联俄政策”、“联共政策”、“农工政策”）的提法，三大政策至此名符其实。

打上“过渡”烙印的革命方略

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产生的三大政策，具有鲜明的过渡性。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三大政策，从它赖以确立的思想基础，到制订和执行它的领导机构及其奋斗目标和昭示的前景，基本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图，大体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内容和形式的要求，无愧为这一过渡时期国共合作的积极的革命措施。

首先，三大政策的思想基础——反帝反封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致吻合。

对于孙中山和国民党来说，揭举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非易事。他们以往不是不反帝，只是不直接提出反帝口号，甚至幻想列强支持中国革命。结果，革命屡遭列强直接或间接的破坏，尝够了“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的滋味，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1924年初，孙中山发表了迄今发现的第一篇反帝宣言《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不但为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亦不但为压制亚洲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且亦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因此，全世界各弱小民族应当“起！起！速起！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⑩ 十几天后，孙中山在阐释“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的主张时再次指出：“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⑪ 把世界人民共同反帝的斗争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强调：“本党此次改组，如果还不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提出来，中国革命至少还要迟二十年才能成功。”⑫ 同年秋，孙中山在率军北伐时宣告：“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年底，孙中山在北上以后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等等激动人心的宣传和斗争，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旨在反对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的反封建纲领——平均地权，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明确提出，但它所提倡的核定地价、增价归公的做法，却不可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无法造成农村的根本变动。“一大”后，孙中山对平均地权作了新的阐发：“农民问题真是

要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的最终结果”。^②表明了此时的孙中山已把耕者有其田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与辛亥前平均地权思想相较，显然赋予了新的内容。这无疑符合农民群众的意愿，激发了他们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的巨大热情。

作为三大政策的思想基础——反帝反封建纲领的提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这是国民党认清国情、积极进行深刻反省的思想成果，与过去没有和反帝反封建相结合的倒袁、护法等斗争作比较，其指导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它反映了全国各阶级广大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迫切要求，有助于扩大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二）它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要求，成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三）它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和努力方向，便于各阶级分清敌我，在共同的大目标下团结奋斗，从而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

其次，制订和执行三大政策的领导机构——在国民党决策机关内部吸收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领导力量，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共掌权力，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旧民主向新民主革命过渡时期的特殊体现。

这种党内合作共掌领导权力的特殊方式的形成，取决于当时特殊的背景。在国民党的历史中，它曾以同盟会为主体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实进会和国民公党，组织“民国之一最大政党”，以图成立“政党内阁”。其结果是“分子的复杂，达到了极点；组织的紊乱，也达到了极点”，使党员“热心消灭”，革命失去了再起的希望。经过艰难的探索，孙中山认为马林关于“要进行中国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个政党要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建议，是“继续并完成一九一一年所开始的革命”的关键。竭诚希望共产党人帮助他组织一个“好的政党”。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寻找革命盟友，在“几经研究，再四审慎”后，认为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而它“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应伸出热诚之手扶助它，振兴它，从而挽救中国。国共双方的共同愿望促成了它们之间的合作，也促成了在国民党内共产党人参与掌权的特殊领导形式的形成。

在这个特殊的领导形式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特殊体现的标志是：一、共产党在思想上的指导作用。由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主张，便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公开提出，并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所接受，进而将这些主张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二、共产党人对工农运动的组织领导作用。怀着“为有所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而来”的共产党人，从李大钊南下参加国民党改组开始，到瞿秋白参与草拟国民党史上的划时代文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周恩来分任组织部长、农民部长、代理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到共产党人担任各部日常实际秘书（领导）工作等等的实际贡献和影响，远远超越了入党人数的比例。正是由于有这批共产党员，尤如新血流入国民党肌体，增强了国民党的朝气和活

力。又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影响与努力，“一大”《宣言》特别重视农民与工人，主张“当对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之进行”。从而吸引了大批工农骨干加入国民党。据《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统计，仅广东地区1926年底已入党的十八万三千余名党员中，农民占百分之四十，工人、学生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以窥见国民党社会基础之一斑。

由国共两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机构，对于三大政策的贯彻实行，收到了国共两利的效果：国民党凭借新鲜血液的补充而增加了活力；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则可通过合作的形式得以公开提出与实施。具体地说来：（一）它使国民党从“失望”走向“希望”。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之后，成了国民党最活跃的力量，充当了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孙中山一面委他们以重任，一面“劝告国民党内悲观或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象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⑩从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信任，不难看出他们已成了改组后的国民党的灵魂。（二）它为共产党参与领导国民革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为提高共产党在国民中的地位 and 威信，壮大共产党的队伍提供了特殊的条件。毫无疑问，这些条件的存在和发展，对于促成革命领导权向无产阶级的完全转移，起着催化的作用。

再次，三大政策的奋斗目标，它的政权形式——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有各革命阶级参加的联合专政，体现了过渡时期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这个政权，必然在许多重大措施上逾越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闪烁出新民主主义前途的光芒，昭示出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

五四以后，中国该往何处去？众说纷纭。“一大”《宣言》明确否定国内各派提出的立宪、联省自治、和平会议、商人政府等建国方案，认为“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出路”。

这里说的“三民主义”，是“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涵义有了某些质的变化。

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它要求在联俄的基础上，把民族主义的斗争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视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而揭示了民族主义的新的社会阶级内容。

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强调“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详言之，“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可见，它是和人民民主主义相符合的。

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最主要的原则有两点：一为平均地权，二为节制资本，其宗旨在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使“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使工人得以“改良”。为达此目的，应“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从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成立农民部和工人部，到民生方案强调全力“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说明国

国民党开始在社会阶级政策上作出了某种努力，揭示了未来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

不难看出，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就是表示以后的革命与以前的不同”。尽管其理论还不尽完备，但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它已蕴含了不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因素。

那么，新三民主义要在中国建立什么制度？孙中山指出，俄国人自幼到老，一生无忧无虑，消除了英美国家至今还有贫富阶级的现象，“象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的新世界。”

诚然，孙中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他认识苏俄大多侧重民权方面），他把苏俄的胜利、人民的幸福归结为“是由于行三民主义、用革命方法造成的”，把指导十月革命的思想原则与三民主义混同起来。孙中山在阐释“中国同俄国革命都是走一条路”的同时，认为“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④ 而从新三民主义的内容来分析，它要走的道路，自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可能是苏维埃道路，而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道路将产生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权。而这个政权的发展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本身如此多姿多采：在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的时期，由于无产阶级还不能单独承担领导革命的责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揭举起三大政策的旗帜，使一个行将退役的旧民主革命领导阶级从思想、组织、目标等方面得到了新的给养，仍然能够居于新民主革命的领导行列。孙中山对这一奇迹的促成，举足轻重：没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三大政策的形成，国民党的起死回生，固属天方夜谭；但假若没有孙中山的觉悟与思想的升华及其真诚、积极、民主的革命态度，共产党就没有帮助国民党改组和领导过渡时期革命的最初凭借。正是孙中山的决心导致国民党的改组和三大政策的制订，而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一个可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最低纲领）的组织形式，通过这个形式，来实现对革命的领导。

于过渡时期应运而生的三大政策，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从政治纲领到革命内容，从领导权形式到奋斗目标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为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必要的过渡条件（包括完成了某种过渡的准备和扶植某些新民主主义因素的成长），提供了实现这一转变的正反方面的可贵经验，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实践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主持确立三大政策的孙中山先生，便是建树这些功绩的奠基者。

加速国民革命节奏的法宝

三大政策的中心思想，是以各民族、各民主力量为革命基础的大联合思想。“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建立统一战线”，便是这个大联合思想的体现。这里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它是加速国民革命步伐的法宝。

国际统一战线，是以联俄为核心，“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国民党联俄，决非历史的偶然。孙中山以大半辈子光阴向西方资产阶级寻找救国真理，试图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框架改造中国。但他在渴望西方“文明”援助的过程中，逐渐看清西方“世界文明”的真面目，转而决心联俄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孙中山反帝思想的一次飞跃。事实证明，联俄不仅使中国革命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直接的思想指导；使国民党得以师法苏俄关于政党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工农运动等方面的最新经验，促进了国民党革命精神的发扬和组织方略的改变；还获得苏俄人力、物力和政治、军事方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援助，在某种程度上对孙中山在广东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和革命大本营的稳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使苏俄在东方找到了可靠的同盟者，使共产国际关于在社会主义的西方与被奴役的东方架设革命桥梁的设想变成现实。从此，中国民主革命真正跨入了世界革命的行列，加强了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力量，扩大了世界革命的影响。

国内统一战线，是以联共为核心，以联合农民、工人为主体，联合各民族各民主爱国阶级一道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国民党联合共产党人，这是国内统一战线得以顺利发展的关键，没有共产党人，国民党就找不到联合农工的钥匙，反帝反封建的事业就会失去广大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动力；没有共产党人，国内统一战线便失去了支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波澜将难以掀起。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在这个联合战线中表现出与共产党人的民主的真诚的合作态度（如没有要求取消作为独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对共产党提出任何限制条件等等），则是使共产党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进而使统一战线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统一战线的思想战线很快活跃起来了：新三民主义的思想跨长江、逾黄河，迅速传播到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青年学生群以及广大的工农民众之中，大批有志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青年和农民、工人纷纷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因此得以迅速建立，国民党的成分也由此渐而改变——从一个失去活力和希望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在内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国民党在壮大，共产党也在成长。共产党人通过统一战线，“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作反帝国主义运动。”^⑥使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日益提高，党员数量增长很快。

工农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直接推动了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从1925年初全国第一个省农会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起，至1927年夏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农会的成立止，各地的农会会员已逾千万人，给革命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着已经组织起来的五十五万工人，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新阵容。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运动所掀起的反帝风暴漫卷全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上

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即直接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工农群众的奋勇战斗，促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澎湃向前。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创建的黄埔军校，于1924年5月正式开学。至此，孙中山三十年的“战争事业”有了第一支真正隶属于革命党指挥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的形成和发展，保证了广东革命大本营的稳固和发展，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工农群众的觉醒和工农运动的高涨，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壮大，广东革命政府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所有这些，都是三大政策的大联合思想之花结出的喜人硕果。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⑩

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产物，三大政策的主要历史贡献只能作用于它所实践的历史时期。当然，一般说来，三大政策完全可能根据时代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政治思想的需要，不断更新它不适应革命形势的内容，使之在不断的“适应”中日趋发展与完善。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纲领有相同的部分，有不同的部分。“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⑪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扩大和深入，必然要在奉行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引起分化和组合，三大政策也将随着形势的要求相应更动。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孙中山的早逝，使这些分化和更动朝着不利于革命的方向滑行。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记录》。

②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75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④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⑥ 《劳动者》第二号（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⑦ 《政治周报》第3期。

⑧ 《工人之路》第194、195期。

⑨⑩⑫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3、126、

399页。

⑪ 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中），香港《掌故》月刊，第42期。

⑬ 《宋庆龄选集》第466页。

⑭ 《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65页。

⑮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运动之决议案》。

⑯⑰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5、649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

责任编辑：章权才

孙中山与传统儒学

马克锋

中国传统文化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阐发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渊源。他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固有文化即传统文化，其核心是儒家学说。这里我仅就孙中山如何“因袭”传统文化，对儒学持何态度作点初探。

(一)

历史步入近代，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在渐渐冲刷着中国古老社会的残垣断壁，中西文化发生冲突，传统文化受到挑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紧要关头，蒙受着奇耻大辱。如何抵御侵略，拯救中国？每个人都在思索着，寻找着。当时社会上主要存在三种思潮：一是保守主义的复古派；二是全盘西化派；三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孙中山一反上面三派观点，认为中国既不能全盘西化，更不能全面复古，也不能中体西用。他提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一、一切从革命需要出发。孙中山认为，凡是有益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好思想，不论古今中外，我们都要学习，为我们所用。他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还是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①就是中国的旧道德，“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②“使古人为我笔记”，“以古人之思想，资今日学问”。^③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依据其革命思想的实用论与辩证观点来判断和估量一切思想学说和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形成自己博大精深的革命思想体系。

二、全盘西化不符合国情民性。孙中山认为

传统的民族文化不仅裸露为表面的物，并凝聚成种种制度与习俗，而且沉淀成一种民族心理，中国的社会生活，民族心理和西方大异，因而学习西方要考虑到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不要机械地死搬硬套。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④既然中国的社会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⑤但孙中山不是反对学习西方，而是主张根据自己特点，进行借鉴。他认为，就物质文明讲，西方发展迅速，日新月异，远远高于中国，因此，“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但就精神文明讲，却不能和物质文明一样机械地输入。一方面固然是国情因素，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存在重大差异。这一点孙中山不仅看到了，而且认识还比较深刻。他认为，科学发展一日千里，而社会政治制度却是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因素，有时几千年、几百年沿袭下来。这样，政治的进步远不及科学。因而学习西方精神文明就不能同物质文明一样。“如果我们仿效外国的政治，以为象是仿效物质科学一样，那便是大错。”^⑥所以对待这两种文明，应持两种方法，决不能相同，这就是“管理物的办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办法，还不能完全学欧美。”^⑦他说：“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⑧

孙中山对近代漠视国情和逃避现实的两种极端心理给予批判。他指出，中国人以义和团为界，从一种极端走到另一种极端，也就是从盲目排外到民族虚无主义。义和团运动前，虽然中国人“早知道外国的好处也是很多，但是全国人的心理，还不相信外国是真有文明”。^⑨其“思想则犹是闭

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⑩ 闭目塞听，盲目自大。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又反过来信仰外国，以至于到盲目崇拜。”^⑪ 于是孙中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得仿效外国。”^⑫ 对于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主张废掉中国汉字，孙中山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彼于中国文明一概抹杀者，殆未之思耳。”^⑬ 从而指出了学习西学的正确途径，即首先要树立民族的自信力，不要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又要欢迎世界潮流的冲击，“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并“取法乎上，以人之长，补我之短，来改造社会，造福人类”；还要“能够照自己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这样，“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⑭

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批判，更要在其基础上有所创造，不要为其所囿，陷入旧思想之中不能自拔。孙中山认为，在世界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旧思想和传统观念及其心理结构，总是阻碍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难以和新思想同伍，“就人类进化的道理讲，旧思想总是妨碍进步的，总是束缚人群的。”^⑮ 因此，要进行革命，要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新社会，就必须打破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⑯ 如何打破旧思想，孙中山认为非“从心理入手不可，必人人将旧思想全行消除，换入一副崭新思想，方能成功。”^⑰ 基于此，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些落后的、消极的部分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部分，必然有精华所在。对此要合理地改造，批判的继承。孙中山对传统文化没有抱住旧的不放，更没有被旧思想所束缚。他能够“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役。”^⑱ 这对我们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

正因为孙中山具备了较为正确的文化观，所以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态度上，既不是全部肯定，也不是全盘抹煞，而是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给以合理地继承、改造和批判，表现了一个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宽阔胸怀。

概括起来讲，孙中山对儒家思想，继承了其民族思想（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观）、和平观念和大同理想；改造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批判了儒家所宣扬的封建专制、皇权、宗法思想和知行学说，使其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合理部分。

一、继承和发展

孙中山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一蹶不振，落后挨打，除物质文明不发达外，主要原因是民族精神的丧失。^⑲ 什么是民族精神？他认为，这主要是指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观。因此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恢复民族精神，并发扬光大。于是，他在三民主义中首倡民族主义，并在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发掘民族思想。他认为，“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⑳ 所以要推翻专制统治及其帝国主义压迫，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就必须将“吾先民所遗留”的民族主义思想，发扬而光大。孙中山对明末儒者，耻食清粟，誓死抗清的民族精神大加赞扬，认为“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彻的，观察社会的情形也是很清楚的。”^㉑ 必须指出，孙中山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观，和封建的种族主义不同，旨在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特权，并把“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其具有了鲜明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性质，并以此来激励中国革命党人发奋图强，推翻封建王朝，作用是积极的。

和平思想属于儒家的道德范畴，也和儒家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相联系。孙中山认为，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中最爱和平的人。”^㉒ “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就是现在“我们四万万人也是很爱和平的。”不过，由于近代失去了民族独立，面临亡国灭种之灾，和平生活遭到破坏。因此，孙中山认为，首先要保证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然后才能发扬和平精神，才能讲和平美德。“我希望中国永远保守和平的美德。”“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㉓ 当然这些都是以民族主义完成为前提的。

与倡导和平相联系，孙中山提出了我们现在的文化是“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㉔

的口号。它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当时至少有两个现实意义，一是倡导“王道”，与西方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霸道文化”相对立。他追求的“一切民众和平、平等、解放的文化”，有反抗民族压迫与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意义；二是推崇“王道”政治和清朝统治者实行的压榨民众的“霸道政治”相对抗，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权政治的性质。

对于儒学中的大同思想，孙中山把它视作自己政治思想的最高理想和最后目的，又作为其世界主义的理论基础。他在《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这项思想，他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②在《军人精神教育》中讲到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则“必有高尚思想”，而这高尚思想，便是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③在《建国方略》中，又直接了当的提出：“人类进化目的之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④在《总理全集》第四册有孙中山亲笔撰写的《礼运大同篇》，更表达了孙中山对大同世界的无限向往和挚热追求。

但孙中山没有停留在对儒家大同理想的简单因袭和机械阐释上。他进而提出了“世界主义”。他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楷模，说明孙中山的“世界主义”接近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如何进入“世界主义”？孙中山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这种世界主义应当“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因此，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⑤实际上就是把民族利益和主权完整作为进入世界主义的前提；其二，必须“在强权打破之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⑥实际上指出了实现世界主义的前提是消除强权政治，实现民族平等。他认为，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先决条件，那世界主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且有成为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统治全球的借口。他说：“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⑦我们要“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重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才有实际，再去讲世界主义。”^⑧

但孙中山把“大同”理想和民生主义联系起来，想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

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⑨想“一劳永逸，免将来的后患”，^⑩这就带上了乌托邦色彩。

二、改造

改造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孙中山对儒家学说新的阐释上。首先是对儒家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给予新的解释并注入新的内容。尤其是对“忠”和“仁”的新解最为突出。忠是儒家所一贯倡守的封建伦理道德，孙中山认为，虽然民国建立，君主不复存在，但忠这一形式还要保存。他把忠解释为一种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义务及责任感。他说，我们“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⑪这一思想，也表现了孙中山反对专制，为国家献身，为民尽责的革命精神。仁也是儒家所一贯主张的伦理道德之一。孙中山认为古代的“仁”，就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所倡导的“博爱”。“据余所见，博爱之谓仁”。并且把“仁”分成“救世”、“救国”、“救人”三类。孙中山最强调“救国”之仁，即军人之仁，他把“仁”作救国保国，旨在激励革命将士担当大任，完成革命大业。^⑫

其次，孙中山对儒家所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进行了改造。一方面，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古时很好的政治哲学”，“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说出。”主张“应该保存”。^⑬另一方面，孙中山又把此“八目”纳入一种知识范畴，从而减少其伦理色彩。“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恰当。”^⑭他说，要振兴中国，不但要发扬民族精神，而且要恢复民族智能，将道德知识化，就是要求人们学习优秀文化，从个人做起，人人为中国振兴而奋斗。

孙中山认为在孟子学说中，已具有民主思想的萌芽。“其垂为学说，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为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并无其制度”。^⑮这种思想也只“不过是一隙之明”。^⑯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要建立民主国家，传统的民主思想远远不行，还是要“取资欧美”。孙中山用西方思想对孟子学说加以改造，并说明真正的“以民立国之制”及其相关的“中国革命思潮”，以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实系“发源于欧美”，^⑰其企图旨在“集合中外的精

华”，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

三、批判

儒家学说中有着极其腐朽、落后、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东西。对此，孙中山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孙中山认为，儒家所宣扬的宗法思想，只有家族和宗族观念，缺乏民族和国家思想。受儒家思想影响，“一般中国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家。”^④结果虽然人口众多，实在是一盘散沙。“弄到今是世界上最低下的国家，处于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⑤他认为，中华民族处于紧急关头，人们如果还是陷在宗法思想的小圈子里，鼠目寸光，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为此，孙中山大声疾呼，号召人们提倡民族主义，反对家族主义，铲除宗法观念，“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⑥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才可以自立于世界东方。

孙中山认为，儒家传统的知行观念，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往往使人们“把极难知的事，看得太容易，不去深求”，“把极容易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⑦因而他对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大加批判，把此学说看成是“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因而一反其说，提出“知难行易”。对晚清非常盛行的王阳明学说，孙中山也进行了批判。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似是而非”，“不合于实践之科学”，“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在对传统知行观批判的基础上，孙中山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发展史实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经验来解释知行，分析并论证行先知后，知源于行和知难行易，建立了他的近代知行观。从而把中国哲学唯物论认识思想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孙中山对于儒学，既不是简单因袭，也不是全盘抹杀；而是一切着眼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破旧立新”，发扬光大其精华，抛弃批判其糟粕。既受到其积极影响，又在某一方面有所局限。但孙中山对于儒学的态度，既和盲目的国粹主义，无知的复古主义

不同，又和中体西用派有异。把孙中山说成是儒教的继承者，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极大歪曲和肆意篡改。恽代英评价说：

“孙先生生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所以他实在有些封建社会的思想，他不忘东方道德。他叫人注意东方道德，他讲王道，讲公理，这都是东方人的思想。孙先生在封建社会学说教义之中，把其中最好的部分便是仁爱平等的思想接收了，我们说孙中山先生恭维中国文化，这是不错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孙先生绝对不是和那些腐儒一样。他是将封建社会中仁爱、平等的空谈，用近代的各种方法实现出来。孙先生东方思想是有的，但不仅是东方思想，他在三十年左右，便受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在晚年又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便是列宁主义的影响，相信世界革命势力的联合，工人和小农的联合，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所以主张联俄及容纳共产党。孙先生一生都能在各种环境里接受各种进步的思想。”^⑧

恽代英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

① 《总理全集》（一）胡汉民编，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版，以下简称《全集》。

② 《孙中山选集》下P651，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以下简称《选集》。

③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分见《全集》（一）；P467，P467，P468，P33，P347，P55—56，P916，P198，P2，P6，P6，P442。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分见《选集》下；P728，P726，P728，P729，P729，P725，P164，P744，P725，P753，P637，P635，P635，P750，P650，P653，P653—655。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分见《全集》（二）；p347，P97，P916，P549，P273，P257—258。

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分见《选集》上P142，下P632，P626，P623。

㉑ 《列宁选集》第二卷P425。

㉒ 《孙中山全集》（五）P188，中华书局1985年版。

㉓ 《恽代英文集》下，P749—750。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责任编辑：林有能

政治文明初探

范贤超 周建平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中央向我们提出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文明的战略目标。但是人们常把社会文明的内容确定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却认为，反映人类社会进步和开化状况的社会文明，除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外，还应包括政治文明。

所谓政治文明，就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具体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关于民主、平等、自由、解放的实现程度。人们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社会革命，对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改造，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形态，在新的社会形态里，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要建立与生产力状况、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人们的民主、平等、自由实现的程度，都会相应地获得新的提高，这就是政治文明的进步。从广义上说，在原始社会，就有政治文明的萌芽状态，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存在政治文明的转化形态。从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就有处理人们相互关系的组织机构，管理形式，规章制度。因此，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重要内容。

政治文明是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同步产生的。人类第一个历史前提，就是生产满足衣食住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本身；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为满足第一个需要所引起的新的需要，即工业的生产，这是伟大历史智慧的产物，精神的产物；第一个社会关系，就是生产他人，以及因此生长起来的社会关系。我们“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①同时，“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②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物质交往关系，就是指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管理制度。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是，他一旦成为人，就超越了自然界，并以同自然界对立的姿态，按照人的需要去改造自然，这就是物质文明的起点。与此同时，人们为了有效地改造自然，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必然发生着相应的、以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交往。这就是以社会系统形式为特征的政治文明的萌芽。由于生产的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感

知周围环境和人们相互之间的狭隘联系的意识也就产生起来，这就是精神文明的始初。

但是，人类初始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其程度是极低的。三者处在浑然一体的状态之中，恩格斯把它称为人类“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它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更没有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文明。恩格斯为什么要把人类最残酷的奴隶制国家看成是文明时代的开始，甚至把它称为文明时代的欢乐曙光呢？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当时铁器的使用和文字的发明。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了国家机关，开始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恩格斯指出：由于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制度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使雅典公民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③正是由于生产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国家，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发生了分离，统治阶级为了支配生产资料，支配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支配产品的分配形式，必然建立一套社会政治制度，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发展起来之后，人类文明的时代才随即到来。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文明的进步，往往是通过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暴力，特别是进步阶级为推翻落后的生产关系和腐朽的政治统治的革命暴力，是以极不文明的形式，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是新的社会制度诞生的助产婆，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推动器。

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表现出不可遏止的进步趋势。但每一时代政治文明的进步又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它是由前后相继的特定时代的进步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质的飞跃。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法律制度的根本内容，就是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实施。与此相适应，政权机构的主体是反映人民意愿的群众代表，它的主要功能，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政治文明最完备的形态。

同样，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也体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内部发展中。在同一社会形态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调整，在政治上也必然进行某些改革和调整。其结果，必然或多或少地促进政治文明的进步。当然，这种进步，与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停滞和倒退，如政治上由进步转化为反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一切都沉寂了。停滞和倒退的本身，孕育着政治文明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政治文明进步的总趋势不能因此而改变。

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不是什么历史人物的天才创造，也不是人民群众的主观愿望，而是对既往社会政治文明的批判、继承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是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协同

发展起来的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文明的应有之义。总而言之，建立政治文明的概念，第一，能准确地反映社会进步的状况，是衡量人们改造社会的历史尺度；第二，政治文明的概念克服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局限性；第三，政治文明的概念为判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提供了唯一的依据。

政治文明作为人们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它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国家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主体，社会每个成员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的实现程度是政治文明的标志。

政治制度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其阶级专政而制定的治国方式、方法的总和。它包括国家的管理形式、结构形式以及选举制度，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内，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必然要确定一定的性质的国家。每一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调和一定社会的阶级矛盾，向社会各成员表达自己的阶级意志，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必须要吸收一定社会集团的代表参加国家的组织机构，制定大政方针。吸收社会集团代表的范围、人数的多少、吸收代表的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成员的意愿，这就是从组织形式上体现的政治文明的内容。

法律制度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为了调整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某一方面的法律规范的统称。在阶级社会或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的意志。由统治阶级制订的法律制度，只能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当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可能有两个阶级利益暂时一致的地方，也有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一致的地方。因此，统治阶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其统治，也常常在一些法律条文中，照顾一下同盟者的利益。但是，这只是对法律制度所做的静态考察。其实，一定法律制度的文明程度还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民族特点、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个人气质等有着某种联系。因此，同一性质的法律制度在具体贯彻实施过程中，其文明程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别。这是从法律制度规定形式上所体现的政治文明的程度。

民主是与法律制度相对应的政治范畴，是人们参与国家统治和管理活动方式的表现形式，它是同专制政治对立的民主政治的意思。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有了阶级的专政，才有作为专政的对立面，发生了争取同它对抗的民主问题。民主问题不仅是民主作风、民主权利、政治原则等问题，它首先是国家制度问题。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是国家阶级本质和国家形式的统一，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自从有国家以来，民主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的民主。统治阶级享有民主，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就意味着专政。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由生产、自由交换、自由买卖劳动力，这就需要冲破统治阶级的专制制度，发展民主制度。同时，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任何阶级要进行社会革命，获得自己的政治统治，必须首先得到劳动人民的支持，需要利用民主的口号来组织革命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对民主的要求。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民主和专政的具体对象和具体方法存在着严格的

区别，但总的历史趋势是，民主范围越来越广泛，民主的程度越来越高。

政治文明中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三个方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首先，法律规定了民主的范围，使被统治者在行使民主权利时有所遵循。任何民主，都是在法律规定和允许的范围内的民主，没有绝对的民主自由。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也只是在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范围之内行使。同时，法律还规定了实现民主的程序。

其次，民主制度是督促法律制度实施的现实力量。法律制度所规定的权利是一回事，具体实施这种法律制度，实现这种权利又是另一回事，必须通过被统治者的斗争和监督，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民主力量。由于农民起义等各种斗争形式，规定了封建地主只对农民的不完全占有，有时还实行了轻徭薄赋的让步政策。但是，地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超越法律规定，实行横征暴敛，甚至买卖农民。只有依靠农民的斗争，才能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

第三，政治制度是民主和法制实施的组织保证。任何历史类型的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施。这种组织形式，无论是古代的专制君主制，近代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还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代表大会制，统治阶级都必须吸收该社会各种势力的代表参加，以反映各社会集团的意见，调和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以便保证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的贯彻。一般说来，民主程度越高，政权组织中各社会势力的代表就越广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除了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之外，与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各团体的代表参加政权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保障人民群众广泛的民主权利，监督国家机关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起着重要的作用。

全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关键，是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社会不断进步的中心环节，是历史的火车头。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以不可遏止的必然趋势向前发展。但生产力发展前进的绝对趋势与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的特点，就会发生矛盾。原来一度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由于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便转化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而代表旧生产关系的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掌握着国家政权，它必然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阻挠经济制度的变革，压制先进阶级变革旧生产关系的要求，镇压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以维护本阶级的阶级权益，并利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否认这种变革的合理性。因此，革命阶级克服统治阶级的抵抗，剥夺统治阶级手中的国家政权，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带动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新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政治文明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发展的杠杆。政治文明的进步必将引起生产力更加迅速的发展。代表近代先进生产力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

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这些根本制度与组织体制，它的基本社会关系，都是建立在民主原则和科学精神的基础之上，消除了由于“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而产生的物质对抗关系，使物质文明中的创造者与占有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对立的关系变成了协调关系。一方面通过物质文明的建设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又通过按劳分配的原则满足每个创造者的个人需要。这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根本上消除了物质对抗现象，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策保证，有力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

其次，政治文明的进步，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决定因素。新的政治法律制度一经建立起来，精神文明就必须反映和服从于它，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同时，社会的政治改造，也改变着人们自身的精神面貌，有利于与旧的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决裂，从而建立起新的观念，新的品质，使精神上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这种精神的解放若没有政治文明的进步和质的飞跃，也即是说，若没有政治文明的决定作用，是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立与发展的。

当前，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特点和新的问题，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只要抓住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迅速健康地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3页。

② 同上书，第29页。

③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潭大学

责任编辑：范英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

李 长 域

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时，必须注意研究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时三十年。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是相当重视并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精神文明的建设。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认识只是零碎的，就事论事的。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从理论上、整体上加以研究，则是十分必要的。一者，因为它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阶段，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因为任何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对于今天我们所从事的精神文明建设将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者，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评价，我们才能继承其优秀的部分，克服它的不足，搞好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最后，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史来说，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阶段。

一、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或因素

肯定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那么，它建设的是什么性质的精神文明？它里面有没有社会主义的部分或因素？如果有的话，应作如何估价？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作了很明确的论述。

他首先肯定：“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性质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别的一切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

《学术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所以，毛泽东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化的性质，因而也可以说是民主革命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

其次，在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上述性质时，毛泽东还强调了这种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把他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因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历史时代，应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而无产阶级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这种文化的性质及其内容。（二）最重要的还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是努力用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去进行这种领导的。（三）当时还在工人农民中努力地宣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中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各种阵地，其声势之浩大，其威力之猛烈，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了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四）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它的发展方向是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五）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中，我们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还超过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上述任务，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相当一些内容（主要是思想、作风、精神等）就是在那时奠定其基础的。

再次，毛泽东后来对民主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总体评价也是很高的，尤其肯定其精神方面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在1949年写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可见，经过伟大的民主革命，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方面取得了转折性的变化，是日益向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以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确认这些意见，我认为很重要。它告诉我们，我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是由我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决定的。但是，由于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上述特殊情况，因而它又具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因素、属性，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成果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成果是伟大的。这些成果主要是：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逐步站稳了脚

跟，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有力思想武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武器，无疑是中国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今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一种伟大的指导思想，其基础就是在民主革命期间打下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期间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首要的成就。

（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才产生的，而是产生于伟大的中国革命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条原则，就是理论与实践要结合。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极其复杂的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这种结合也经历了一个困难的过程。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这种结合中当然要出理论，于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伟大的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三）形成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哲学是文明的活灵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非常重视哲学理论的研究、宣传和实践。他在《实践论》、《矛盾论》、《反对本本主义》、《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进行了发挥和创造，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和强调了实事求是这个哲学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从而确立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为广大的干部、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我们正确地分析形势、确定战略策略和政治路线的伟大法宝，是我们的革命工作能够打开新的局面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有力武器。今天，我们重新恢复和发扬了这条思想路线，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四）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我们形成了很好的党风，党从而获得了很高的威望，拥有坚强的战斗力。实践证明，党风的好坏，是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问题。而延安时期的党风，为我们作出了极好的榜样。

（五）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也形成了很好的民风和好的社会风气。我们的干部、战士、群众，我们的人民，显示了自己的许多优秀的品质和崇高伟大精神。诸如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先人后己的忘我牺牲精神，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精神，平等、民主的精神，廉洁奉公的精神，团结友爱的精神，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虚心学习、言行一致等良好品德。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不愧是伟大时代造就的一代新人。正是他们的这种精神上的优势，打败了物质方面当时占优势的敌人，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形成的这种好的民风和好的社会风气，也是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伟大成就。

（六）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文艺、教育、科学（主要是哲学、政治学、经济

学、军事科学)、文化卫生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干部、战士和群众,虽然在战争环境中,也很重视文化的学习。文艺工作在此期间确立了正确的方向,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各根据地,教育、卫生事业也提到了日程上,兴办了许多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抗大、鲁艺、陕公、民族学院等办得很出色,培养了一大批各方面的干部和人才。《新华日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杂志,发表了政治、哲学、军事、文艺的大量文章。所有这些,使得我们的干部在文化知识素质等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此外,还出版了一系列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著作,为广大干部、青年学生提供了精神食粮。

(七)在民主革命时期,新型的人际关系开始形成。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友邻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都为之一新,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际关系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关系增进了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得工作中的责任感、创造性普遍增强,因而众志成城,所向无敌。

(八)在法制、纪律方面,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成为人们的普遍意识,“勤劳者奖,怠惰者罚”,“立功受奖,有过必罚”,是人们一致遵守的生活准则。因此,由于法纪严明就使一切不良的行为甚少市场,而使各种好人好事到处涌现。

总之,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我们在精神文明方面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这一点中外人士都曾有很高的评价。

三、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毋庸置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它们有着一致性。明确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在考虑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为精神文明建设所作的巨大努力,不要割断历史,不要只看到今天,而忘记过去。

(二)它们之间有着继承性。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个“雏形”,那末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丰富和完善;如果说前者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始初阶段,那末今天所开始的建设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阶段和完善阶段,它们是一个总过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个伟大工程的前后相续的两部分。没有前者,我们今天的建设就将困难得多,仅有前者也还是不够的,不能适应今天以及今后的需要。

(三)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建设的精神文明同今天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存在着若干显著差异:(1)发展的阶段不同。前者是始初阶段,后者则是深入和完善的阶段。(2)范围的广狭不同。前者所能实行的范围主要是

当时的各个根据地以及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许多还不是全国或全社会性的，后者则要广阔得多，是全国范围整个社会的事。（3）重点的不同。前者是着重于围绕中国革命问题展开的，后者则是着重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问题进行。（4）内容的完善程度不同。前者突出的是思想、道德作风、意识形态等问题，后者则要求科学、教育、文化也得到极大的发展。（5）物质条件的不同。前者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后者则已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6）环境的不同。前者是在我们还未取得全国胜利的条件下，而且主要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进行，后者则是我们掌握了全国政权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7）前提条件不同。前者是我们还没有任何经验的困难条件下，带有“白手起家”的性质，后者则是有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的情况下进行。（8）“压力”的不同。前者是在国际和国内的很大压力下进行，带有“逼上梁山”的特点，后者则虽有一定压力，但主要是依靠我们自觉地去进行。（9）时间的长短不同。前者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搞的，时间不是很长，后者则要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进行。（10）基础不同。前者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设，后者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进行。这些差异，反映出这两个时期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各有特点，因而要求我们在制定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战略、实施步骤、方针办法等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有所不同，有所创新。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范英

書海酌蠡

关于陆游妻唐琬再嫁的丈夫赵士程

官桂铨

宋代大诗人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故事，最早见于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放翁钟情前室》：“陆务观初娶唐氏闾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实绍兴乙亥岁也。未久唐氏死……”（民国九年1920涵芬楼据元刻明补本）

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况周颐《香东漫笔》说：“放翁出妻姓唐名琬，和放翁《钗头凤》词，见《御选历代诗余》及《林下词选》。”知陆游妻名唐琬，唐琬后夫赵士程在沈园见陆、唐相遇，竟“遣致酒肴”，其豪爽风度令人叫绝。但七、八百年来，赵士程为何许人，未见人谈及，诚千古憾事。

我在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二十五《秩官类六·西外宗正司官》中发现一条记载：“知宗正司一员，绍兴三年移司福州……（赵）士程，武当军承宣使，（乾道）七年五月（任）。（赵）不致，左朝奉大夫，（乾道）九年十二月（任）……”（据传抄本）。梁克家与陆游、赵士程为同时代人，其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这也说明周密记载唐琬再嫁确是事实。

按乾道七年为公元1171年，赵士程任宗正司时，陆游年已四十七岁。陆游与唐琬在沈园相遇时，“实绍兴乙亥岁（公元1155年）也”，当年陆游才三十一岁，“未久唐氏死”。可见，赵士程曾任过武当军承宣使，他在唐琬死去十余年后，来到福州任宗正司，两年后离任去了。

珠江三角洲文化新发展阶段和我们的选择

张锡洪 梁桂全 黄濯纓 康 钟

如何看待和评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珠江三角洲文化发展？如何把握开放改革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当前文化工作面临什么任务？这些都是关系到广东文化工作宏观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

一、开放改革中的珠江三角洲文化新潮

开放与改革不仅解放了经济生产力，引发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解放了文化生产力，使“文革”期间受尽摧残的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文化重新勃发生机，形成了一股文化发展的新浪潮：文化事业的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全面复兴；文化开放突破了文化发展的传统结构，出现了千姿百态的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小生产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生活方式开始崩溃，新的文化生活方式正在孕育成长。

珠江三角洲文化新潮标示着文化生活方式的新的解放，它是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文化形态的序曲，具有一系列明显的新特点：

①开放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开放。珠江三角洲是全国有名的侨乡，这一带人民在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生活诸方面与海外有着广泛的联系，近几年，这种联系空前密切化。二是多功能化。它强调在进一步加强完善文化的“四有”教育功能的同时，发挥知识、娱乐、美育的综合化功能。

②多样化。即由“小文化”全面向“大文化”过渡，这是文化生产机制的更新。过去的文化主要依赖于国家投资和文化部门行政管理的少数阵地。这几年，“官办文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化功能上全方位；在结构层次上包括专业文化、市场文化、自娱文化、群众文化等；在办文化渠道上，不仅国家办，而且全社会办，既有群众团体（如工会、团组织等）办，也有集体单位和文化专业户办；既有文化部门办，也有其他行业（如园林、饮食、旅业、工厂企业等）办；在形式上，不仅有传统的，如文学艺术、琴棋书画、鱼鸟盆景，也增加了许多新的方式，如音乐茶座、舞厅、桌球、摄影等；在水平层次上，既有阳春白雪，更多的是下里巴人，高、中、低档并举。

③市场化。这是文化发展多样化的必然结果和必要条件。现在珠江三角洲城乡文化市场已初步形成。一部分文化活动已参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去，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市场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逐步缓解了文化生产与文化需求在规模和总量上不相适应的矛盾；同时，通过“以文补文”，大大加强了

文化事业发展的经济实力和活力。一九八五年，广州文化经营收入达8000多万元，上缴财政90多万元。

④设施手段的现代化。这是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东方乐园、长江乐园，各种游乐场、渡假村，都以其新颖的娱乐方式带来了现代化的气息。更重要的是，近几年现代影视音响设备大规模进入珠江三角洲群众家庭。据佛山市1984年对917户职工家庭抽样调查，每百户拥有电视机90台，录音机70台。1985年顺德县大良镇12000户家庭拥有13000多台电视机。此外，高级组合音响设备、钢琴也开始进入家庭。家庭文化迅速发展。

⑤主体参与性。这是珠江三角洲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深刻特征。所谓主体参与性，就是人们不再仅仅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或被灌输者被动地参与文化活动，而且同时以文化产品生产者、创造者参与文化活动。文化欣赏娱乐、文化创造和文化才能发展三位一体化。正如中山市团委的同志所说，现在青年们已不再满足于被动的文化活动，而且要求自己创作、自己表演，自己“上镜头”。这样的“发烧友”（广州俚语，意谓感情冲动者）越来越多。他们对各类文化艺术有很高的热情。中山市组建业余电视艺术团，报名者近四百人。文化主体参与性导致两个显著现象：一是出现了群众文化社团热。包括戏剧、书法、美术、摄影、雕塑、雕刻、琴棋、诗谜、曲艺、集邮、文学、演唱、鱼鸟盆景等等，各种协会团体如雨后春笋。参加者有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各层次，而青年和退休老年尤为活跃。据反映，仅容奇一个小镇就有业余粤剧团一个，武术醒狮队15个，灯谜组9个，书法美术组4个，文艺队3个，花鸟盆景组10个，集邮组2个，篮球队27队，乒乓球队28个，羽毛球队18个。二是文化艺术学习（培训）班热。每逢学习班开班，人们趋之若鹜，场场“爆满”。参加者之动机往往是为了充实自己，多增一技之长。

珠江三角洲这一汹涌而来的文化新浪潮，是由多因素包括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逐渐积累最终导致的一场变革。

第一，经济的高速增长，强化了文化发展的物质承受力。据佛山市统计，1984年，全市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6.77亿元增加到1984年的88.75亿元。近几年，仅市财政投资文化事业就达1700多万元，社会集资1300多万元。从1980年至1984年5年间，广州市仅文化新闻事业投资达2610万元，相当于1965年至1979年15年文化基建投资总和的1.15倍。

第二，个人经济收入的增长，使群众中潜在的文化需求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文化需求，推动了文化市场的兴旺。过去，人们的生活需求长期被束缚在“日求两餐，夜求一宿”的低层次生存结构中。根据1984年城市职工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当人均生活费月收入不足25元时，有支付能力的文化需求接近零。（见下表）

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收入	25元以下	25—35元	35—50元	50—60元	60—70元	70元以上
文化娱乐用品支出	0.02	0.30	1.16	2.10	3.27	5.13
文娱费支出	0	0.10	0.17	0.24	0.21	0.34

佛山市城市人口1978年每人月平均收入约28.24元，农村人平月收入为18.14元。接近或低于文化需求的边际生活费收入线。但到了1984年，城市人口每人月平均收入达77.16元，农村人平月收入为66.5元。大大高于文化需求边际生活费收入线，从广州市来看，群众生活费收入也只是在这几年才急剧增长的。(见下表)

时 间 项 目	职工人均月生活费收入	居民人均月生活费收入
1978年	36.84元	35.01元
1984年	69.81元	63.95元

群众收入的普遍提高，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需求压力。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不仅结束了经济工作中的“自我封闭”状态，实际上也结束了文化的“封闭状态”，开拓了珠江三角洲与港澳地区以及海外的文化交流，成为珠江三角洲文化新潮形成的催化剂。大规模的物质生产技术和现代传播技术引进，扩大了珠江三角洲的文化生产能力，并使文化消费的国际示范效应在珠江三角洲迅速扩散，推动了珠江三角洲文化需求在一般形式上仿效、吸收、追赶世界文化现代化潮流。

第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起飞提供了良好的运行体制，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拓展渠道。文化生产机制由单一行政管理和财政补贴转为市场经营，有偿服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事业的自我发展，增强了文化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社会文化需求刺激了文化生产发展，文化生产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人们文化需求向更阶段发展。实践表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

二、珠江三角洲文化面临新的发展阶段

珠江三角洲文化新潮，只是新时期现代文化形成的序曲。这股文化新潮，本身就孕育着文化结构的变革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替；它不可避免地要导向一个文化的新发展阶段。首先，群众“文化的绝对饥饿症”已经结束，文化消费由饥不择食转向更多的选择，由低层次转向中高层次，一涌而起的文化市场在原有结构下已趋于饱和并显示衰落迹象。其次，“专业文化”不景气，面临外来文化、社会文化、读书热、自娱文化（或家庭文化）四股浪潮的夹击，每况愈下，不变革便无出路。再次，文化新潮缺乏导向主体，表层繁杂，深层不足，各文化形式兴衰更迭周期极短。最后，改革越向纵深发展，越深切感到传统文化包袱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文化发展转向一个与改革相协调的新发展阶段。

在这一发展转换阶段过程中，群众文化意识和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审美观念的上升，与目前低层次粗放发展的文化形成鲜明的矛盾，是导致文化转向新发展阶段的主要

矛盾，来自群众文化选择的压力以及广东在全国文化示范效应的挑战，将成为阶段转换的主要推动力；完成这一阶段转换，需要自觉的意识和果断的战略抉择。

首先，这一发展的转换，是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在三十年代末，毛泽东同志曾经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性质、阶级关系结构以及面临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提出了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概念，并制订了一条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路线和总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进入了一个与前三十年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与这一新时期相适应，也必然有一个与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形态不大相同的现代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主、开放、人道、建设的现代人民大众文化；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这一转换是文化一般发展阶段中的一个必由阶段。无论从西方近代文化发展史还是从近几年珠江三角洲文化发展趋势来看，伴随着经济起飞而来的文化振兴和现代化，大体有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文化需求为前提的文化大普及阶段，具有粗放、通俗、扩张的特点；第二阶段是文化发展由追求规模，推动普及的粗放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文化消费阶段；第三阶段是现代新文化形态形成并推向成熟发展阶段。现在，珠江三角洲文化发展已越过文化绝对匮乏向文化市场匮乏的转换，进一步发展到文化市场匮乏向文化质量匮乏的转移。这种变化表明，珠江三角洲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正向第二个发展阶段过渡。在这一过渡中，主题是提高文化质量，强化新形态的社会主义主体文化，完善高度开放、高度民主、情趣高雅、宽松自由、生动活泼的文化环境，发展文化主体的参与性，为在新时期每个人的尽可能全面发展开拓更为广泛的领域。

在这个文化新发展阶段中，珠江三角洲文化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珠江三角洲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全省前面，而且必须在发展新文化形态方面走在全省的前面。（2）文化发展由自发状态转向自觉状态，有关领导机关要从方针、政策上规划和指导文化的健康发展。（3）珠江三角洲文化将从低层次粗放结构转向以高质量、高格调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开放文化体系。在这一阶段，社会文化环境、人的文化素质、文化意识、文化修养、文化观念，伦理道德诸方面将实现综合发展。（4）文化的主体参与性将获得更为普遍和完善的形式。人民群众在业余时间有可能自愿地参加各种文化娱乐生活，从体力、智力、艺术，社会参与能力与协调能力诸方面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5）文化的综合功能将得到全面的完善和发展。

必须看到，珠江三角洲文化转向新发展阶段，还面临着一系列障碍和困难。

首先，从宏观来看，文化发展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长期以来处于摇摆不定、反反复复的状态，对珠江三角洲文化发展，我们至今未能形成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领导部门不得不处于消极被动状态，未能主动地从战略上组织珠

江三角洲文化的发展。

其次，主体文化（主要是专业文化）处于困惑和营养不良的疲惫松垮状态，缺乏主体导向能力。此外，由于左右文化发展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时松时紧，左右晃动，致使文化艺术工作者，专业和业余创作人员无所适从，察潮观风谨慎而行。这就使尚不强大的文化生产力又受到人为的压抑。这是我们的文化生产一直落后于社会文化需求的重要原因。近几年来，一些文化艺术专业工作者逐步看到正在酝酿着的文化变革，努力探索。《裂变》、《特区人》、《南方的风》、《人生不等式》等，都表明了一种新的尝试，出现了创作方向和方法的多元化。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探索尚处于自发和个别，未进入有组织的自觉的和整体发展的轨道上；如果不能形成一股宏大的文化探索改革潮流，将难以突破僵持局面。

再次，专业文化以外的社会文化缺乏创造能力。目前活跃在珠江三角洲的大多数是低层次的通俗文化。这部分的文化生产者缺乏必要的思想和专业基础，其中一些人为迎合市场需要，粗制滥造，滥竽充数，亦有极少量不健康的文化在暗地里滋生。

第四，文化结构不合理。这几年，群众文化消费的指向性分散而多样化，而我们未能及时调整文化资源配置，于是，一方面出现专业文化供过于求，内容、风格、形式不适合群众文化消费口味的状况。另一方面，进行调整，却遇到严重的心理屏障和体制屏障，以及三十多年积累形成的沉重的包袱。在广州地区，仅粤剧团就有十一个团，歌舞团、话剧团各四、五个，一年难有几次演出。但要裁减谁也不让。撤销广州京剧团就曾引起轩然大波。这样，有限的文化投资只好“撒胡椒面”，谁也吃不饱，谁也饿不死，很难有发展能力。

最后，群众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由于普通教育长期忽视美育，因而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文化素质不全或畸型发展。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群众的文化需求倾向、审美能力和文化生活水平处于较低层次。

三、文化观念的调整和对策思考

实现文化向新发展阶段转换，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成长的过程；相反，只能是自觉的文化创造和再创造过程。其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化发展需要有一个再认识过程。从珠江三角洲这几年的文化实践来看，应当对下述问题要有新的认识，并在这个基础上，调整我们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基本规律的再认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对社会主义文化基本规律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文化被规定为是一种“政治宣传工具”，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看作是文化工作的基本矛盾。历次政治运动首先从文化界开刀，文化政策的变更成了国内政治变动的晴雨表。现在我们必须重新科学地揭示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文化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首先是人们文化生活和文化创意活动。在社会主

义建设新时期，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文化工作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的多方面发展。离开这个根本目的，文化工作就会走偏方向，文化就不能繁荣。

二是对文化功能的再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应具有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多方面功能：思想教育功能，不仅为着一般的政治任务，而且是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在理想信仰、观念、气质人格、文化心理、道德情操、人际观念诸方面全面地塑造新的社会文化人群体，使之与现代化进程、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娱乐功能，与高节奏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文化生活将发挥其缓冲、调节情感的作用，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轻松活泼、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活动。这个功能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断发展和扩大。美育功能，文化应该成为培养社会成员美的观念、审美能力，美的素质、美的欣赏的重要手段。知识功能，把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融合起来，使人们在丰富的文化生活中获得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技艺功能，即让人们在参与文化活动中，学会和掌握现代生产和生活的技艺，促进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

三是对文化市场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再认识。文化发展的市场形式是否与商品经济发展有必然联系？珠江三角洲这几年的实践的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市场将会进一步扩大，成为调整文化生产和文化需求，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杠杆。目前，有四类文化：市场文化，自娱文化、专业文化、群众文化。随着文化结构的调整，专业文化队伍将有相当一部分转入文化市场。而且，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专业文化的服务也不是无偿提供的，也需要货币交换。在这个意义上说，专业文化将成为一种“半市场文化”。自娱文化在其活动条件方面，也间接受制于文化市场的活动规律。因此，未来文化的发展，不仅要受社会主义文化基本规律制约，要考虑社会效益，同时也会受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调节，需要尊重价值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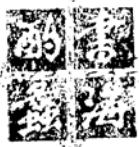
四是对文化经济结构的再认识。我们必须充分预见到，改革与开放以及一国两制这些重大国策对新时期文化经济结构形成的影响。正如在经济领域，新时期的经济结构并不是只有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份，而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包括个体经济、合作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甚至个别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复合经济结构。在文化领域，最终也会形成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文化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将包括国家主办的、企业兼办的、集体合作办的、个体经营的、社会专项基金办的、中外合资（合作）办的复合结构。在内容上，在坚持以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内容的文化为主导的前提下，人类历史上健康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各类文化，只要不是反动的，淫秽的，违反我国政策法规的，都可以为新时期文化所容纳。

向文化新发展阶段过渡的关键导向因素，是专业文化资源开掘、改善和合理配置。

第一，要打破专业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自娱文化之间的阻隔，推动前者向后者渗透、融合，改善群众文化和市场文化的素质，提高文化消费主体的文化水平。第二，在促进专业文化下渗、消肿的同时，促进专业文化以及整个文化生产力的提高。要形成一支具有较强文化生产能力的专业队伍。在当前，尤其要突出抓好创作队伍建设，否则，提高整个珠江三角洲文化素质便成了一句空话。第三，建立大教育体系，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突出加强普通教育中的美育教育。要从幼儿园、小学抓起，从新一代开始全面改善珠江三角洲文化发展的主体基础。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工程。现在，北京、上海、天津已开始注意把精力大量投放在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全面教育上。近几年，珠江三角洲通过文化市场渠道以及青少年宫等，已开始这项基础战略工作，但与内地有较大差距。要使它逐步变为一项有领导、有规划的自觉的文化工作。第四，要逐步发展和完善文化市场机制，疏通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的流通网络。这是优化文化资源配置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要完善文化立法，使文化市场活动纳入法治轨道。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硕城



《曹植集校注》志疑一则

熊清元

《校注》于《愁霖赋》后按云：“《艺文》卷二载曹丕、应场《愁霖赋》。丕赋句云：‘脂余车而秣马，将言旋乎邺都’。丕不称邺为魏都或魏京而称邺都，似在曹操尚未为魏公时。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观《朔风诗》、《王仲宣诔》可证。则此赋之创作时期，必在建安十九年之前可以推知。”

元按，此说不确。曹操建安十八年五月为魏公，但邺下文人包括曹丕，在建安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中，依然有称邺为邺都或邺城的，并非如《校注》所云“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请看下面的例子：

“公命临淄，守于邺都。”（杨修《出征赋》）

“翊日浮黄河，长驱旋邺都。”（曹丕《孟津诗》）

“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王粲《从军诗五首》其一）

“拊衿倚舟楫，眷眷思邺城。”（同上，其二）

“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同上，其四）

其中，杨修《出征赋》、曹丕《孟津诗》分别作于建安十九年和建安二十年，（说详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张可礼《三曹年谱》）王粲《从军诗五首》其一作于建安二十一年，（说详《魏志·武帝纪》裴注）其二、其四作于建安二十一年，（说详《文选》李善注、俞绍初《王粲集》附《王粲年谱》、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

曹植《朔风诗》、《王仲宣诔》中称邺为魏都或魏京，固然是曹操为“魏公以后”，但由此而反推，说凡是称邺为邺都或邺城的作品都是作于曹操为魏公以前，那是不可靠的。因为正定理成立，逆定理却不一定都成立！正确的结论应该是：称邺为魏都或魏京是曹操为魏公以后的事，而以邺城、邺都称邺，则不拘前后。弄清了这点，《校注》对《愁霖赋》写作时间判断之误，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广东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战略决策

曾志云

广东经济经过七年的成功改革，面临着新的形势。如何评价已经形成的基础，判断因新旧管理模式的磨擦所构成的特殊势态，从而选择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战略，对广东的经济和社会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发展，顺利地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迈进，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近年的经济成就

1979年开始，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和开放的步伐。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和分配制度等方面改革的实质性进展，以及外来资金、技术设备和消费模式的强烈影响，使社会机制与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由以积累为中心逐步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由“封闭型”经济体制逐步向“开放型”转变。预示着广东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同时，我省充分利用面临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迅速迈开了对外开放的步伐。随着一系列优惠政策的贯彻，涉外法规的健全，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利用外资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1979年到1985年间，全省签订各种形式利用外资合同6万多宗，合同规定利用外资9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8.6亿美元。随着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外来的消费模式、生活节奏和管理技能对我省的经济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促进了新旧体制管理模式的“裂变”。

社会机制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大量国外资金、新技术设备、新观念的流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释放了长期压抑的经济潜能，从而引起了经济的全面繁荣。从1979年到1985年间，广东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2%，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2%，分别比1978年以前二十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提高6.3%和6.7%，并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显示出高速度的特征。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最突出的是第三产业的扩张，先导产业的形成和对外贸易地位的提高。

从1978年到198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5.8%上升到27.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例由12.2%上升到15.9%。虽然从总体上看第三产业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六年的时间里，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1.7%，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例提高3.7%，这个速度已基本接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

济高速增长阶段的情况。以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四个西欧主要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例，在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平均每年上升幅度约在0.4~0.8%之间。这种情况表明，适应生产力迅速提高的需要，产业结构调整 and 就业结构再组合，使大量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标志着广东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已逐步进入更高的层次。

1985年与1978年比较：广东电子、日用机械制品、日用金属制品三大耐用消费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7.5%提高到18%；纺织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6.8%提高到10%；建筑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6.8%提高到12.8%。这些产业的迅速扩张，带动了化工、金属加工、缝纫、建材等一大批配套协作行业，促进了整个物质生产领域的蓬勃发展，逐步成为左右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1979~1985年间，广东地方进出口贸易总额平均每年递增20.8%。到198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5%，比1978年的12%提高3%。其上升幅度已基本接近高速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在1966年~1980年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平均每年上升0.4%。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标志着广东经济已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封闭状况，开始向经济国际化演进。

二、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倘若从整体来考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东近七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内外市场商品竞争和技术突飞猛进的挑战，而且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脆弱，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近年，与消费品工业发展相比，基础工业基本处于徘徊的状况。“六五”期间，新增大中型火电装机容量仅82.5万千瓦，钢铁、化工原料等生产能力增长缓慢。目前据有关资料匡算，全省平均缺电30~40%。增长格局的严重失衡，对当前企业生产已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企业因能源和原材料不足导致“开四停三”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

在基础行业停滞不前的同时，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的问题已不可避免地提到决策日程上来。目前广东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约占1.8%，企业平均占有固定资产仅108万元，技术装备水平相当落后，以机械行业为例，精密、大型、高效的设备只占设备总数的4%左右，大大低于上海、江苏等省市。近年的产品质量、新产品开发和企业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情况，也远远不如先进省市。由于企业规模过小，尽管当前的改革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仍极其有限。于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要求的压力下，大量新建项目纷纷上马。问题的另一方面，近年广东固定资产单位投资规模小型化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1985年广东省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施工项目6,286个，其中大中型项目仅占0.9%。这一趋势意味着，今后的经济振兴，将要建立在分散众多的小型企业的基

上。而且，由于新建项目小型化，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低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增长与新建项目之间就自然形成一个循环过程，从而阻碍了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阻碍了企业的技术进步。

上述问题的产生，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新旧管理模式的交替时期是相一致的。财政分级包干，扩大企业留利水平，下放投资权限，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既定方向。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财政分级包干后，省级财政无法承担支持基础产业发展的任务。1985年，省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仅占地方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6.5%。大量的投资来源已转向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筹。由于我省工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财政积累的减少和企业拥有资金的增加，直接意味着单位积累资金拥有量的小型化和建设资金的分散化。与此同时，引导资金流向的投资机制还不健全。在消费需求对生产和投资强烈刺激的作用下，投资职能的分散必定导致资金、技术规模弹性较小的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和单位投资规模过小，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技术进步。

由于基础产业发展缓慢，广东生产建设所需的主要物资日益紧张，加上近年大量引进各类生产装配线，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增加了经济发展对外汇的依赖性。在1979年到1985年间，外贸出口总额每年平均增长11.7%，比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低1%，不适应外汇需求的增长。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几年来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基本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农副土特产品仍然是以传统的品种为主，轻纺工矿产品仍然是以初级低档产品为主。由于品种改良和质量提高进展不快，在港澳市场的农副产品已经受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强烈冲击，而原料性工矿产品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需求量日益增大，可供出口的资源会相对缩小。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出口将会产生战略性的困难。

问题根源于支配外汇使用流程的内在调节机制不完备。目前我省实行的外汇分级留成制度，实际上是利用外汇特有的收益效应，刺激企业和县市的创汇积极性。近年的实践表明，预期效果是显著的。但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个突出的弊端又逐渐显露出来，就是大量外汇分散在企业 and 县市手里。由于外汇缺乏市场机制的渗入，资金缺乏横向流动性，外汇短缺和资金沉淀的现象同时并存，致使省市县和企业各级都觉得外汇严重不足，难以组织企业的技术改造，从而使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迟迟无法提高。另外，外汇管理体制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外汇的多头管理，进一步助长了外汇分散使用的趋向。

另一方面，由于在主观上对外贸出口的潜在威胁重视不够，偏重于追求近期利益，从而导致大量的外汇以补亏为名用于经商谋利。正是这些原因，近年来能连续几次掀起大规模进口洋货的风潮，而无法推动一次象样的技术改造运动。事实上，我们的外贸生产企业，专业化程度低、技术设备落后等问题已到了十分急迫的地步。据粗略的估计，轻纺、电子、化工产品的生产成本与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要高30%以上，有些产品甚至高达一、二倍以上。经营上的舍本逐末，阻碍了用汇与创汇良性循环过程的形成，使出口产品结构滞留在低技术层次上。

三、今后的战略选择

“七五”期间，我省必须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同时，打好基础，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务是艰巨的。对于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的战略选择，往往会对未来较长时期的经济成长道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作为选择的宏观思路，既要充分考虑已经形成的经济基础，又要能为将来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战略思考的第一条主线，是如何把握先导产业与基础产业的关系。我省经过近年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已形成了以家用电器，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纺织等行业为中心的轻型结构。从历史上看，大国靠轻型结构振兴经济尚无先例，但作为一个省来说，有许多因素与一个国家不同，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经济联系的紧密度来看，应该说广东靠轻型结构振兴经济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围绕广东先起步的轻型产业，零部件、原材料、能源等配套协作行业要延伸到什么程度才算比较合理，是主要靠省外、国外进口，还是主要靠省内解决。考察日本的经验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经过战后几年的发展，日本在整个沿海工业地带形成了四大经济区，虽然各经济区都有其特点和优势，但据统计资料反映，京滨、中京、阪神三大经济区内的运输货流量，约占全国总数的85%以上，而三大经济区之间的货流量仅占1.5%。也就是说，各大经济区内都形成了相对稳定和健全的经济体系。日本的经验表明：在一个大范围的经济区内，围绕某些先导产业相应建立一定规模的基础产业是必要的。因为在现代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要求下，没有相应规模的基础产业，就难以支持先导产业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和质量提高。从当前广东的情况看，邻近的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省区，无论经济基础、开放度，以及人才、信息等资源条件均比不上我省。这就更加要求我省必须建立一个雄厚的基础产业。

战略思考的第二条主线，是如何把握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不少同志认为，广东应该选择“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必须考虑如下事实。首先，广东是拥有六千多万人口的省份，已经远远超过国际上划分发展中国家大国的标准，本身就有十分广大的消费市场，不可能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不顾而把主要力量经营国际市场。其次，国内的价格体系，金融体系和外贸体系还远没理顺，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条件并不成熟。因此，至少在可以预见到的时期内，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否定对外贸易在我省经济中的突出地位。这主要是受下列因素决定的：第一，对外贸易已成为我省经济的重要支柱，它的兴衰将直接影响全省经济的稳定。第二，我省经济刚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客观上需要大量的外汇来改造建设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第三，我省是全国的主要口岸之一，势必要担负国家较重的出口任务。因此，在否定“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仍必须把对外贸易提高到突出的战略地位来考虑。

综合上述分析，大致可以形成我省“七五”或更长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模式：进一步推动业已形成的以耐用和半耐用消费品为主的先导产业的发展，迅速完善与其相适应的基础产业。加强出口创汇能力，把外贸出口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在的问题是，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前面分析的两大难题。由于投资机制的不完善，难以集中大量的资金加速国民经济基础性的建设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由于外汇机制的不完善，难以实现用汇与创汇的良性循环过程。但要建立和完善投资和外汇机制，必须解决价格、税率、利率等外部条件，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也不是一个省的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那么，在不能从机制上彻底抑制上述难题之前，采取什么综合治理措施，就成为我省“七五”时期最为艰难，也最为迫切的问题。

以基础行业投资不足和企业技术进步推进缓慢均与现有企业规模过小有直接关系为出发点，设想通过大范围地推动企业的横向联合，形成有实力、有眼光的投资主体，形成既能承担大规模投资，又能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专业化分工的新型企业集团。从而强化企业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使现有企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和发展，能基本适应当前市场需求的扩张和结构的变化。这样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社会资金用于小项目的建设，使政府既可集中必要的资金发展基础产业，又不致于过分地影响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

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生产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横向联合就开始出现，但到目前为止，企业联合主要还是采取比较松散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联合显然不能满足上述设想。必须按照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协作的要求，使企业重新改组联合，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合并一批企业，统一计划、统一管理，把原来小而全的生产企业，改造为专业化生产厂，实行科研、设计、生产一条龙，使企业群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问题的关键是选择什么途径来推动企业联合，才能达到强化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目标。如果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迫使企业合并，由于政府部门难以掌握科学的标准，无法使企业形成合理的配置，这就很容易使企业的联合仅仅停留在形式上，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且这种做法也违背了当前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然而，如果仅靠一些保护性的条例，放手让企业联合自然发展，又不容易冲破条块分割的矛盾。因此，如何综合运用经济和技术政策，便带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我省近年运用经济杠杆的实践中，不难发现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能否设想通过信贷和财政政策与技术政策相结合，对现有企业形成一种压力，使企业感到只有联合、改造、提高技术水平才有出路。首先，银行对联合企业发放技术改造贷款，要采取积极态度，在对联合企业优先贷款的基础上，根据技术改造的先进程度和企业联合的困难程度，分别实行低息、无息或贴息贷款，并可以采用税前支付、延长还款期限等办法归还贷款。财政税收也要根据同一原则，规定不同税率。对

技术落后，产品老旧的企业，要严格限制贷款，提高税率，使这些企业不通过联合来改造就无法生存。其次，制定相应的技术政策，鼓励科研单位与企业的联合。对批量较大的产品类别，要明确技术界限，限期淘汰老旧产品。同时，建立相应的信息指导系统，加强政府部门的协调和监督管理，以防止一哄而起的现象。通过这些措施，把企业的联合导向以提高技术水平为目标的轨道中，并促使不必实行联合的企业也把提高技术水平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结构为出发点，改革外汇分成制度和外汇管理制度，逐步形成用汇与创汇的良性循环。

推行财政补贴与外汇分成双轨制，尽可能集中外汇，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创汇能力。从利用收益关系刺激企业积极性的角度来分析，外汇分级留成制度并不是唯一的办法。由政府财政对出口产品从生产到销售过程给予一定的补贴，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方式。在当今世界上，要想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找其外贸和财政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的例子恐怕是困难的。在我们现存制度的条件下，这种公式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政府可以集中大量的外汇，有步骤地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从而以此为突破口来建立用汇与创汇的循环。然而，完全由财政补贴取代外汇分成制度，目前的财政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的。作为过渡性的措施，能否设想实行财政补贴与外汇分成并行的制度，在减低企业外汇留成比例的同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从而在不降低企业收益的基础上，集中部分外汇资金来统筹使用。

有限度地开放外汇市场，实行双层双轨制，提高外汇的使用效率，避免外汇使用上的过于分散。省集中的外汇，以计划分配的形式，主要用于保证重点改造和建设项目；市县一级的外汇，主要用于经营必须的进口物资；企业留成部分由省中行实行完全的市场调节。同时，切实加强对进口消费品和物资的直接控制，防止再度出现大规模进口洋货的风潮。

改革当前省统筹外汇水平法的分配倾向，从部分产品入手，逐步扩大用汇与创汇循环的范围。我省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决定了出口产品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由粗制品为主向精制品为主的转变。当前高收入国家和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受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影响，正积极开发和经营尖端技术产品，必然会放松一部分中级技术层次产品的竞争。适应国际市场的这一变化趋势，我们必须立即选定几类产品，集中力量加速其技术改造，争取在短期内有个别产品占领大部分国际市场，形成强大的创汇能力，为下一步大范围地改造出口创汇型企业提供必要的条件。

（1986年7月）

作者单位：广东省计委
责任编辑：高伟梧

特区经济发展方向和商品流通

何佳声

前阶段对特区的种种异议，较为集中的，就是在特区流通领域；所谓政策变化也比较集中在流通领域中反映出来。我认为，对特区建设的异议也好，或对流通领域的异议也好，都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我国特区建设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纠正失误，进一步发挥其特殊的地理优势，鼓励和发展正常的商品流通，限制和取缔非正常的商品流通，把我国特区建设成为以工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为此，我谈几个有关的问题。

（一）特区经济的发展方向

“外向型”，还是“双向型”？具体地说，就是指特区企业的产品流向问题。从求同存异观点来看，这两者无实质性的分歧。因为主张“外向型”的，侧重从特区发展方向上去论述，但也不否认目前特区产品内销比重大的“内向性”的现实，认为即使将来特区企业产品的外销值占其总产值的70%以上，尚需要有30%的内销；而主张“双向型”的，则着重从特区应发挥“两个扇面”的战略功能作用去论述，但也赞成以“外向型”为主。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特区发展方向、特区的战略功能作用和特区发展目标，这几个既有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概念，需要弄清楚。我认为特区经济的发展方向，指的是特区经济的发展，应以何为导向，是向内、还是向外。特区的战略功能作用，指的是我国政府试办经济特区，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应起何种功能作用。特区的战略发展目标，应从各特区经济特点出发，扬长避短，选择各地区最佳经济效益的具体发展模式，包括其发展目标，合理地配置其产业结构和实现其发展目标应采取的对策等等。目前我国四个经济特区，就其发展的方向而言，都要求向“外向型”经济发展。但发展的具体目标来说应各有差别。例如深圳特区的战略发展目标，确定为“外向型的，以发展先进的工业为主，工贸并举，工技贸结合，多功能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深圳特区所确定的这个战略发展目标，就不一定完全适合于其他三个特区。如汕头特区的农业、水产业及其加工工业具有特色；珠海特区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向型的农、渔业近年来也有很大发展；厦门特区的金融业和自由港地位已显出征兆。可见，把“外向型”作为战略发展目标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只有特区的共性，而失去各自的个性。因此，把外向型作为特区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其有别于内地城市“内向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取的。我国政府对设置经济特

区的战略功能作用,也有别于外国的经济性特区。无论从过去的“学习、观察、试验”的六个字,还是目前的“四个窗口”、“两个扇面”、“一个枢纽”的作用,都是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去构想的。因此,“双向型”实质上是指特区应发挥的战略功能作用,它毕竟不能替代特区经济的发展方向,更不应把它作为各特区的战略发展的目标。

(二) 特区经济的产业结构

是“以工为主”,还是“以贸为主”?这主要指的是深圳特区。深圳特区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确实先发展了商贸和房地产业,其经济也是靠商贸和房地产支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其奠基阶段,“以贸为主”也是事实。但以此推论出深圳特区应发展成为外国自由贸易区的模式,这既不符合我国政府办特区的战略功能作用;也不适应与香港这个国际化城市相协调发展。但另一方面否定特区商品流通对特区建设作用的观点,也有其片面性,均非求实的精神。这里有个问题必须弄清:即必须严格区分正常的与非正常的商品流通的界限。我认为,所谓正常的商品流通,指的是按商品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发展有利于全国现代化建设和特区经济繁荣的对内、对外的商品流通;所谓非正常的商品流通,指的是违反政策的逃税、漏税、走私、炒买炒卖和黑市交易。这里也有个局部利益服从于全局利益的问题,有些商品流通从特区或企业的局部来看,是符合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似乎也是正常的;但全局来看,是“损了国家利益”,“肥了自己、瘦了国家”,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的利益。在前一个阶段,特区的有些企业,热衷于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两个阶梯形的落差”,把后一种商品流通当作赚钱最省力的途径,从而在特区曾一度出现“全民经商”。对此,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特区,一个新经济开发区,有了开放的权力,不把整个经济结构和产业功能转到外向型,不搞工业,看来利小弊多。袁庚这段“忠言”,也可以说是这位企业家在开发蛇口工业区,就如何处理工业与商业关系上的实践经验总结。

我认为,从我们办特区的战略功能作用来看,特区的产业结构,必须以先进的工业为主,不搞先进工业,不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如何发挥特区的“四个窗口”、“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要搞先进的工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其难度比搞商贸大,但从我们办特区的战略要求,必须去爬这个“坡”,否则就失去办特区的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以先进的工业为主”,并不意味着商贸不重要。在特区发展的初期阶段,需要以贸易为导向;特区工业的发展,也需要通过贸易开拓市场、传递信息,提供原材料;就是把先进的技术引进来,不发展商贸,产品如何打出去,先进的技术又如何向内地转移呢?因此,特区应该重视商贸,才能更有效地通过流通领域,起对内、对外的辐射作用。但在特区建设发展的不同阶段,商贸的内容,也应有所不同。从一般商品的转向技术产品贸易,从制成品贸易转向原材料、元器件贸易,有其客观必然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以

为刘国光把“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工技贸结合”作为深圳特区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是可取的，也是符合深圳特区实际的。

（三）商业发展速度问题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快，是否意味着经济“表面繁荣”、实际“萎缩”？近六年多来，深圳特区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幅度确实是很大的，1985年比1979年增长了21.36倍，年平均增长为66.57%，而同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6.34倍，年平均递增率为59.3%。从绝对额来看，在1982年以前，两者差额不大；1983年，前者比后者多4亿元；1984年其差额又缩小了，前者比后者只多了一亿多元；1985年却反过来，后者比前者多了一亿多元。

随着当代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广泛发展的情况下，即使保护主义盛行，但贸易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似乎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依据“国际开发银行”有关资料分析，全世界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950年到1970年间为5.1%，1970年到1980年间为3.8%，1981年到1990年间预测为4.3%；而世界进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率1965年到1980年间为6.9%，1981年到1990年间预测为6.8%，说明了世界贸易的增长超过了世界生产的增长。我国自从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基本国策以后，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也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得快，1985年与1978年相比，年平均增长率，工农业总产值为12.85%，社会商品零售额为15.95%。香港，1984年与1961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为9.7%，而同期对外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8%，转口贸易为21.26%；1983年香港国民生产总值为1050亿港元，而当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为1068亿港元，两者的差额为18亿港元；198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比国民生产总值多1.47倍；1985年前者又比后者多1.57倍。厦门特区经济的发展，是1984年2月，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特区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把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实行类似外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社会商品零售额比工农业总产值的增幅也快。1984年比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9倍，年平均递增18.69%，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2.4倍，年平均递增19.1%。1985年比1984年，前者增长48.8%，后者增长55.4%。可见，随着特区建设的发展，搞活经济，社会商品零售额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幅度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虽然，在特区的发展进程中，也曾出现市场不景气的现象，如1982年的上半年和1985年底到1986年的第一季度。这是特区产业结构性和政策性的调整，把“过热”冷却一下，自觉地调整各种比例关系，使特区经济更加平衡协调和健康地发展。过去特区对进口消费品转销内地的贸易量过大，合理地调整某些贸易政策，限制进口消费品转销内地，使特区的商品流通，更符合我国政府办特区的战略要求和全国的利益，也是必要的。但深圳特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及其战略功能作用决定着，它既不是外国“出口加工区”和“自

由贸易区”的模式，也有别于内地城市“内向型”的模式；而是联结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枢纽点和桥头堡，具有对内、对外辐射作用的全方位开放，以“外向型”为主的市场模式。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商品零售额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快，也是正常的。

（四）建设特区的指导思想与具体措施

是放还是收？对特区的商品流通，是继续搞活，还是把它管死？近几年来，深圳特区在坚持不是收、而是放的根本思想指导下，在搞活商品流通方面，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广泛地组织商品货源，逐步开放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改革价格体系，初步形成了计划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等多种价格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多层次的横向经济联合；实行内外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工农贸、技工贸相结合的流通网络和流通体制。但由于流通体制改革既不配套、也不完善，特区政府职能部门，难于行使对全市商贸企业的统一管理，有进出口权的单位和企业过多，进口消费品宏观失控，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非正常的商品流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国家必须加强对特区商品流通有效的宏观指导，努力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为此对搞活特区商品流通，提出如下拙见：

（1）进一步改善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管理办法。这两种办法，实践说明对统一对外，调整出口贸易渠道，避免多头出口、削价竞销均为有利。但目前的管理办法，手续繁琐，既不适应国际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一定的矛盾。且配额指标多变，实行许可证的商品不断增加，不利特区企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如深圳特区始终重视鲜活商品的出口基地建设，生产有很大发展，扩大了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但1986年有关部门给深圳主要鲜活商品配额，活鸡占其生产能力的79%，塘鱼占24%，蔬菜占28%，活猪占58%。俗称为“五斤三两”，即每亩菜地每天只能出口五斤蔬菜，每亩鱼塘每天只能出口三两鱼。这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有些产品本来不要许可证，且国际市场又需要，特区已按外向型经济的要求，发展了这些产品，有的已挤进国际市场，但有关部门不断下指示，逐步扩大许可证商品范围，把原许可证外的商品列入许可证范围，无法出口，企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打击，国际市场又被别人占领。如汕头特区生产的“三A”冻对虾，已打入远洋市场，且能卖好价，可因领不到许可证，而延误时机。因此，对上述两种管理办法，有改善的必要，按照统一对外的原则和特区外向型经济的要求，似应放宽限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如外贸出口配额也以“块块为主”，指标单列，由中央有关主管部“切块”下达，授权特区政府发证，以便发挥特区地理位置、信息灵、运输方便、换汇成本低的优势，把更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

（2）发展特区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系，是发挥特区辐射作用的重要经济措施。发展特区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是把特区有利的地理位置与内地丰富的资源、人才、技术等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更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把更多的外国先进技术、市

场信息和管理经验向内地转移。前不久，赵紫阳同志也曾指出：在流通领域里，要试办一些跨地区和部门的工商结合、农商结合和农工商结合的新型商业，增加一些新的渠道，新的商业形式。在新形势下应认真研究解决流通不畅的问题。近几年来，特区与内地已采取跨地区、跨部门的多层次、多种联合形式，如工商、农商、工商贸、农工商、商商、商贸的联合；有的是合资、合作经营；有的为“松散型”的、一笔笔生意联营；有的为内地企业，代进代出业务等等。这样，有效地挖掘内地资源潜力，加速内地企业技术改造，促进内地生产的发展，扩大出口能力，提高后方经济效益，均起了积极作用。特区有进出口权的企业应更注意与各省、市传统的外贸企业联合创办进出口业务。这样，既把特区的进出口业务作全国有计划对外贸易的有益补充，也使特区的进出口贸易的渠道更加畅通。看来这是一条很有益的经验。发展特区与内地的经济联合，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但在前阶段，特区与内地经济联合，特别是代理进出口业务方面，也遇到种种困难。如领取许可证和外汇资金使用审批手续繁琐，贻误了商机。看来许多束缚应解开，关卡也应冲破，并应在政策上保障和切实解决由于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条块分割，而使流通不畅的问题。当然，这种联合也必须在扬长避短、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下，依据流通效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选择最佳的联合形式。在利益的分配上，特区要更多地照顾内地的需要和要求。这样全国支援特区建设，特区为全国服务，就更有实际意义。

(3) 创造条件吸引外汇购买力，促进特区市场全面和稳定的繁荣。深圳、珠海特区具有吸引外汇购买力的独特优势。依据过去几年的经验，特区市场虽为微型的、地方性市场，而社会商品零售额能如此迅速的增长，说明了它又是一个能吸引海外买力极大的潜在的创汇市场。深圳特区社会商品零售额的高峰期的1985年为27.78亿元，按购买力的构成，以内地流入的占50%、当地占30%、境外流入占20%估算。当年内地进入特区的人数为一千多万人次，每人每次在深圳购物为138.9元；同样，当年境外进入深圳特区也近千万人次，每人每次在深圳特区的消费额仅为55.56元，也只得一百多港元。因此，按照特区为外向型经济的要求，今后特区的市场主要服务对象应转向境外。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使特区的花色品种适应社会需要，价格比内地和香港市场低廉，做到以优质价廉取胜。沙头角镇内区区二平方公里的土地，虽有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优惠待遇，但在创办特区的初期，基本上是居民区，后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区，商品流通活跃、顾客盈门、市场繁荣，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品花色品种新颖、价格适宜。为此，我认为，虽然不应把深圳特区建成沙头角镇那样“贸易型”的模式，但从搞活流通，繁荣市场的角度来看，其经验还是可取的。再次，始终坚持“以工业为主”的蛇口工业区，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4.58亿元，人平2万多元，如没有相当一部分的购买力，从内地和境外流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可见，即使未来深圳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商贸始终不应忽视。我以为目前深圳特区已初具了更有效地吸引外汇购买力的主客观条件。如管理线开始启用；除了国家限制进口的商品外，投放特区市场的商

品，在额度内以减半征收关税的优惠；特区国营商业已积累了吸引外汇购买力和组织货源的经验。现在着重点应放在整顿企业，培训人才，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研究市场信息，努力提高服务质量，降低销货成本，以商品新颖、优质、价廉，吸引境内外外汇购买力。可先试点设立若干个专业性较强的、全国土特产品和工业品贸易中心，为逐步创造条件向免税区和购物中心发展。

(4) 改善宏观指导，继续搞活特区企业。深圳特区过去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增强企业活力。后来由于全国性信贷膨胀，特区基本建设失控，盲目进口洋货，造成目前企业经营严重困难。主要是，库存商品积压严重，银行利息加上逾期贷款加息，企业负担沉重；特区企业，不仅要善于创汇，更要善于用汇，但由于用汇审批手续繁琐，外汇资金周转不灵，往往丧失了有利的商业时机；由于结构性和政策性调整等原因所形成的市场不景气，销售额和利润率普遍下降，费用增大。这个困难虽发生在企业，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宏观失控，而不在于微观搞活。如就进口消费品积压而言。据深圳有关部门，1985年10月对进口消费品积压问题，进行摸底排队说明，属中央有关部门审批进口的占42%，属省有关部门审批进口的占25%，属市审批进口占27%，使用外省进口指标的6%。这个数据有力地说明，进口消费品严重积压，是宏观经济失控的结果，而不是微观经济搞活的必然性。再者，加强外汇资金管理是必要的，但把企业所必要的外汇资金控死，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也就难于发挥其活力。当然，也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财务管理混乱以及各项制度不健全有关。因此，在加强国家对特区宏观指导和建立特区自我控制体系的宏观管理的前提下，应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精神，把《决定》中有关增强企业活力的规定，授予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有权力。特别应授予那些集团式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必要的外汇周转资金的使用权。这些集团式企业已构成深圳特区经济的重要支柱，不少集团式商业企业已在对内、对外经营活动中发挥主渠道作用，政府只要宏观控制住，搞活特区市场就有牢固的基础。对目前集团式企业普遍发生经营困难，政府应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解决。由于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特区的工业生产和财政收入均有所增长。1986年1—5月，汕头特区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1.19倍，深圳特区也有所增长。同期，汕头特区的财政收入增长48%，深圳特区也增长8.5%。正常的贸易、出口贸易，特别是挤进远洋市场的贸易额则有更大的发展。如深圳外贸集团公司，1985年挤进远洋市场的贸易额仅占其出口值的1.4%，今年上半年已上升为8.8%。出口商品结构和内外资出口比重也发生变化，出口商品结构，工业品的出口值占88%，农副产品占11.7%；内资企业出口比重上升为59.5%，“三资”企业下降为40.5%。这些变化再一次说明，只要我们的政策符合特区经济发展实际，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责任编辑：高伟梧

论全民所有制改革

杨昌俊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而全民所有制改革则是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它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过去我们在理论研究中，一方面确认计划商品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模式，另一方面又避开构成计划商品经济基础的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在应用研究中，我们偏重于研究宏观经济的运行与控制，且往往单纯就控制本身来研究与改善控制，而不把重点放在控制所依附的所有制基础上。由于所有制基础不健全、不完善，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影响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展的关键性因素。为此研究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全民所有制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民所有制是所有制结构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证。

(一)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层次结构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次，即企业必须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建立与完善市场体系；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转向间接控制为主。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必须相互配套，不可偏废。

但是这三个方面的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功能并非完全等同。

在微观方面，企业是劳动者与物质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领域，是社会生产力的具体发挥者与社会生产关系直接体现者，是振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依托。发挥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企业体制改革的功能就是要把企业真正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使企业真正具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与自我发展的能力。企业是否成为商品生

产经营者，是关系到商品经济是否得以存在的前提。

在中观方面，市场反映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分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协作与交换关系，它的广度与深度都依赖于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发育程度。企业从内部孕育着市场，市场从外部媒介着企业。市场体制改革的功能就是创造媒介企业之间协作与交换关系的优化条件，在以内促外的基础上以外促内，做到内外结合，相互促进。

在宏观方面，按照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以市场为直接控制对象，并通过市场机制间接控制企业行为。市场机制的完善度决定间接管理的有效度。宏观体制改革的功能就是以市场为媒介，使国家计划目标与企业自立行为更好地衔接起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从上述三个层次的功能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经济体制整体改革中，微观（企业）改革具有基础性功能，中观（市场）改革具有媒介性功能，宏观（国家经济管理）改革具有协调性导向性功能。一般来说，微观改革是中观、宏观改革的前提，中观改革是宏观改革的前提。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企业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是全民企业的体制改革。全民企业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企业内外权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它体现所有制内涵的具体变革。在我国，国家是全民所有制的人格代表，国家经济管理是国家经济职能与全民财产管理权能的合并使用，从这一意义上说，宏观体制改革也是全民所有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整体改革中项的市场体制改革，则受到微观、宏观上下两项改革的双重制约。这一切说明，全民所有制改革是关系到各个层次改革的头等重要问题。

(二)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部结构来看。经济体制总体包括所有制结构、利益结构、决策结

构与运行结构等要素，在改革中必须掌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抓住根本，带动全局。

所有制结构是指各种所有制内部组织结构与外部并存（或交叉）结构，因而所有制改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各所有制内部权益关系，二是改革各所有制外部比例关系。所有制作为经济体制的基础，它的性质与结构型式决定经济体制模式。

利益结构是各种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组合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所有制是经济利益的形成基础，它决定经济利益的性质，比如所有制结构的层次性与多样性，决定利益结构的层次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经济利益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所有制关系得以实现的机制。决策结构是指决策权力的层次结构。决策结构依附于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制结构的法权形式——所有权结构的派生机构。例如全民所有制结构内含国家与企业权力两重性，这就形成国家与企业决策权力两重性。此外，决策结构还受制于利益结构，经济利益决定经济决策的方向与特点。运行结构是指调节与管理结构。经济运行由经济决策支配、经济利益推动与所有制决定，它是经济决策机制、经济利益机制与所有制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上分析表明，各个要素结构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其中所有制结构是基础，利益结构与决策结构是中介，运行结构是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抓住所有制改革，特别是抓住在所有制总体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比重最大的、内容最复杂的全民所有制改革，就等于抓住根本，抓住带动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链条。

（三）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实际经济生活表明，经济体制每一步骤与措施，无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所有制问题；所有制的现实形态，无不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市场体系与宏观经济管理要以企业行为合理化为前提，而企业行为合理化要以所有制完善化为基础。比如前些时期宏观上连续出现几个失控，虽然它们的直接原因是宏观控制不当，但其根源都在于微观自控失调。由于企业普遍存在资金“大锅饭”、劳动“铁饭碗”问题，形成企业“投资饥饿”、“消费饥饿”等症结，这些就是宏观失控得以萌发的土壤。不铲除滋生根源，就仍然潜伏着宏观失控复发的危险。在市场体系中，虽然市场

开放不足而障碍企业活力的发挥，但在企业仍不能对自己的经营后果承担严格责任的条件下，企业就不能对市场机制作出积极合理的灵活反应，这就使国家通过市场间接管理企业的过程受到梗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全民所有制改革，从而打好整体改革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脱离体制改革的基础，就会使改革失去必要的协调与可靠的依托，将来就有可能还要回过头来“补课”。这是我们应当尽力避免的事情。

二

研究全民所有制改革，首先必须明确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对象是什么？我们应当按照什么准则来进行改革？我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对象就是对现实存在着与运动着的全民所有制的现象形态，改革准则就是全民所有制的本质要求或客观规律，改革目的就是使全民所有制的现象符合它的本质或规律。

全民所有制概念与其它所有制概念一样，按其内部联系可划分三个层次，即本质、中介与现象。

全民所有制的本质是指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制概念，它是不以人们意志（包括法权与政策）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范畴，是全民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有认识与掌握全民所有制本质，才能在实践中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才不致于就事论事，随机而变，甚至迷失方向。

全民所有制从本质转化为现象必须通过中介，其中最重要的中介就是全民所有权。全民所有权是法学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反映思想意志关系，是上层建筑范畴，是全民所有制本质在法权上的表现形式。利用法律手段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权益关系，是全民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全民所有制的现象形态是指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直接发生机能与作用的存在形态，它反映物质社会关系与思想社会关系的统一。由于全民所有制本质转化为现象要受到中介因素的间接折射，因此全民所有制现实形态的变化不一定都符合它的本质要求。这里必须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全民所有制现象的变化符合全民所有制本质的内在要求，这是体现必然性要求的变化；另一种是全民所有制现象的变化违背全民所有制本质的内在要

求，这是脱离必然性要求的变化，它将受到全民所有制规律的“惩罚”，并最终回到符合必然性要求的道路上来。

三

全民所有制的本质或者说它的内部联系或规律是什么？这是探讨全民所有制改革首先遇到的问题。有人认为全民所有制改革是内涵上的改革，我认为这一说法还不够精确。全民所有制内涵可分为本质内涵与具体内涵，本质内涵是指全民所有制得以存在的内在本质，它是不可改变的，改变了本质内涵就等于改掉了全民所有制；具体内涵是指现实存在着的权益关系，它应当按照本质内涵的要求加以改变。

什么是所有制的本质内涵呢？我认为所有制本质内涵是指劳动者与物质生产条件相结合的模式。劳动者对物质生产条件的关系是划分各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是所有制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生产中最根本的关系。

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并非由全民所有制本身决定，而是由更高层次的规律——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所决定。因此全民所有制的本质不是从它的概念中产生，而应当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设想由全社会集中组织生产与分配，这是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中合逻辑地推导出来的结论。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一方面生产过程社会化，形成国民经济统一整体，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内部存在劳动者技能水平与基本生产单位占有物质装备水平的不平衡，在不同技术装备水平与劳动技能水平下生产出来的社会产品是难以用等量劳动交换这一尺度来计算与分配，社会劳动的统一性必须由局部劳动的差别性这一中间环节来实现。为此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性及其内部不平衡性，要求社会主义在全社会范围与局部范围两个层次内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物质生产条件，来解决同一劳动中社会劳动与局部劳动的矛盾，贯彻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实现社会生产。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内涵就是社会主义两个层次的联合劳动，它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客观性物质性，是全民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根据。

以复合（两个层次）联合劳动为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内涵，就意味着把全民所有制改革放在自

我完善的基点上，从而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论述过未来社会的劳动就是通过联合劳动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生产条件的占有，联合体是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联合劳动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点，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一）充分肯定劳动者在企业中主人翁地位是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复合的劳动者联合体本身内含劳动者作为国家主人和企业主人的双重规定性，它不象单层次全民占有的内涵，把劳动者在企业中主人翁的地位架空。企业体制改革要以复合劳动者联合体为根据，让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使劳动者真正把企业看作自己的经济组织，使企业意志与劳动者意志统一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二）充分发挥企业活力是企业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目前人们常把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使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经营者，这一说法仅表明全民企业与其它企业在商品生产形式上的同一性，而没有表明它们在社会经济本质上的差别性。我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根本区别是联合劳动组织还是资本组织，正是由于全民企业是第二层次的劳动者联合体，因此在社会分工前提下，它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所以全民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是双重的，即既具有劳动者联合体的经济本质，又具有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经济形式。只有充分发挥劳动者积极性与商品生产的积极作用，才能充分释放企业活力，实现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双重目的。（三）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复合的劳动者联合体既管理微观经济，又管理宏观经济。国家不仅是政治机器，同时是全社会劳动者联合体。国家作为政治机器的经济职能与国家作为全社会劳动者联合体的管理职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目前在这两种职能合并使用的条件下，人们往往只看到它们联系的一面，忽视区别的一面。应当看到，这两种职能所依据的客观规律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把属于占有性质的管理问题等同于属于单纯行政性质的经济管理问题，不能无区别地混合使用，必须适当分开，以便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特殊的功能。

四

全民所有制本质通过中介转化为现实，中介

要素包括有关全民所有制的法权、政策与其它环境条件,但有关全民所有制的政策最终都将固定为法律,其它环境条件的作用相对于法权来说较为微弱,因此在中介中最重要的要素是法权。

全民所有制本质决定它的法权形式。但全民所有制是一种内含两个层次联合劳动的特殊本质,因此它在法权上也应有相应的特殊形式。全民所有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是对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四权不可分离观念的重大突破。但是我认为全民所有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概念还不能充分表明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分离的根本区别,不能充分体现国家与企业之间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首先,就全民所有制与资本所有制两权分离的根本区别来看:(1)产生原因不同。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信用发展的结果,是资本运动与发展的某一阶段的产物,非源于资本所有制本身;而全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与社会主义信用发展无关,它产生于全民所有制本身,是全民所有制本质的必然表现形式。(2)社会关系不同。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都是资产者权力,反映剥削关系,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是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外部关系;全民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劳动者权力,反映劳动者内部分工协作关系,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是所有者内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3)分权界线不同。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权界限绝对化,互不渗透;全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权界限相对化,互有渗透。其次,就国家与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全民企业销售产品、参与投资等活动仅仅用经营权的延伸来说明似嫌不足,而适当分离的说法也常常容易模糊国家与企业之间决策权限、财务界限与财务责任,给国家机关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授以口实。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求或创造更适当的全民所有权概念或范畴来反映全民所有制的本质。过去我们常常拘泥于所有四权的传统观念,并在这一观念的禁锢下去探讨它们之间的分离。现在我们是否可以开辟新的思路,进一步从所有权本身来探讨它内部分离的可能性。在传统观念中,所有权是排他的,显然这对于私有者来说,其财产界限决无包容性,是适用的,而对全民所有制来说,国家交付企业的全民财产界限则含有包容性,企业财产是国有财产的组成部分,国有财产

是企业财产的总,因此国家与企业是同一全民财产的两个层次的占有,它们互不排斥。就国家来说,它具有绝对意义上的总体所有权;就企业来说,它具有相对意义上的企业所有权。这种全民所有权的内部分离,是可以用法律条文加以明确规范的。比如国家在总体的绝对意义上有权决定企业停关并拆迁,有权决定全民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方式,有权排除企业之间因占有物质生产条件的差别所造成的效益差异等;企业在局部的相对意义下有权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权以所有者资格参与商品、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横向经济联合等。国家与企业的权益关系应当建立在财产法律关系的基础上。

应该看到,法律在全民所有制改革中较之经济政策、经济杠杆与行政措施来说,有特别重要的带有决定意义的作用。目前全民所有制法律仍很不健全、不完善,改革全民所有制应从主体、客体与内容三方面来建立与完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产法律关系。(1)主体方面:国家作为全社会劳动者联合体的人格代表,应设立专门的全民财产管理机构,与全民企业发生授予全民财产的经济法律关系,监督全民财产的合法经营,研究全民财产使用的经济效果。(2)客体方面:所有权客体是财产,国家应在企业财产清查基础上,按照企业财产的市场价格,实际磨损与消耗程度等因素,经专门的全民财产评估机构审定,在法律上确立国家授予企业的财产数额。(3)内容方面:国家授予企业财产时,应通过法定程序,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包括全民财产所有权的实现、企业自有资金的法律地位,企业破产的整理程序与责任,以及符合两个层次联合劳动要求的国家计划管理原则与企业内部管理原则等。

总之,改革全民所有制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当从全民所有制本质出发,联系实际,加快经济立法,加强经济司法与经济监督,推动全民所有制现实形态的变革,从而增强全民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给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广东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黄循平

再生产的一个类型——缩小再生产

李 永 乐

马克思指出：“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①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据此都把再生产分为规模不变的再生产和大于原有规模的再生产两种类型。实际上，根据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还有一种再生产，它既不是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更不是在扩大规模上的进行，而是小于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即缩小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同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一样，也是再生产的一个类型。

一

缩小再生产作为再生产的一个类型，就其规模来讲，虽然程度不同，但它都是指产品数量或产品价值比上期减少的再生产。马克思把它称为“不完备的”和“有缺陷的”再生产。

这种再生产可以从年产品的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来考察。马克思指出：“年产品的价值可以减少，而使用价值量不变；年产品的价值可以不变，而使用价值量减少；价值量和再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也可以同时减少。”^②这就是说缩小再生产有两种情况：一是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的运动是同一方向、按相等的或不相等的幅度变化，这时产品的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都会减少；二是方向相反的运动、按相等的或不相等的幅度发生变化。例如，随着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等条件的提高，如果产品的使用价值量是简单再生产，产品的价值量的再生产就要缩小；如果产品的价值量是简单再生产，产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再生产就要扩大。相反，在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等条件下降的时候，产品的价值量是简单再生产，而产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再生产就必然缩小。在这里，尽管产品的使用价值量和价值量的再生产规模，在方向上会出现不一致，但是，不论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等条件是提高还是下降，只要使用价值量或价值量同上期相比是下降了，那么，缩小再生产就会发生。

缩小再生产不但会在个别企业或个别部门出现，而且还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例如，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原料等生产资料供应的减少或中断，规模较大的工人罢工，产品营销中的阻碍，协作关系的无法维持等，就会发生个别企业或个别部门的局部性的缩小再生产。当这种情形不能得到缓解，社会再生产的各种比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

(当然还有其它许多情况),就会发生全局性的全社会范围的缩小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时期就是这样。在这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再生产过程中的个别企业或个别部门出现的局部性的缩小再生产,是会经常出现的。这种缩小再生产,虽然从整个社会的全局来看,会由于社会上另外一些企业或部门生产的扩大,以致把局部的缩小部分抵销,社会再生产的规模总额仍然会表现为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这时社会再生产还不会出现全社会的缩小再生产;但是,当局部性的缩小再生产不能由社会上的其它企业或部门生产的扩大部分给以抵销的时候,就会出现全社会范围的缩小再生产。

二

之所以会发生缩小再生产,是因为“生产条件在不同的年份不是绝对不变的”,如果“再生产不是在比以前更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后者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再生产。”^③这就说明,生产条件作为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其本身在任何时候都是不断变化的,如果在一些时候,个别企业或个别部门甚至一个国家的再生产是在最困难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的,那么,缩小再生产就会发生。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由于都存在着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发生缩小再生产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而发生缩小再生产的可能性存在于任何社会。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以分散的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占着显著的优势,除客观上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外,自然条件对社会再生产的发展发生着直接的影响,缩小再生产就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农业比重大为降低,由自然条件的因素所影响的缩小再生产的可能性是大大减少了,扩大再生产已经成为它的主要特征;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的对抗性质,以及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普遍存在,这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条件,由这种社会经济条件所引起的缩小再生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却比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大大地加强了。因此,以扩大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排斥在10—11年的产业周期中某一年的生产总额往往小于前一年的生产总额,以致和前一年比较,连简单再生产也没有。”^④

社会主义社会排除了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缩小再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但它并没有消除任何缩小再生产的可能性,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例如,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并且以手工劳动和畜力操作为主的农业经济仍占我国经济的很大比重,它的状况又直接影响到轻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生产缩小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人们违反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也会带来损失,这时不仅会出现简单再生产、甚至是规模缩小的再生产;当国民经济出现严重比例失调的时候,为了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平衡各种比例关系,需要对一些长线产品加以

缩减、甚至关停并转，而对某些薄弱瓶颈环节的短线产品大大加强，这也会出现局部性的甚至全局性的生产缩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有必要适当减慢生产的发展速度，局部性的生产缩小也就会发生。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小再生产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尖锐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并且具有周期性，舍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不能进行下去。而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缩小再生产，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是不具有周期性的，它是由于客观自然条件和主观上的失误而被迫出现的一种再生产现象，这应当力求避免和减少；但是，当着国民经济中出现比例失调的不平衡的时候，自觉地进行局部的生产缩小，也是有计划调节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此，任何社会的再生产，就其规模来讲，就不仅仅是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两者的统一，而是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和缩小再生产三者的统一。在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社会再生产的规模总额究竟表现为哪一种，则要取决于它们三者之间的对比状况。如果再生产的扩大部分和缩小部分相互冲销，则社会再生产表现为简单再生产；如果再生产的扩大部分大于缩小部分，则社会再生产表现为扩大再生产；相反，如果再生产的扩大部分小于减少的部分，那么社会再生产就表现为缩小再生产。任何社会的再生产的现实运动，正是这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综合体。

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曾经一再提到发生缩小再生产的必然性，但没有展开分析，只是着重分析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这是因为，缩小再生产它既不象简单再生产那样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特征，也不象扩大再生产那样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特征，它作为一种“不完备的”和“有缺陷的”再生产，虽然是再生产的一种类型，并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一起，构成社会再生产的三者的统一，但它从来不会，而且也不可能成为某一个社会的再生产的主要特征，否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并且，由于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抽象、现实因素、基础和出发点，因此，分析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主要特征的扩大再生产，就要首先分析简单再生产，而缩小再生产则不能起到这种作用。还有，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就是分析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这就应当把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排除掉，在这里，缩小再生产“只能涉及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量的方面，但不涉及它们作为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或作为再生产出来的收入在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⑤由此可见，马克思对缩小再生产没有展开象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那样的详细分析，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并不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否定缩小再生产的存在，在实践上不会出现缩小再生产的可能。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56页。

②③⑤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38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589页。

作者单位：宝鸡师院
责任编辑：高伟梧

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

李江涛

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是与社会自身发展运动的不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因此，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将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严格地区别开来。

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初期阶段，由于新的生产关系还不成熟，而又必须承继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既存的生产力水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矛盾的发生主要是新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旧残余的斗争，以便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开辟自己发展的道路。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对立双方的，不仅有社会主义自身的因素，而且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因素。

当旧的残余被消灭掉时，社会主义社会就进入了全新的矛盾发展时期。构成矛盾对立双方的，是自身内部固有的或发展起来的成份。这时的新旧因素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因素不是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没落的东西，而是指相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已显得陈旧和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带有旧社会的“胎痕”，矛盾的发生完全属于自我运动范围之内的事。

苏联和我国哲学界，有人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发生的这两种情况，看作是不同的性质、分属于不同条件的矛盾，这样说是没错的。但是，他们又认为，旧社会的残余与新社会的因素之间的矛盾，属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当消灭了旧残余后，则只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似乎旧的残余所引起的矛盾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似乎社会主义社会是清一色的状况，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看成是一回事，否认了它的发展过程。须知，无论是什么性质的矛盾，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的，只不过在不同阶段，矛盾发生的途径、发生和发展的状况不同而已。

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考察矛盾发生的特点，是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根据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成熟的程度，可以将社会主义社会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开始阶段。与这个阶段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生产力不发达。在我国，自给经济还占很大比重。从上层建筑方面来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残余还顽固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水平都不太高。社会矛盾的发生，以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因素与旧社会遗留下的因素之间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清理废墟、清除残余，为进一步发展准备条件。这样，矛盾

的性质更多地是带有阶级斗争的特点。甚至在开始阶段的初期，阶级斗争可以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时期的阶级矛盾与旧社会的阶级矛盾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主要是阶级结构、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阶级地位发生了变化。剥削阶级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到企图重新取得失去的统治，从压迫劳动者到反抗人民民主专政，使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走向了最后阶段。剥削阶级明火执仗地、公开地与无产阶级相抗衡的现象会逐渐减少，阶级斗争更多地是掺杂在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中，或者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正确区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成为这个时期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

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矛盾的发生，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因素中形成的。旧社会的残余所引起的矛盾，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于一定范围之内，但已不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阶级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阶级差别占据了阶级矛盾的地位，阶级斗争范围缩小，社会矛盾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成为主要任务。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因素的增长和旧残余的消亡，经过初始阶段的斗争，已经开始了明显的此消彼长过程。僵持被打破，新事物表现为量的急剧扩张。新和旧的矛盾虽依然存在，但矛盾双方的比重不同、作用不同。跨越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矛盾因素，在这里已被明显地分开了。

第三阶段是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成熟和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旧社会的残余基本上已消灭，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矛盾，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旧社会的思想之间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先进思想与相对落后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大部分属于认识上的差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自身发展的一般进程外，还会同时受到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水平，直接或间接地规范着社会矛盾的发生途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衰，资产阶级势力的扩张和萎缩，也会给社会主义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渗透，从而引起其内部机能和结构的变动。这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成熟阶段有所表现，而且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所以，成熟期的完结，必须有待于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胜利，这样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成熟阶段的时间比较漫长，社会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需要作最后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虽然贯穿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阶段，但它已从内部范围转变为外部范围，斗争的方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综合以上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发生，大致有以下几个途径：

第一，事物本身固有的对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之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各地区、各单位、各民族之间，等等。这些不同事物自身存在的差别，就是矛盾的表现。这种矛盾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内在的，没有它，就不存在统一的整体，也就没有事物的发展进步。

第二，发展起来的对立。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外在的差异还不是矛盾本身，必须发展到内部差别，才能成为矛盾。列宁称矛盾的前身为“矛盾的胚芽”。发展起来的矛盾，

有的是与新事物的出现相对应的。比如，外贸事业的发展，使得外销与内销、补贴与差价、外汇上缴与留成等矛盾也较以前增加；也有的是由于原来事物不居主要地位，故矛盾也不显得突出，而当其他矛盾解决后，该事物就处于比较突出的地位，矛盾也随之发展起来。

第三，认识失误引起的矛盾。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或者思想方法简单，就容易违反客观规律，产生一系列矛盾。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们在经济建设以及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发生的矛盾，有些就与认识失误有关。

第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所带有的旧的痕迹，与新的因素相对立，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矛盾。一是旧的思想意识与新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二是旧式分工与生产发展的矛盾；三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矛盾是逐渐消亡的。

第五，受外部事物的影响所产生的矛盾。实践表明，国内的阶级敌人、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坏分子，其破坏活动常常与国际上的反华浪潮相呼应，使国内的矛盾复杂化、尖锐化，甚至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只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不结束，只要仍然存在着国际资产阶级，这种矛盾就会继续发生。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不同的矛盾程度而已。

还可以找出矛盾发生的其他途径，但主要是以上几点。前三点是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因素所构成的矛盾，它存在于整个历史阶段的任何一个时期，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后两点是社会主义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对立所形成的矛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和范围。一般说来，通过外部因素引起的矛盾都带有某些阶级斗争的性质，但大量的具体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用某个范畴来表示这两种不同途径所发生的矛盾，可以用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身矛盾”和“非自身矛盾”来进行概括。只有自身矛盾（前三点）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永存的现象，才是必然性的矛盾；非自身矛盾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说，则表现为一定的偶然性和暂时性。当然，自身矛盾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程度的提高，主观失误引起的矛盾会越来越少，人们可以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至于非自身矛盾，也并非置身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实体之外，而是指它的发生途径，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区分矛盾发生的不同途径，在理论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解决矛盾需要了解矛盾，找出矛盾发生的根源和变化发展的原因，就能够更好地把握矛盾的性质，从而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其次，通过对矛盾发生的途径的分析，可以发现哪些矛盾是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哪些矛盾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的，哪些矛盾是不断减少或消亡的，从中找出矛盾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制订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再次，了解矛盾发生的各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特点，端正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同时，搞清矛盾的来龙去脉，可以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解。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不是从对抗中产生对抗，而是清除对抗，最终归结为非对抗性矛盾。在任何社会中，都由一个最基本的矛盾派生出其他矛盾，并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因此，基本矛盾是决定整个社会矛盾性质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的对抗，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受这个矛盾制约，社会中的其他矛盾，也都具有相类似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直接后果。但是，它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同时，又将自己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矛盾的解决不但没有导致矛盾的消失或缓和，反而使矛盾处于更激烈的对抗状态。这是因为，“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冲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生产关系都属私有制，因而，其矛盾发生的途径、性质也是大致相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要不断发展，也会在生产关系上产生变化。但表现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再是阶级的对立，也不再是个人与社会的对抗，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基本一致条件下的矛盾。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不是从解决对抗中产生对抗，而是从对抗中解脱出来。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摆脱了恶性循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矛盾的发生是连锁性的。一个矛盾很可能引起社会其他部分的溃烂和衰退，导致恶性循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双方既有相适应的一面，又有不相适应的一面。由于相适应是主要的，因而它可以据此来调整、缓和、解决它的不相适应部分，不会产生“并发症”。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可测性和可控性。这主要是由社会有机性和认识水平的提高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分工和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各部分彼此之间的制约性加强，联系更加广泛；二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使得所有社会成员能够按统一的目的行动，因而对矛盾的发生条件就有可能把握和认识。正是因为对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可测性，所以也就能够在认识矛盾的基础上，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矛盾发生的时间和程度，也可以在矛盾发生之前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控制矛盾发生后所波及、作用的范围。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规律。

一般说来，矛盾在解决前有一个显露的过程。即从表面的、肤浅的矛盾到深刻化，从矛盾的“萌芽”或“胚胎”到矛盾成熟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合规律地发生、合规律地运动的，矛盾的显露过程比较正常，虚假矛盾不占主导地位。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矛盾在自我运动的过程中，常常伴有许多假象。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从矛盾的发生、发展到矛盾的最后解决，所经历的阶段特别复杂，周期也比较长，中间就有可能产生一系列假象；其次，对抗性矛盾如果采取非对抗性的表现形式，就会进一步掩盖事物的本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消除了对抗，使得矛盾的发展周期短，暴露本质的过程较简单，不可能带来大量外在化、硬化的形式。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运动，也是一个逐渐排除“残留矛盾”的过程。残留矛盾是非自身矛盾的一部分，是指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因素所引起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交错运动、互相牵制。例如虚假矛盾与真实矛盾、主观矛盾与客观矛盾、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等等。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构成残留矛盾的因素越来越少，自身矛盾和新形成的矛盾逐渐取代它们，从而显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同时也标志着社会形态的成熟。

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矛盾对立的普遍性和矛盾冲突、矛盾激化的个别性。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形态一样，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是绝对的、不容抹煞的。否认这一点，也就等于否认了矛盾本身。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自我解决矛盾的手段和条件，因而可以控制矛盾发展的程度和方向，在矛盾发生冲突、矛盾斗争激化以及矛盾性质恶化之前，使矛盾做到缓和或解决。无疑，如果不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或者对矛盾的发生和发展缺乏认识，也可能导致矛盾性质的转化、激化以至冲突的发生。但是，这些都属于主观认识问题，不具有必然性质。大量的矛盾不具备发生冲突和激化的条件。否认这一点，就很容易犯“左”的错误。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

责任编辑：巫贵均



《论语》“畏”字正解

唐钰明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邢昺疏：“记者以众情言之，故云畏于匡，其实孔子无所畏也”，将“畏”字理解为“畏惧”，其误显然。杨伯峻《论语译注》解“畏”为“拘”，译为“孔子被匡地的群众所拘禁”，意义理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释“畏”为“拘”，仍未属达诂。其实，“畏”应破读为“围”。“畏”属影母未韵，“围”属喻母微韵，二字音近相通。《韩非子·难言》：“仲尼善说而匡围之”，《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围于匡，颜色不变”，《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匡人简子以甲士围夫子”，《盐铁论·大论》：“孔子……遇围于匡”。凡此种种，足证“畏”字确系“围”字之借。对此字的训释，实牵涉到孔子生平史实的了解。《论语译注》书前《试论孔子》一文云：“孔子处于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谋害他，他无以自慰，只好听天。”在这里杨氏也承认孔子在匡仅仅是“被围”而非“被拘禁”，可见其训“畏”为“拘”，确有未安。



全国第三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讨论会论点综述

全国第三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8月2日——7日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黑龙江省哲学会、广东哲学会、大庆市社联、大庆市委党校、鹤岗市社联以及黑龙江省宣教干部管理学院等七个单位联合召开的。来自全国120余名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70余篇。会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学术民主和自由，着重就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搞活的辩证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争论比较多的几个问题简介如下：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类问题

有些同志认为，用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对范畴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重要和有意义的。但是，在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仅仅停留于这种矛盾类型的划分，是不够的。

有的同志提出，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划分为社会主义自身矛盾和非社会主义自身矛盾。社会主义自身矛盾是在社会主义物质经济基础的合乎规律的运动中产生的，是本质上基本一致的社会主义事物与社会主义事物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自身矛盾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包括：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社会主要矛盾，③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矛盾，④社会各领域中其它种种一般的社会自身矛盾。非社会主义自身矛盾是在非社会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的复杂活动中形成的，包括本质上相反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矛盾，或者本质上不一致的非社会主义事物之间的矛盾。

有的同志则认为，根据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观点，我们可以推而广之，也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

矛盾划分为非对抗和对抗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承认人民内部矛盾会出现某些对抗性质。其中，非对抗性矛盾是大量的、基本的，在矛盾总体上属于主导地位；而对抗性矛盾则是局部的、暂时的，在矛盾总体上属于从属地位。

有的同志则认为，第一种见解从经济基础入手，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互作用、交错影响的，难于实际分开。第二种分类，依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强调一下这种划分是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对抗与非对抗是普遍适用的范畴，所以目前提出这种划分，在理论上不是什么新问题。这些同志提出，应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划分为如下三种矛盾：①利益对抗型，即通常说的对抗性矛盾。社会领域的对抗，归根结底是物质利益的对抗。这类矛盾主要通过一方战胜、压倒另一方的途径来解决。②新旧是非型。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必然带有旧的影响和痕迹，同时又不断生长着新的因素。这些矛盾主要通过一方克服、改造另一方的途径来解决。③内部结构型。这往往是新型事物有机整体的内部矛盾。如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通过相互协作、相互结合的途径来解决。

有的同志还提出，利益对抗型矛盾提法不妥，应改称为利益型矛盾。因为在大量、占普遍主导地位的是人民内部在利益问题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作为利益矛盾可以从人们需要、利益不同层次结构的角度进行划分。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活力问题

对唯物史观“活力”范畴的内涵，在探索中，提出了以下几种具体表述：

一种意见认为，“活力”是作为能自主活动的有机体，构成它的诸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

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协调地形成一个具有最佳功能的系统，能使它在活动中表现出旺盛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第二种表述是：“活力”是有机体在它的机制健全的条件所表现出来的旺盛生命力。或者说，活力是有机体内部结构合理、内外关系协调时表现出来的整体功能优化的状态。

第三种表述是：“活力”是一定社会机体在总体上表现出来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旺盛生命力。它是标志社会机体结构和运行协调和良性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特别是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这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协调和良性的结构关系和运行状态。

第四种表述是：社会有机体的活力是指社会有机体生存活动和发展的能力，它表现在社会有机体的要素的素质、结构的合理、活动的协调、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效益的最佳取得等方面。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自主能力、自我更新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应从主体的人和客体的社会的辩证统一去把握社会主义社会有机体活力。从主体角度看，要考察社会全体人们、群体及个人三个层次的活力。从客体角度看，就要把握作为基本要素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文化及其结构、运转、功能和效益，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

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1.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主要有两种理解：①政治体制改革是指国家政体的改革；②主要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包括国体某些方面的改革。

2. 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问题的估计。主要有三种观点：①当前的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和经济基础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家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人事体制、干部体制僵化，法制不健全，政治生活缺少高度民主等。②当前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影响“高度民主”的建设。主要表现在：政治体制中存在着封建残余的影响和小生产思想观念，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东西，而社会主义本身仍有不完善等方面的弊端；③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不能全盘否定，应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该肯定的部分应当肯定，该否定的方面应当否定。现行政治体制是以片面的高度集中为特点，因而基本上是一个僵化的体制。

3.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主要有五种意见：①认为干部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理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有的认为，主要应从干部的职业道德入手，提高干部的素质，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②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权力的调整和分配，即简政放权。应从搞好横向（主要的）和纵向的权力调整为突破口。理由是：只有横向纵向分权才能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不合理的弊端。只有横向纵向分权才能形成权力相互制约机制。也只有横向纵向分权才能使权归原主。③从中央高层次入手是突破口。因为，中央及各部领导地方和基层，如若党政、政企分离不从中央各部开始，地方、基层即使搞了也不巩固。④解决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长期以来，民主集中制问题得不到解决，是造成政治体制中许多弊端之重要原因，只有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才能克服和避免政治体制中的弊端。⑤破除旧的观念（包括对国家的传统、神化的观念），发扬民主意识，使全民族的民主意识觉醒。

4.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主要有四种意见：①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理由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自我发展和完善的需要；是其它方面的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说到底是为了发展生产力。③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扩大政治的民主化问题，即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④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生活民主化，政治决策科学化，领导程序简单明快化，权力分配层次化，建立高度民主的政体，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5.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与会同志都一致认为，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影响，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但对两种体制改革那个先行后行的问题则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先行。经济体制是各种体制的基础。只有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使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进而改之。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奠定了基础。②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先行。从当前经济

体制改革的现状看，不从政治体制改革着手，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甚至半途而废，直至失败。政治体制改革是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和保证。③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应同步进行，齐头并进，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各种体制改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补充。

四、关于社会主义开放的理论根据问题

与会同志从三个不同角度、侧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理论根据。

一种见解认为，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包括内因、外因辩证关系在内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和方法等等都是制定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开放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而且开放的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二者紧密相联，相互促进。比如，开放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原理，加深了人们对纵向与横向联系的关系和作用的认识。在对外开放中允许个体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资独资经济形式存在，建立了多层次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水平，这就丰富和发展了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思维方式的变革，丰富思维的辩证特征：开放性、矛盾性、选择性、独创性、整体性等等。

第二种见解认为，社会主义开放政策的客观依据，应当从社会的开放性经济结构和社会的开放状态中寻找，关于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则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开放原理或社会开放观中寻找：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封闭的社会状态和开放的社会状态这两种基本状态；决定封闭和开放这两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社会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于社会主义开放社会的特征。

第三种见解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为实行“开放”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这里有三点启迪：①通过开放，事物从无序到有序，从非线性到线性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因此应该坚定我们对外开放的信心；同时，为了少走弯路，还须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下开放的特点。②开放要赢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关键在于发挥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同作用，所以要善于把各种积极、有利因素调动起来，合理协调各种关系。③要研究并根据现实需要和发展来调整开放的结构和功能，取得开放的最佳效果，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梅汶佬 云维经 曾 铮）



再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

张江明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简称“两变”），仅仅属于认识论，还是同时也属于唯物论？只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科学概括，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科学概括？这是我省较长期以来争鸣和讨论的焦点。为了继续深入争鸣，我想就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与“两变”的关系，以及“两变”是否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就教于诸同志。

一、怎样从“哲学就是认识论”和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基本问题来理解“两变”兼有认识论和唯物论的意义

有的同志划定一条界线：只能从认识论方面来理解“两变”，如果超越于这个范围，看作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概括，这就违背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造成混乱和荒谬。

我们要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提出“两变”的原意，既要着重从“两变”哲学思想本身，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一著作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精神来理解，又还要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整体来理解，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40页）

毛泽东同志对哲学和认识论、唯物论和认识论的关系，经过较长时间，逐步地形成了一个总的观点：“哲学就是认识论”。毛泽东同志说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是指广义的认识论，是将哲学

作为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来看待的。其主要精神是要使哲学真正成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并非把“哲学就是认识论”仅仅限于认识的来源、实践的基础、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毛泽东同志1963年和1964年讲到“哲学就是认识论”时，总是和“两变”联系起来，或一起讲的。因此，探讨“两变”的原意，必须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这个整体和总的指导精神来考察，不能回避，也不能离开。

按照“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观点，讲“两变”是认识论科学概括时，不能孤立来讲，必须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整体来理解，同唯物论、本体论结合起来理解。在哲学史上，从来没有孤立的认识论，它总是同唯物论或唯心论联系起来，以决定认识论的性质、作用和效果。从“哲学就是认识论”来看“两变”，更应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更不能模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在“两变”中的地位，不能把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从“两变”中抽掉出来。“两变”，首先是认识论，着重于从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辩证过程，同时也兼有唯物论的意义。如果把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从“两变”中排除出去，就会使“两变”走到错误方面去。

按照“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观点，今后更要重视对认识论的研究，对“两变”的探讨和研究，使哲学真正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这

就要进一步研究认识论本身的理论问题，研究“两变”在认识中的作用和意义；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哲学的整体，从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基本问题来研究认识论和“两变”思想，研究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和“两变”的关系，研究“两变”与实践的关系，研究“两变”在唯物论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对认识论和“两变”的理解更深刻，更全面，更符合于客观实际。

按照“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观点，哲学基本问题必然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实际上肯定了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基本问题，并且把唯物论和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在某些方面也将哲学看作是广义的认识论的。

列宁一方面，把主张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的根本标准，认为“两大派别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列宁选集》第2卷，第27页。）另一方面，同时又把承认什么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看作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他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同上，第147—148页。）

唯物主义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唯心主义则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主观形式、精神产物。列宁把时间和空间的学说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指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物（物体）和感觉的关系问题。列宁说：“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学说是同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感觉是物体的映象呢，还是物体是我们的感觉的复合。”（《列宁选集》第2卷，第180页。）

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本来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概念。列宁则是把这两个概念同时看作是认识论的根本概念，认为对这两个概念下定义，必须和谁是第一性联系起来。他说：“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理的和心理的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对于认识论的这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实际上不能下别的定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6页。）

对于唯物论和认识论（反映论）的关系，列宁既明确指出它们的区别，又往往从哲学是广义认识论这个角度来处理它们的关系，或者以认识论的形式，体现唯物论的内容。例如：列宁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在于：“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列宁在这里不是讲认识过程、认识的两个阶段，而是要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以物质为本原和出发点，坚持物质第一性。

列宁说：“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107页。）“承认理论是摹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71页。）又说：“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摹写，我们知道**这些物本身**，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这就是不可知论者所不同意的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05页。）列宁对物质概念下了一个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2卷，第128页。）在这个定义中，包括有物质和物质的反映，把唯物论和认识论融和在一起。

有的同志认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仅仅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如果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也说成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这就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任意扩展了，其结果是，实际上否定、取消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还认为列宁只是把认识的源泉问题确定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没有把世界本原问题确定为认识论基本问题。

这种看法，也是一种把认识论基本问题只局限于认识论，不同唯物论结合起来的观点。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感觉是物质的反映，还是物质是感觉的复合。（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80页。）这就是说，认识论基本问题的焦点是物质和感觉（意识）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即是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列宁把哲学基本问题看作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并把它作为一个基本观点，贯串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认识论的整个论证之中的。

为了弄清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认识的源泉问题，这是认识论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个标志。但是，决不能把认识源泉和世界本原人为地割裂开来，而是要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既要看到它们的区别，更要看到它们的一致性。因为物质是认识的最终源泉。如果只讲认识的来源，不讲认识的最终源泉是物质，这就不能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

列宁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依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源泉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266页。)这不是明显的指出，认识的源泉问题即是精神(认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吗？列宁认为承认还是反对物质是认识的源泉，争论很久了。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认识的源泉，唯心主义则反对。列宁说：“接受或抛弃物质概念这一问题，是人对他的感官的提示是否相信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认识的源泉的问题。这一问题从一开始有哲学起就被提出来讨论了，……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列宁选集》第2卷，第129页。)还指出，唯心主义路线，“否认物质，也就是否认我们感觉的外部的、客观的源泉，否认和我们感觉相符合的客观实在，这是大家早已熟知的对认识论问题的解答。相反地，承认被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所否认的那条哲学路线，是以如下的定义表达的：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5—146页)

物质是认识的源泉和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两者有区别，也是一致的。物质不会自然地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必须通过物质的运动、物质性的实践活动，才有可能。实践是联结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桥梁，只有经过社会实践这条通道，才能达到认识彼岸的物质。在认识论中，物质是认识的对象和内容，实践是认识的途径和桥梁。它们围绕着一个总的目标：认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依靠社会实践来正确认识和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以达到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为什么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基本问题？

因为：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个总纲，哲学基本问题是个根本，是贯彻这个总纲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各个部分组成，主要是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等等，各个组成部分不能平列，而是由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本问题统率和贯彻在各个部分之中，有机地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最基本问题，当然也是哲学各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问题。由于各个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特有内容和特殊性，所以，哲学基本问题在各个部分的表现是各有特点的，不宜于简单化。

第二，认识论上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必须遵循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才能得到正确解决。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从人类认识史、哲学史来看，这个基本矛盾贯彻于认识论的各个方面。但是，无论解决什么样的认识矛盾，都会碰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无不关系到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认识论的斗争，总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矛盾、基本问题展开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认识路线。所以不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也作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就会分不清两条认识路线，不能正确解决认识上的基本矛盾。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我们搞革命和建设都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要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能否认识和解决得好，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人们所以犯错误，从认识论上来说，就是主观指导的东西，即提出的方针、政策、计划，不符合于客观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规律，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人们经过犯错误之后，取得教训，勇于改正，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发展规律，这就会从错误变为正确，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做好工作的关键，在于正确“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使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情况相符合。这是运用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正确解决认识上的基本矛盾，指导实践的表现。

按照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基本问题的观点来看“两变”，既然“两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概括，那末，哲学基本问题必然也是“两变”的基本问题。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那

些认为只有哲学基本问题中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同一性才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两变”的基本问题，而哲学基本问题中另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方面，即世界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则不属于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和“两变”的根本问题，这种人为地把认识论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硬是割裂开来，丢掉其中更根本的一方面，是片面的，不符合于“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基本问题”的观点，不能在贯彻“两变”哲学思想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

二、“两变”哲学思想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两变”不是什么兼有认识论和唯物论，而是典型的二元论、唯心论，搞乱了哲学阵营，是“左”倾错误的哲学基础。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哲学上的一元论或二元论，是指对世界本原的不同看法。二元论者认为世界有两个平行的本原，谁也不决定谁，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区别，精神和物质之间不会发生转化。这是调和折中的哲学根源。从表面看来，在“两变”思想中，物质和精神都出现两次，好象是两元，其实根本不是。“两变”是以物质为世界的唯一本原，精神是物质的派生为基础的。物质是“两变”的出发点、立足点，又是终结点、归宿点，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的根源性，表明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两变”中的精神居于中间地位，体现着物质在先，精神在后，由物质转化为精神，再由精神转化为物质。这都不存在二元论问题。

哲学一元论，依据以物质还是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划分为唯物主义一元论和唯心主义一元论。我们说“两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既包括世界的本原是物质，坚持物质的第一性；又表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实践的基础上物质和精神可以互相转化，鲜明地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划清界限。“两变”中所说的“变”，是指物质和精神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在认识过程中的互相转化。物质变精神是在实践中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个基本前提的，决不是世界的本原由物质变为精神，而是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精神是由物质变来，要从实际出发，引出物质世界内在的客观规律，转化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作为行动的指导，并不是只把精神留下，物质消灭了。精神变

物质是指在实践基础上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能够认识物质，同物质发展规律相一致，可以进行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取得物质的成果，并不是说精神可以派生物质，变为第一性的东西。因为精神是从物质中来，到物质中去的，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只有坚持“两变”兼有认识论和唯物论的双重意义，才能贯彻彻底唯物主义一元论思想。人为地把唯物论从“两变”中排除出去，只剩下认识论，倒有可能走到唯心主义一元论方面去。

在这里我想概括为一些简明的公式，以便一目了然地分清哲学阵营和哲学思想界限：

唯心主义：精神——物质

机械唯物主义：物质——精神

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精神——物质——精神（绝对精神——自然界——绝对精神）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精神——物质

最后一个公式，自从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以来，就是这样运用和贯彻的。但是，从理论上概括起来，用“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或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这个公式来表述，这是毛泽东同志1963年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这个公式包括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以及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在内的。它既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完整概括，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概括和完整表达。

从“两变”的哲学基础来看，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为理论依据的。物质和精神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转化。这种对立统一，充满着辩证法，既不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同一，也不是唯心主义的统一于精神，而是统一于物质世界。物质和精神的互相转化，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实践来达到转化的。由于事物的性质和情况的不同，互相转化是各有区别的，不是只有一个模式。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关于物质和精神关系的论证，至今仍保持它的现实意义。“两变”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一般上，生产力、实践“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又可以“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我们这样理解，并没有违反唯物论。

“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0—301页。）只要使“两变”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基础上，正确处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就不会变成二元论、唯心论，而是坚持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

因此，那些说什么“两变”是“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是没有根据的。从哲学上来说，真正成为“左”右倾理论基础的是唯心主义一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而毛泽东同志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开展讨论以来，从他对待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看法以及提出“两变”的内容和目的来看，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

毛泽东同志写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提出“两变”，是为了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使广大干部懂得“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种“日常生活现象”。而认识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使干部懂得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辩证过程，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认识论教育，使“一些处于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他们常常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如果通过“两变”进行认识论教育，只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能达到反对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目的吗？当然不可能。只有在“两变”中把认识论和唯物论结合起来，把思维和存在同一性与世界本原的物质性结合起来，才能清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实践论》的继续和发展，它的主要特点是进一步把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把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贯彻到“两变”的认识论之中，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有的同志只看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和《实践论》“说的完全是一个意思”，没有看到新的特点，这是很不够的。第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开始就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指出把正确思想看作“从天上掉

下来”或“头脑里固有”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实践论》的开头则着重批判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机械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实践去认识问题，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提出了实践的三种形式和实践第一的观点。第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概括了体现哲学基本问题的总的观点，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够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观点，作为“两变”的认识论的总的指导，以保证“两变”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属性，不会转变到唯心主义去。《实践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著作，强调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把唯物论和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有时甚至把认识论的内容说成就是唯物论。这两者是相通的，不是截然分离的。毛泽东同志多次使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63页，265页，268页）这一概念，认为，“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运动”。（同上，第263页）“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同上，第265页）第三，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书中，论证认识的两个阶段和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反复过程，把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看作即是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由存在到思想，由思想到存在，这是很有意义的，标志着唯物论和认识论的进一步结合，也标志着彻底唯物主义思想在认识过程中的具体化，表明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基本问题的实际体现；在《实践论》虽有此精神，还未用文字表述。第四，写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既要懂认识论的基本理论，更使广大干部懂得和掌握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道理，即是在认识论中正确处理物质第一性和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这是得到正确认识的保证。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巫贵均

道家哲学的把握方式

冯达文

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重分析的认知方式比较，更偏重于追求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中国哲学的这种特质，在道家与道家系统（本文把《老子》、《庄子》、《淮南子》和何晏、王弼等著作和人物，均认作道家系统）的著作中即有明显的表现。

（一）

道家与道家系统的哲学几乎都是从万物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性提出问题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在道家思想家看来，任何事物无不处于一种矛盾对立的状态，矛盾对立的双方完全是同门同根，同时发生、同时存在、不离不弃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老子·五十八章》）对立双方的交互转化，也是没完没了，无穷无尽的。

透过矛盾的普遍性，道家的先哲们清醒地意识到了感性万物存在的相对性、偏狭性、有限性。“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庄子·齐物论》），彼是只是因为有了对方才成为己方，才获得某种规定性，这表明，它们的存在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王弼《老子指略》）事物一旦获得某种形质规定性，它就再也不能包容别的事物和别的方面，它成为偏狭之物了。“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像狂风暴雨那样凶猛，像高天厚地那样宏阔，尚有终极之时，至于那些芸芸众物，其功能、价值的有限性更可想而知。感性世界作为相对、偏狭、有限的存在，至此完全被贬落了。

通过贬落万物，道家思想家突出地关注到了宇宙存在的绝对性、完整性、无限性方面的问题。宇宙间有没有既是“至大无外”，又是“至小无内”（《庄子·天下》）那样一种东西？有没有“渊兮似万物之宗”，甚至产生于“象帝之先”（《老子·四章》）那样一种东西？有没有“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那样一种东西？道家对这样一种东西的寻求，正体现了他们力图在整体上把握宇宙的一种深切追求。

在道家思想家的意念中，这个强为之名、称之为道，具有绝对、完全、无限意义的整体性的东西，由于它是通过贬落万物才显现出来的，那么它与万物应该在根本上就是相反的。万物是有形有质有声有色有臭有味的，因此相反地，它必然是无形无质无声无色无臭无味的。它只有无任何形质规定性，才不会堕入相对性、偏狭性、有限性。

但是，万物的形质规定性，归根结底来源于矛盾性。所以，这个道要成为绝对、完全、无限的东西，它又必须与事物充满矛盾对立的状况相反，是“玄同”、“浑沌”、“混而为一”的。它只有处于绝对同一的状态，才不会堕入相对性、偏狭性、有限性。

这个没有任何形质规定性、绝对同一的东西，道家思想家又把它认作宇宙的最高本体（或本源）。道家思想家是通过建立本体论的形式来实现他们对世界的整体性的把握的。

（二）

可是，如果这个本体是一个无形质规定性的、绝对同一的东西，那么人们该如何对它给出正面的界定呢？

通过对人的认知特质的检讨，道家先哲们同时又发现，人的通常的认知方式，都是以事物的具体形质为捕捉对象的。具体事物存在的矛盾性，它们在形质规定上的相对性、偏狭性、有限性，首先即已决定人们无法获得任何真正可靠的知识。而且，当着人们企图用某一形质特征去标识某一事物时，又总是要拿这一事物与它周围的事物相比较、相区别才能实现的。这就说明，人的认识本质上是分割性的。“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兼，有由则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王弼《老子指略》）人们越是企图对事物加以准确、细致的界定，越要把事物分割为各种不同的类属、层面，人们所得到的认识也就越零碎，离开事物的整体特质（兼）和本然状态（真）就越远。这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显然，用认识日常事物的方法，无法达到对绝对、完全、无限本体的把握。

人的通常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不能达到本体的，但人类似乎对本体又不能不有所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说明不应该是定义性的，而只能是描写性的。就像荷马史诗中的古希腊美女海伦，要是正面去说明她的眼睛、鼻子、嘴唇如何美貌，只会把她本然的、完整的美态给分割了、破坏了，倒不如从她一旦出现如何引起远近人们的骚动，让人们各自去体验海伦的美。本体道同样如此，一旦正面定义它是什么，它就受到了限定，成为有限性的东西了。人们只应该从某个侧面，远远地，通过对它引起的某些外部状态的描写，让各人去体验它。诸如“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十四章》），“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覆天载地，廓四方，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淮南子·原道训》），等等，都是对道的一种描写。通过描写，人们体验得道于影影绰绰、恍恍惚惚之中，也就很好地说明了道。

但是，这种描写，如果仅仅是从一两个侧面去进行、拿一两样事物来比况，仍有可能使人们用一种确定的眼光去范围本体道。因此，道家思想家们还常常不停顿地推举出一系列事物，从许许多多的侧面、角度，并采用在现实事物的基础予以夸张的手法，来进行这种描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道的体验不滞留于有限，而不断越出有限，趋向无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三十九章》），“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牺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庄子·大宗师》），……天、地、神、谷、万物、侯王、豨韦氏、伏牺氏、维斗、日月，这一系列恢宏、神奇、伟大、富有、尊贵、本始的物类，都是得到道之一偏而得以如此的，人们由此可以意想到道在它的绝对、完整、无限意义上的情态了。

甚至于，这种侧面的描写因为终究是用有限的东西模拟无限，还不免执滞于有限，因此，在许多场合下，道家先哲们干脆用否定式，借助于对一系列有限事物的否定，从反面来显现道的无限绝对性。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章》）“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王弼《老子指略》）等即是。这种否定语式在道家著作中如此之多，尽可见着道家先哲们为向人们传递本来不可传递的关于本体的消息，用心何等良苦。而对无限的有限之物完全、彻底否定的结果，道也就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如果说，道还可能有所界定的话，那么，大概可以说，道就是无吧。

（三）

要是上述所说的道家对世界本体的精神的把握方式表达能够得到确认，我们以往对道家哲学的特质和价值的分析，有许多问题就值得重新考虑。

首先便是，道家哲学的本体追求，既然是通过否弃感性万物实现的，那么这就是逻辑地规定了我们不应该把先哲们对万物特性的论述，认作为对本体含蕴的正面的规范。可惜目前的许多论者恰恰没有注意这一点。典型的例子如庄子的一段话。“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这段话的前面一句，就是指的万物的生息状况，而不是讨论本体构成问题。庄子通过万物生死的不确定性说明对万物生死的区分和对生的执着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应该予以否弃，通过否弃趋归于生死不别的“一”，这才进入本体层次。但许多论者执着前一句话，就断言庄子哲学属某一主义，这便失却本意了。

其次就是，道家通过否弃万物之后建构起来的本体概念，既然不是以定义的方式予以界定的，那么，对道家哲学的探讨，实际上还是不能采用语义分析法的。如“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这些，都不是事实判断、逻辑陈述，而是对本体那种混沌不分、若有若无、飘忽不系、不

能言状的意境的烘托。要是执着为事实判断，硬说这个“物”就是物质，那个“精”就是精神，此一“无名”即指发展的这一阶段，彼一“有名”又指发展的那一阶段，这正好就把本体范围在确定、有限的事物之中了。这岂能不为先哲所见笑呢。

再次则是，道家在借助有限物事从侧面描写本体时，为了避免堕入有限性，是从多视点、多角度进行的。这种多视点、多角度所带来的本体概念的多义性、不确定性（道家正需要不确定性），同样要使语义分析法、形式逻辑分析法感到困惑。相对于万有，道可以被表述为虚、无；相对于分、偏，道可以被表述为全、一；相对于有为，道可以被表述为自然、任自然；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东西的不同角度的描写。如以定义论处，执着道是虚无，故可判为唯心主义；执着道是一，一即气，或道就是自然界，又可判为唯物主义。

那么，难道对道家哲学竟无法分析了吗？当然不是。事实上，我们上面在讨论道家哲学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独特表述方式时，即已作了初步分析。我们可从中发现，道家哲学的问题，不在于它在把握世界上的整体追求，也不完全在于它通过建立本体论的途径来实现这种追求。这种追求在有助于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看待现实万物，深刻剖视现存万物和现有观念包含的矛盾性、相对性、有限性的意义上，甚至带有相当的合理性。问题在于它不是在感性万物自身固有的联系、结构中去获得整体，不是在物象与本体（本质）的统一中去理解整体。他们企图在完全排斥万有的情况下求取整体，这就使他们不可能真正揭示本体的含义，并真正实现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而当他们从世界之外赋予一个绝对本体时，就为世界设置了一个“神”；这个“神”对现实万物可以任意取予，万物的客观实在性也不复存在了。在这一意义上，道家哲学从总体倾向性上，还是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范英



近代加拿大华侨述略

沈 毅

建国以来，对加拿大华侨史的研究还很不深入，不少重要领域还无人涉足。本文按照中国近代史的习惯分期，就近代旅加华侨的状况略作分析，着重分析他们的地位和作用。

(一)

考史，华侨从1858年开始移居加拿大，到1919年前后，历时六十年。其间职业有几个阶段的变化。

从1858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现金矿，许多贫苦的中国人闻讯涌来。有人估计，1862年全加华侨达10,000人。其中大多数充任雇佣淘金工人。淘金地点开始是在弗雷塞河下游的峡谷中，后转移到卡里布地区。此外，也有少量华侨从事其他职业，如修筑公路，当家庭佣人，开办小洗衣房等，还有个别富裕者开办了商号和大菜园。^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到1880年，旅加华侨的职业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金源的枯竭使喧嚣一时的淘金热冷却下来。原来从事淘金的华侨或归国，或改操他业。1879年，全加华侨约6,000人。其中淘金工人为1,800人，佣人300人，鲑鱼罐头厂工人1,100人，各种劳工约700人，农场的农工和个体菜园主约1,500人，洗衣者300人，鞋匠150人，裁缝100人，小商小贩50人。^②

1881年到1885年，旅加华侨职业的最显著变化是出现了修铁路的工人，人数居各行业之冠。加拿大当局为早日建成太平洋铁路而雇用了大批华侨当筑路工人，最多时达8,000人。据1884年对全加（主要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10,400名华侨的职业调查，雇佣工人共8,500人，其中筑路工人为3,000名，煤矿、其他金属矿和农场工人共3,000人左右，佣人和罐头厂工人数量与七十年代大致相等。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出现了在锯木厂工作的华侨，共260余人。受雇在华侨富裕者店铺中当工人的共560人。当年华侨富裕者共182人，基本是开办较大规模的商店和饭店。包括洗衣店主、菜园主、小商贩和个体伐木者在内的个体劳动者共992人，人数与七十年代相比，总人数有所增加。

从1886年起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是华侨职业变化最显著的一个阶段。1885年末太平洋铁路建成，原来筑路的华侨全部失业。但因这条铁路的建成，使不列颠哥伦比亚

《学术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省的鱼罐头工业、木材业及矿业等都得到迅速发展，因而在这些行业中充任工人的华侨增加较快。1901年，全加华侨共14,000人，其中当矿工的1,600人，鱼罐头厂工人约6,000名，在木材工业工作的也不少。与此同时，个体工商业者人数也有很大增长，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因经济萧条，在工矿企业中就业的很多华侨失业，更使个体工商业者的人数激增。如到1921年，全加开洗衣店的华侨约6,000人，开饭店的达5,000人。^③

在各个阶段，华侨中都有少数知识分子，如学校教员、报纸编辑、传教士、医生及译员等。但所占比例很小，1884年约50人，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加拿大华侨总数已达39,000余人，而知识分子也不过800人左右。^④

综上所述，近代加拿大华侨的职业有以下特点：第一，劳动人民很多。史载，华侨“其操工者，居十之七八，商人学生妇女等十之二三。”^⑤这种情况与中国人出国旨在谋生的原因有关。第二，从地域上看，工矿企业的工人多集中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且多为非技术性的熟练工和力工等，充任机械工厂的技术工人极少；东部和中部省份个体工商业者较多。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木材业、矿业和罐头业较发达并缺乏劳动力；也与当时该省及中部和东部省份有意排斥华侨从事技术性工作有关。第三，与其他行业相较，个体工商业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据1884年统计，全加为个体工商业者的华侨人数约占华侨总数的9%，而到了1921年，仅洗衣业和饭馆业的华侨就占华侨总数的25%。第四，华侨中的富裕者大多经营商业，少数则经营商业性菜园，而开办工矿企业者极少。这是因为经营工矿企业和稍大的菜园，需一定数量的土地和资本。而加拿大方面在很长时间内禁止华侨拥有土地，而华侨的财力也有限。

(二)

各行业的华侨为开发和建设加拿大尤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十九世纪中期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旷人稀，极为落后，虽然省当局及自治领政府极其重视那里的开发，但正是在华侨的大力参与下，才得以实现。从华侨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例就可见一斑。有人估计，1862年，该省华侨多达10,000人，约为白人的49%。1867年白人为5,600余人，华侨为2,200人左右，约为白人的88.7%，^⑥1885年，华侨22,000人，约占全省人口的22%到40%。二十世纪以来，虽然华侨在该省人口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支很重要的劳动大军。1901年、1911年和1921年这三年中，华侨在该省人口的比例分别为8.8%、4.9%和4.8%。^⑦应该指出，华侨多系成年男子，因而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率自然会更高。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许多工矿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华侨。1860年5月10日，维多利亚的《不列颠移民报》曾这样欢呼华侨的到来：“中国人及其大群劳工已在减轻我们的忧虑并解决这个困难。他们象财富的开拓者一样出现在我们的海岸上。”^⑧事实上，正是

在华侨淘金工的大力参与下，才使那里的金矿得到开采。

不列颠哥伦比亚沿海地区盛产鲑鱼，罐头加工业随之发展。许多华侨充任了季节性的鱼罐头工人。每年3月，他们从事焊接罐头盒，到夏天改做洗鱼工作。夏季捕鱼过后，再干一两个月涂漆、贴商标和装箱等。当1878年该省立法机关动议禁止公共工程和企业使用华工，以及向华侨征收人头税时，就有九个鱼罐头公司联名呈递抗议书，认为这将毁掉许多工业，尤其处于初期的罐头业。^⑨1888年，该省的一位议员在加拿大自治领议会中指出，该地区的所有工业都依赖廉价华工，尤其是鱼罐头工业和煤矿工业。一些学者也说，“鲑鱼罐头工业在英属哥伦比亚的迅速发展，差不多完全依靠中国劳工的力量。”^⑩

不列颠哥伦比亚森林资源丰富，开发伊始，华侨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1906年，“几乎每期《伐木人》杂志都强调锯木厂急需廉价工人。木材厂的厂主们说，白人不肯干的木材分类、堆积、装车等体力劳动都只能由中国人担当。”^⑪至1918年，华侨在该省木材业工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仍高达四分之一，为3,400余人。

华侨商贩主要经营蔬菜水果及各种杂货，还有的经营稻米、烟草等。他们不但在城镇中经商，而且还到乡下和海边售货，这有利于加速商品流通，保证社会需要。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1858年之前几乎没有农业。淘金热掀起之后，欧洲移民逐渐增多，对蔬菜和粮食的需求量大增。早在1865年，卡里布金矿区的克内尔附近就有十个华侨经营的大菜园，种植土豆、萝卜和洋葱等。这些菜园的产品价格不高，非常畅销，几乎垄断了当地的蔬菜市场。1920年末，该省的华侨拥有或租赁土地共16,700余英亩，485人经营其间。据统计，1922年，华侨和日侨共生产了31,300余吨蔬菜，而白人的产量为11,500余吨。^⑫在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省也有少数华侨从事蔬菜生产。此外，许多受雇在白人农场中的华侨也为加拿大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华侨开办的洗衣店，都是面向白人的。一般规模都很小，但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方便。华侨开办的饭店，菜肴经济实惠，更为中下层人民所光顾和称道。在白人家庭当佣人的华侨的作用也不容低估，最明显的是1907年9月，温哥华几百名华侨佣人离开雇主，以抗议排华暴行。结果，“富裕家庭的生活完全混乱”。

淘金热之前，不列颠哥伦比亚基本上没有城镇。随着淘金热的兴起，包括华侨在内的大批淘金者蜂涌而来。他们在那里掘地淘金，盖房造屋，还有的种植菜园，开办店铺，从而促成了一批村镇的诞生。例如金矿区的克内尔、凯斯雷及巴克威来等镇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就是该省首府维多利亚，开始也仅是一个小居民点，1858年后才迅速发展起来。淘金高潮中，华侨在当地人口中一直占有很大比重，他们以勤劳的双手，和白人一道，使很多城镇得以建立和发展。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过去人烟稀少，交通闭塞。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淘金中心由弗雷塞河谷转到卡里布。为了大力开发该地黄金资源，莱德公司雇用了500名华侨修建了通往卡里布的公路。^⑬到了七十年代，省当局为改善交通，要修筑新威斯敏斯特到耶鲁之

间的公路，在筑路中，华侨又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温哥华岛上铁路的修建，也有华侨的功劳，数以百计的华侨曾出现在筑路工地上。

华侨的最大功绩，是为建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出了大力。1850年，全加通车的铁路不过66英里。十年后，虽然各地陆续兴建了一些铁路，但都分布在东部省份，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等省还没有铁路。当时，自治领政府把在全国修筑铁路，尤其修筑贯通北美大陆、连结两大洋的太平洋铁路作为头等大事。因为它意识到，西部是“千百万人民未来的家园，新国家资源的巨大宝库，东部工商业的市场，并且是通向太平洋和东方的西北通路。”^⑭修筑太平洋铁路，是开发西部的需要，是整个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巩固新兴国家的需要。但工程艰巨，人力缺乏，谈何容易！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负责修路的美国工程师昂德唐克在征得加拿大政府同意后，从1880年到1885年8月，有计划地从中国和美国输入大批华工。1882年，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在回答反对派议员的质问时说：“当前就是简单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或者你必须使用中国劳工，或者你不能建成这条铁路。”^⑮正是在华工的艰苦努力下，太平洋铁路于1885年11月7日竣工。太平洋和大西洋、不列颠哥伦比亚与东加拿大从此连在一起。几十年后，加拿大官方仍坦率地承认：“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如果不是华工的惊人努力，毫无疑义，是不可能于1885年完成的。”^⑯

太平洋铁路对加拿大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所起的作用，几乎是无可估量的。“西部诸省，……移民垦殖几乎完全是铁路时代的事情。”仅不列颠哥伦比亚就由1891年的不足10万人，增加到1911年的89万人。温哥华原是一个小镇，直到太平洋铁路把它作为西部终点站后，才很快发展为大城市。铁路也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不列颠哥伦比亚仅有几家小型锯木厂，“太平洋铁路的建成，给这一部门提供了通往广大销售市场的道路”，锯木厂几乎星罗棋布。纸浆厂与造纸厂也在八十年代以后从无到有地建立和发展起来。铁路也使矿业和渔业的“产量和产值有很大增长”。西部的农业自铁路“建成才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个惊人的阶段”。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欧卡内甘河谷位于铁路沿线，它的商业性种植正是出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并从那以后名声大噪。八十年代以前，加拿大是一个粮食进口国；八十年代后开始逐渐改变，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加拿大“由粮食净进口国一跃而为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西北部“正在成为世界最大谷仓之一。”^⑰不列颠哥伦比亚盛产的木材、矿产和鱼罐头等经由铁路运往东部省份或向欧洲出口。东部的许多工业品经由铁路运往西部或向东方出口。对外贸易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仅为2亿元，1914年则超过810亿元。

(三)

华侨为加拿大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当时大多数人却过着贫困的生活。

大多数华侨居住条件很差。华侨有家眷的都是殷实者，但人数很少。1919年，温哥华的6,000名华侨中，有210个家庭，而多伦多的2,300名华侨中，仅有85个家庭。1921年，女性华侨仅占华侨总数的6.5%。那些无家眷的单身成年男子，或常年住在小旅馆内，或集资租屋居住。室内拥挤，陈设简陋，卫生条件极差。有的房子长宽不过10英尺，竟住进20多个人，3人用一张床，屋内全部家俱所值不过25元。^⑧

收入微薄而工时极长。如工矿企业的工人每天工资为1元到1.5元；洗衣者月收入10余元。1884年的调查表明，华工平均每年的工资不过225元。而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列颠哥伦比亚矿区的物价竟高达：咸猪肉每磅90分，面粉每磅60分。^⑨ 华侨收入如此微薄，但工时极长，在白人厂矿干活，每天工作都在九小时以上。菜农“夜间十时至十一时尚在田间操作”。^⑩ 洗衣者“自朝至暮，除食与宿外，几无一刻不在操作中”。“常有一夕只宿三两小时者。”

大多数华侨工作环境危险，劳动条件很差。据曾参加过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广东新会华侨老人黄厚汉1926年回忆，当年他们白天干繁重的体力劳动，晚间则于山坡树下悬布帐而寝，许多人甚至露天而睡。因爆破山石而死于工伤事故者所在多有。许多人因饥饿、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而患病或死亡。当地报纸报道说：“对于这些可怜的人们，既不提供医药条件，也无人同情。”^⑪ 整个筑路的五年中，华侨死亡总人数至今仍无法确切统计。老华侨回忆为8,000人，有的学者认为是1,500人。在木瓦厂，“木瓦之机，每架例用两人。一管机一扎瓦。管机之工异常危险。其机两傍锯列，人立其中，以左手探取木瓦而以右手扎之。偶一不慎，则十指俱无。华人因此而断指伤臂者，不知凡几。”很多木瓦工即使未受此伤，也因常年劳累，“多染咯血之症”，^⑫ 严重地摧残了身体。

广大华侨经常面临失业的威胁。伐木工人每年只有九个月的工作，木材厂的工人冬天多被解雇。罐头厂的工人自鱼汛过后，“皆无所得业，束手坐食，故岁入恒不足以自贍也。”^⑬ 不少洗衣店、饭店以及杂货铺，也很容易亏损和倒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6年，温哥华就有70%—80%华侨丢失了饭碗。

当年，加拿大华侨不仅经济上遭受沉重的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到强烈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早在1872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立法会议就有人提出关于本省和全加所有公共工程都不使用华侨的议案。在此后一段时间，此类歧视华侨的提案层出不穷。1884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立法会议通过并实行了禁止华侨购买土地的法案，1900年又规定，不许华侨和东方侨民申领卖酒执照，如此等等。

华侨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无权地位。1872年和189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通过和实行了禁止华侨参加省级和市级选举的议案。^⑭ 萨斯喀彻温在1909年也规定华侨不得参加选举，甚至包括已经入了加籍的华人。

近代加拿大华侨为当地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饱受剥削、歧视和压迫。他们为改变这种不幸命运，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和斗争。

华侨组织了一些社会团体。中华会馆设立较早，如维多利亚的中华会馆成立于1884

年6月。这个组织打破了华侨籍贯、家族和职业等方面的界限，会员来源比较广泛。1885年前后有5,000名会员。其他城市也先后建起了中华会馆。各行业的华侨也有自己的组织，维多利亚的商会组织叫昭一公所，温哥华的商会组织叫公一公所，温哥华还有蔬菜零售商协会和木瓦工人协会等。华侨还因籍贯而别，成立起类似同乡会的组织，维多利亚有番禺华侨的昌后堂、新宁华侨的新宁余庆堂（后称宁阳余庆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维多利亚和温哥华还出现了很多家族团体，如林姓的林西河堂，李姓的李陇西堂，刘、关、张、赵四姓的龙冈会所，吴、周、蔡三姓的至德堂等等。^⑳这些组织在维护华侨利益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创办华侨学校，努力提高文化水平。维多利亚华侨商人司徒英石等人针对不少中年华侨文化很低的情况，于1906年创设尚志学校，“聘请名师，教授普通课程。”^㉑为了给更多的华侨子女提供就学的机会，1899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创办了全加第一所华侨学校。1909年，针对加拿大当局在学校中搞隔离班，阻挠华侨子女入学的情况，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又资助创办一所华侨学校，并使之成为全加最好的华侨学校。温哥华等地也建起了华侨学校。^㉒

进行直接斗争以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1869年，卡里布发生了华侨煤矿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后来在不少地区都出现过类似的罢工。1896年末，维多利亚华侨为抗议政府征税人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并抢走财物，华侨商人关闭商店，在白人家庭中工作的华侨佣人也辞了职。罢市罢工长达一周，最后当局只好交还抢走了的东西。^㉓1914年，安大略省立法会议曾动议禁止华侨店铺雇用白人，许多华侨群起反对，迫使其收回提案。

①②⑪⑬⑳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第7辑，第308—312、319、350、311、318—319页。

③⑫⑳⑳ 哈里·康等：From China to Canada，第310、23、78、38页。

④⑬ 程天放：Oriental immigration in Canada，第196、170—171页。

⑤⑳ 《华侨杂志》，1913年11月，第1期。

⑥⑦⑧⑩⑱⑳ 罗伯特·爱德华·维尼：Reaction to the Chinese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and British Columbia 1850 to 1910，第36、492和499、116、168-169、113、150页。

⑩⑱ 同①书第4辑，第287、295页。

⑭ 唐纳德·克赖顿：《加拿大近百年史》第2章，1970年。

⑮ 斯特尼斯劳·安切克：Immigration of Oriental into Canad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第27页，纽约1978年。

⑯ 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第44页。

⑰ 吴纪先等：《加拿大经济》，第19页。

㉑ 《新中国》，1920年3月，第192页。

㉒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4页。

㉓ 《东方杂志》，第4卷，第3期，第65页。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洪秀全政治思想平议

陈 华 新

洪秀全的政治思想，产生于中国旧民主革命的童年时代，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产生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作为农民革命运动领袖的洪秀全，其政治思想既摒弃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学思想形式；又不可能汲取后来才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政治学说，因此，采取了宗教的、王朝的、民族的复杂而特殊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

一、宗教的——政教一元化的国家观

国家观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几千年来，不同的阶级和政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家，都从不同阶级的政治利益去解释国家的产生，如“君权神授”、“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说等。洪秀全的国家观，如同“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①一样，也与宗教观紧密相连。他说：“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②这种国家观，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君权神授”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观，又不同于近代西方“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说的资产阶级国家观。

洪秀全的国家观与“君权神授”说不同。首先，他认为国家政权不是“神授”，而是“皇上帝”所有。其次，国家政权不是“神”派谁来行使统治的，而是由“皇上帝”直接“主宰化理”和“生养保佑”的。再次，只有“皇上帝”才能称帝，凡间君主不得“觐（然）称帝”。而“君权神授”说恰恰相反，认为国家政权是上天“神授”，国家是君主所有；国家政权是上天的“神”派“天子”来行使统治的，百姓要绝对服从天子的统治；君主称皇帝是符合“天意”的。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洪秀全的国家观，是与“君权神授”国家观相对立而提出

的。至于洪秀全的国家观不同于“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说，这就更为明显，用不着多作解释。对于洪秀全这一奇特的国家观，可以称为政教一元化的国家观。随着斗争的深入，他的这种国家观进一步发挥，成为建立太平天国政权的理论根据。

第一、洪秀全为了论证国家政权不是“神授”，而是“皇上帝”所有的，他对“中华”进行“新”的诠释，作为建立政教一元化国家的托词。早在1843年，洪秀全在莲花塘与李敬芳研读《劝世良言》时，对“书中词义均自行忖度，但不能分解‘天上的’与‘地下的’及‘精神的’与‘物质的’之辨。彼等以为‘天国降临’即指中国，而上帝选民乃指中国人及洪秀全”。^③为什么天国指中国呢？后来他在《天王诏旨》解释说：“爷排天国在中华，中国原来天国家。故此中华名爷讳，爷未降前即属爷”。^④众所周知，“中华”一词的本义，是因为我国古代华夏族兴起于黄河流域，居四方之中，故称“中华”。洪秀全却把它解释为来自上帝“耶火华”之名，中国就是天国。既然如此，那么，在中国建立政教一元化的国家甚明。

第二、洪秀全把太平天国作为政教一元化的国家实体。洪秀全既受我国儒家的传统太平思想及古代农民战争所追求的政治思想影响，也受原始基督教的影响。原始基督教曾流行过耶稣再生和建立公正太平、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神话。“千”字在希腊文为“锡利亚斯”，所以，恩格斯称这一神话为“早期基督教中锡利亚式的狂想”，并认为这种“狂想”很容易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中引起共鸣。^⑤洪秀全在发动金田起义时建立的圣库制度，可以视为太平天国的一种“锡利亚式的狂想”。这样，“太平”来自宗教神话，“天国”则指现实的中国。精神和物质合一，宗教和政治合一，这就是洪秀全政教一元化的国家观。

也许有人会反问：洪秀全曾讲过两个天国——天上天国和地下天国，怎能说是一元化呢？是的，洪秀全在《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写道：“一大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⑥什么是地下天国呢？他说：“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⑦很明显，精神的天国（天上天国）与物质的天国（地下天国）既然“同是神父天国”，这就是政教一元化。而地下天国（太平天国）又是宗教神话与政治实在的统一体，说明太平天国就是一个政教一元化的国家实体。

政教一元化的国家观，在中世纪的西欧各国，长期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而出现；那么，洪秀全的政教一元化主张，与西欧中世纪“神权政治”的政教一元化政治思想有何异同呢？

先从共性来看，二者的理论根据，都源于基督教的“创世”说。“创世”说认为宇宙万物以及人类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创世主，是万能的。洪秀全也认为“天地山海人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这一点与“神权政治”的理论根据，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由于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各具有不同的民族特点，因此，二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

第一，西欧封建制的确立，一开始就与罗马教皇勾结在一起，政教一元化是西欧封建制的重要政治特征，罗马教会是西欧封建制的社会支柱。为此，政教一元化是作为维护封建制的“神权政治”的思想形式出现的。而中国封建制的确立，一开始就建立在政教分离上。洪秀全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教分离，提出政教一元化，从这一点来说是有反封建意义的。他曾说：“上古之世，居民一体，皆敬拜上帝”，^⑧又说：“当初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以来，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⑨过去，一些研究者在引用这条资料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辨明先秦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未能阐发这段话的真谛。其实，洪秀全并非不懂先秦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不同，他把二者等同起来的目的，是借此以说明封建统治阶级所走的是“鬼路”而不是“大路”，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

第二，在西欧的封建社会中，教会神学是维

持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恩格斯曾指出：西欧“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教会信条自然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⑩而中国却不同，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是孔孟之道。因此，宗教神学在洪秀全手里，由西方的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一变而为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孔孟之道的精神武器。洪秀全还编出了一个上帝痛斥孔子的神话故事来驳斥孔子的儒家思想。可见他的宗教神学是作为反封建的“神学异端”而出现的。

第三，欧洲中世纪的政教一元化政治思想陷入“君权神授”说，如被称为神学“最高思想权威”的阿奎那，就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封建等级制度是根据上帝的旨意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而洪秀全的政教一元化的国家观，却反对中国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说，从这一方面来看也有明显的反封建倾向。

虽然洪秀全的政教一元化的国家观有别于欧洲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从而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政教一元化的理论基础是来自基督教的“创世”说，从学理来说是属于宗教唯心主义的，因而也是非科学的，它不可能揭示国家的本质。

洪秀全在理论上坚持政教一元化，而在实践上却没有身体力行。在金田起义前就承认了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形成政教二元化的领导，洪秀全是政治领袖，杨秀清是宗教领袖。对于革命进程中的困难，洪秀全不是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斗争，而是乞灵于上帝。1861年3月7日，洪秀全颁布《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诏》，擅自把沿用十一年的太平天国国号，改为“上帝天国”。政教一元化的国家，一变而为宗教单一化的国家。过了二十一天，又把“上帝天国”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这反映了洪秀全晚年，一再把国家神化，不仅不能挽救太平天国的失败命运，反而更加分崩离析了。

二、王朝的——多王 负责制政体

洪秀全根据他的宗教理论，认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⑪在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中，大家都是兄弟相称。洪秀全尊耶稣为上

帝长子，称为“天兄”，自认为上帝的第二子，以下依次排列，冯云山为三子，杨秀清为四子，韦昌辉为五子，洪宣娇为六女，石达开为七子。^②这种宗教伦理观念的确立，是太平天国实行多王负责制的根源。

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不称皇帝而称“天王”。永安建制时，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这标志着多王负责制新王朝政体的确立。

多王负责制因袭封建王朝的形式，因此与封建专制有相同之处：

第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因袭封建等级制度，强调“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从天王到太平军的普通士兵，等级森严，君臣有别，称呼、服饰、仪卫舆马等，都有严格区分，不准逾越。

第二、沿用封建世袭制。在永安建制中便肯定了“嫡长世袭”制，天王长子称“幼主万岁”，有如封建王朝的“太子”、“储君”。其他诸王长子为“嗣君千岁”，世代世袭。

第三、天王是不称皇帝的皇帝。天王的行文称“诏旨”，曰“钦此”，与封建帝王的“圣旨”无异。他自称“天下万国朕无二”。臣民尊天王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上(下)”，实为万民之极。还极力宣扬“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的天朝“天威”。实际上是建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第四、定朝仪，行礼制。从天王到两司马的老婆，都均有特殊的尊称。王亲国戚，都有特权，臣民对天王，“各宜凛遵”，只许“遵旨”，不得“逆旨”。

但是，由于多王负责制的新王朝政体，并不是全盘照搬封建政治制度，而是因袭中有所损益，因此也显示出两者质的区别：

第一、太平天国政权是作为与清政权相对立而出现的，在两个政权并存十多年间，尽管太平天国政权日趋封建化，但这个政权始终坚持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仍然是农民阶级的政治代表，不能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第二、永安封王与封建分封也不同。封建分封有世袭的领地，建立了小王国。而永安封王名义上分封四方，实际上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划出封地。这种封王，是在太平天国的进军过程中，进行分工合作，以便统一指挥所采取的一种政治

决策。

第三、太平天国的多王负责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体领导，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如前后期一些重要军事决策，都召开诸王共议，这就是农民民主性的体现。

恩格斯于《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说：“在塔波尔派里甚至已经在神权政治装璜之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③洪秀全创立的“多王负责制”政体，则可以说在王朝“政治装璜之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马克思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曾作过这样的预言，“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到中国，“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④说明马克思也觉察到太平天国的共和制倾向。我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到天京访问后发表感想说：“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⑤这里所说的“新国家之思想”，也是指共和制倾向的政体构想。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成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仅由于它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纲领，而且在于它开创多王负责制的政体，提出了具有近代特点的“共和倾向”的政权雏形。

必须申明：太平天国建立的多王负责制的“共和制倾向”，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而是农民运动中出现的共和制。“共和”就是共同执政之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民主性。

既然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因袭封建王朝的形式，又说它具有“共和制倾向”，岂不自相矛盾吗？笔者认为没有矛盾。历史上一些相同的范畴和相同的形式，往往呈现出质的差异。马克思指出：“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⑥太平天国的多王负责制的政体，是与封建专制政体存在质的差异的，这种质的差异导致对封建帝制的“漫画式”的否定。如洪秀全虽然沿用“朕”、“诏旨”、“钦此”等专称，但在永安封王中下诏“不得僭称上，僭称帝”，金陵定鼎，又再次下诏：“有人称皇帝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有人称大哥者，论天法该过云中雪也”。^⑦称帝、称大哥者处以死刑，这就是对封建帝制的否定。但是，农民毕竟不是先进阶级，他们不能创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

在对封建帝制的否定中又包含着肯定的命题，世袭制、等级制、家长制、特权制等腐蚀和破坏太平天国政权的肌体，加剧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由前期的对封建帝制的“漫画式”的否定，而走向对封建帝制的“写实性”的肯定，终于演出不可避免的天京悲剧。

三、民族的——反满兴汉的民族思想

洪秀全政治思想的另一特点，就是具有浓厚反满兴汉的民族意识。鸦片战争后，他“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①有一次，洪仁玕问他为什么这样恨满洲人，他说：“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②这是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洪秀全最早的反满言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早期反满思想已与反对鸦片贸易联系起来。认为清政府对外不能抵制鸦片走私，“每年花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任由白银外流，对内则“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③这一番议论已接触到当时两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很有见地的。

太平天国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反满的旗帜下发动的。洪秀全的民族思想，已突破了清初明朝遗老的“恢复明室”和天地会的“反清复明”的思想水平，而具有新的特点：

第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把民族思想与宗教思想结合在一起。洪秀全运用基督教神学理论，把汉满族划分为人、鬼边人、鬼三类。

“人”指汉族人民，但汉人又分为四种。洪秀全说：“君长是其（指上帝，下同——引者）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强暴是其顽子”。^④这四种人的划分，最初是以对拜上帝会的态度作为区分标准，“能子”指拜上帝会领导骨干，“肖子”指拜上帝会会员，“愚子”指非拜上帝的群众，“顽子”指敌视拜上帝的汉族人，一般指汉族地主豪绅。金田起义后，又以新的政治标准划分，“能子”指太平天国各级领导，“肖子”指太平军战士，“愚子”指没有参加太平军的汉族老百姓，“顽子”指与太平军作对的汉族人，一般也是指汉族地主豪绅。后两者虽然不信或敌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但由于他们也是汉族人，所以，洪

秀全还没有剥夺他们的上帝子女的资格，认为只要他们改变对拜上帝会和太平军的态度，也可以转化为“能子”，“肖子”。

“鬼边人”指清军中的汉人。洪秀全说：“邪曲恶假魔鬼路，行错鬼路任鬼怖；行错鬼路‘鬼边人’，受鬼缠捉此缘故”。^⑤“鬼边人”指人鬼之间，认为这些人只要改邪归正，还可以视为上帝的儿子。

“鬼”指满洲族。太平天国骂清朝为“妖朝”，清兵为“妖兵”，满洲族人为“满妖”。洪秀全的《诛妖歌》说：“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⑥诗歌中歌颂了岳飞的抗金事迹，因金人是满族祖先，洪秀全号召太平军学习岳飞的抗金精神，英勇进行反满斗争。

将汉族和满族这样来划分，在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敌人、坚持反满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民族思想也存在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因袭西方基督教神学而难以为汉族人民所接受；二是充满大汉族主义思想，混淆了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的阶级界线。

第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把反满的民族思想与反封建的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基于中华是上帝国土的说教，认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国，就是“反盗神州”。由于清朝政权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太平天国揭竿的反满斗争，必然导致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因此，反满的民族思想与反封建的政治思想相结合，是太平天国民族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

太平军在永安突围后进军湖南，发布了一篇著名的文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文告是以杨秀清、肖朝贵联衔发表的，实际上也反映了洪秀全的政治思想。这篇文告既是反满的檄文，也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宣言书。它说：“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受妖魔！罄南山之竹筒，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接着，历数满洲贵族入关后，强令雉发留辮、妄改汉族衣冠、淫乱汉族妇女、罗织汉人罪名、改变汉族语言等五大罪状。民族压迫说到底还是阶级压迫，尽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可能从理论上认识两者的关系，但他们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感性认识，已接触到阶级压迫的问题。文告中指出：“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

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文告最后申明太平天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上为上帝报瞒天之讎，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上为上帝报瞒天之讎”指满族“反盗神州”的罪行，属于民族斗争；“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指解除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属反封建斗争。斗争的目的是“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②4}

第三，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把“重兴汉室”与建立“地下天国”结合在一起。太平天国运动中，曾提出“反满兴汉”的口号。“金陵定鼎，创亿万年有道之基；铁甲平胡，吐百载不平之气。无非欲斯民革夷狄之面目，复中国之规模，而重兴汉室于维新也”。^{②5}可见，太平天国提出“重兴汉室”并不是停滞在“反清复明”的旧有斗争水平上，而是认定要“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这个新朝就是建立“共享太平”的太平天国，用洪秀全的话来说，就是建立“地下天国”。他们把“重兴汉室”与建立“地下天国”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把二百多年来的反清斗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为建立“地下天国”描绘出一幅美满幸福的蓝图，它是洪秀全政治思想的结晶。它虽然不能实现，但有其进步性。马克思在谈到太平天国废除一切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时候说：“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②6}太平天国把“重兴汉室”与建立“地下天国”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尽管它是一种空想，但作为中国近代由农民提出的第一个空想社会主义流派，是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并给予公正的评价的。

由于洪秀全以宗教神学作为民族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他虽然突破前人而把民族问题的解

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揭示民族问题的本质。他虽然也接触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问题，却仍然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并没有提高到理性认识，因而产生了笼统的排满主义。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形式，概括为“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②7}笔者以此为钥匙，力图勾画出洪秀全政治思想的轮廓。在指出其进步性的同时，也指出其落后和消极的一面。我们认为，对于落后和消极的一面，只能从历史去说明，以总结历史经验，而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水平，去讥笑他们的幼稚和笨拙。如果把洪秀全的政治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议，则可以发现其革命性和进步性是主流。在这一政治思想的引导下，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狂飚，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①⑤⑬⑭⑲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3、405、404、265、264页。

②⑧⑨⑪⑫⑬⑭⑮ 《太平天国》，第1册，第92、368、73—74、92、73、64、164页。

③ 《太平天国》，第6册，第850页。

④⑱⑲⑳㉑㉒㉓ 《太平天国》，第2册，第678、570、493、751页。

⑥⑦ 《太平天国史料》，第77页，1950年开明版。

⑩ 同①书，第21卷，第545页。

⑫ 《太平天国》，第4册，第652页。

⑬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2页，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⑭ 同①书，第12卷，第756页。

⑮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1页。

⑯ 同①书，第9卷，第110页。

作者单位：广州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林有能

从商品经济的发展看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

郭 媛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割据时代。分裂的政治局面，势必对社会经济带来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一般论及五代者，多强调其消极和衰乱的一面；至于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活跃，却较少有人注意。事实上，在政局不稳和中原经济残破这一表象背后，掩藏着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实质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前承隋唐，而且直接推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不考察这后一方面，便不能揭示五代时期的历史全貌，也难以正确认识该时期的历史地位。

一、五代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

唐代均田制崩溃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即土地愈来愈集中于地主手中。这种发展意味着土地私有权的进一步加强，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松弛，其最积极的后果，是五代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宋代普遍发展起来的圩田，就创始于五代时期。

据范仲淹调查说：“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埋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臣知苏州日……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臣寻访高年，则云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时民间钱五十文余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统，……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贯文省，比于当时，其贵十倍。”^①

范仲淹的调查表明，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及当地稻米产量，价格等，都是北宋统一后不如统一前。

五代时，南唐、吴越、闽、楚、后蜀等国，都曾兴修过大量的水利工程。其中以吴越较为突出，以杭州的“捍海石塘”——又称“钱氏石塘”最著名。当时杭州一带修筑海塘，采用了一种新技术。人们“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不仅长久抵御了海潮的侵袭，而且为东南沿海水上贸易创造了方便条件。诚如吴越王所说：“吴越国地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耶！”“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②史称“钱塘

富庶，于是盛于东南”。^③宋人谚语——“苏湖熟，天下足”描述的景象，也肇始于五代时期。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④五代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商业的进步，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此外，五代十国的君臣，大多是靠军旅起家的，他们或出身于商贩，或来源于农夫、游民，传统的“崇本抑末”思想在他们头脑中也不甚明晰。他们力图通过发展商业来积累财富，加强实力。这样，在五代，特别是在九国政权统治下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曾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一定的方便条件。

二、五代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

五代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包括商品性种植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等许多方面。

1. 商品性种植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五代时期南方农业的发展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茶、桑、棉、甘蔗、蔬果等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其产品多属市场流通的商品。闽、吴越、吴、南唐、楚以及前、后蜀等国，则大量生产茶叶。

据载，南唐时福建建安一带制茶的官焙有86处，包括官焙之外的私焙，共有1886处。^⑤每处官焙，往往下辖几个茶园。私焙大约亦然。其茶山面积，显然十分可观。而福建的种茶业，尚远不如四川等地发达。

此外，四川、淮南、两浙、江西、湖南大量种植桑苗，福建、广东、四川等地盛种甘蔗，太湖流域和四川的柑桔，四川和福建、广东的荔枝等，都驰名中外。

乡村经济作物的广泛发展，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劳力、地力的节省；而且，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中分工的发展。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得这一部分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了，原来作为副业的一些生产项目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导致了五代时期粮食贸易商的活跃，密切了部分地主和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当时主要的农业区几乎都是蚕桑产地。

种茶业、甘蔗业、蚕桑业和蔬果业的发展，必然带来贸易的繁荣。其结果，一方面促成了江南乡村副业商品化的扩大，另一方面，还直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五代时期南方的手工业，在制盐、制茶、矿冶、织染、造船、造纸、瓷器等各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织染业和制茶业最为发达。

吴越、吴和南唐、前后蜀都是丝织业很发达的地方。楚的丝织业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蜀锦和吴绫，一向驰名全国。史载，吴越在徐绾发动兵变时，杭州城内仅为钱鏐织锦的工人，就有二百多人。^⑥

吴越丝织品质地精美，数量繁多，有很多著名产品。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纺织品，就有“越绫、吴绫、盘龙凤绵织成红罗縠袍、袄衫绶”，“绵绮五百”、“吴越异纹绫八千匹、金条纱三千匹、绢二万段、绵九万两”等。^⑦南唐升元三年（939年）的诏书规定，“民三

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⑧这既反映了政府对植桑的鼓励，也显示了江南纺织产品的丰裕。

棉织业，此时在岭南一些地方也逐渐推广。

在染色方面，南唐著名的“天水碧”，得到推广，“建康市中，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⑨

五代时期的茶叶产地，多在江南九国。各国均有茶园，大量制茶。福建建安官焙36处，官私茶焙1336处；这些官焙，大都向附近茶农摊派采造任务，或者雇用茶工充役，年产量至少有五、六万斤。^⑩

2. 商业的繁盛

五代商业的繁盛，反映在区域市场、茶叶贸易、桑丝贸易、牙行势力、商业都市、海外贸易、商税收入等各个方面。这里简明地作些考察。

(1) 区域市场的活跃。五代时期虽然政治上分裂，但全国尤其是南方的商业一直在发展，商人来往于各国之间，沟通各地的贸易集市，从而加强各地经济的联系。这样，经济区域逐渐形成，并以某些大城市为地域性的中心市场。可以说，当时南方诸国的政权，基本上就是以这些经济区域为基础而建立的。如以成都为中心的蜀，以扬州为中心的吴和南唐；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汉；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以长沙为中心的楚。

(2) 茶叶贸易的发展。在频繁地相互通商的各国之间，茶商的活动最为突出。江南茶商几度越出国境，远贩幽州牟利，^⑪以至引起一些军吏的嫉忌，纷起贩茶。比如开平元年三月，庐龙节度使刘仁恭便“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⑫

南唐是最著名的产茶地。南唐商人，多以茶丝和中原交换羊马，甚至从海上和契丹进行贸易。公元938年，契丹“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其价市罗、纨、茶、药。”^⑬

湖南地区产茶也很多，贩茶收入相当可观，史载楚国“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⑭

蜀与中原国家也经常有茶叶方面的贸易往来。蜀中茶园也很多，官僚贵族往往自营茶园，规模很大。

(3) 桑蚕贸易的发展。在这方面，四川的“蚕市”最为著名。蚕市在唐朝已有，当时的成都，就是一个大商业都会，“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⑮至五代，蚕市的规模更大，桑树苗成为重要的商品。如果对桑苗的买卖征税，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据载，蜀帝王建就有过这种打算：

“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贸易毕集，阗阗填委，蜀人称其繁盛。而（王）建尝登楼望之，见货桑栽者不一，乃顾左右曰：‘桑栽甚多。徼税之，必获厚利。’”^⑯

(4) 牙商的活跃。牙人是一种交易中介人。其职能是沟通商品交换的双方。唐末五代时，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为牙人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牙商中开始分化出一些专营固定商品或专门从事单项商业活动的牙人——比如先后出现的“马牙”、“庄宅牙人”等。牙人的这种专业分化，表明牙商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牙人的同业组织——牙行，大约出现于五代。据载，洛阳市内“在京市肆，凡是丝绸、斛斗、柴炭，一物已上，皆有牙人”。^{①7}在唐末，商人与牙人往往不存在截然的界线，商人兼牙、或牙人兼商的现象颇多。而牙行的出现，则表明牙人内部矛盾的发展和牙人同商贾矛盾的加剧。由于交换的扩大，愈来愈多地需要牙人的沟通作用，牙人逐渐从一般商人中独立出来，并组成自己的同业组织，斡旋于商人或其他交换者之间。

一般认为，牙行势力的增长，是古代商品经济水平低下的一种反映，但是必须承认，五代牙行势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却表明当时商业的频繁和交换的扩大趋势。就是在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代，牙行的发展恰也达到它的顶峰。

(5) 商业都市的崛起。都市商业的发展，隋唐已比较显著，并有从西向东、由北向南发展的趋势。至五代两宋，又出现了郡县城市以外的工商业都市，或工商业都市的雏型。离商丘五里的“河市”就超过宋州州城。据王定国说，这里在五代时“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

这类工商业都市，大多来源于草市。“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①8}在五代时期，其中的一部分继续发展，到北宋时上升为镇。草市只是市集，由商业交换而起，升为镇，则成为新兴的工商业都市。市井繁阜，居民扰攘，并有常设的店铺，街市也粗具规模。北宋以后镇市经济的勃兴，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6) 海外贸易的发展。五代时的南汉，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国家。刘氏原是南海富商，上台后贪欲更重，商品贸易多带奢侈性。

闽王刘隐的祖父就是商人，因“商贾南海”，徙家广州，教南汉国王多鼓励商业。

泉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始自闽国。王氏兄弟特别重视沿海的商业，免除繁重的商税。泉州港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与南洋和西亚往来频繁，大批阿拉伯商人蜂拥而至。

吴越的海路商业也比较发达，经常和大食、日本通商；吴和南唐也从占城输入猛火油，并从海道再将猛火油输到契丹等地。

(7) 商业性税收的遽增。五代十国时，正税（两税）以外的各种杂税，种类很多，商税也有明显的增加。荆南作为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它的财政收入全部依靠商税，才勉强自成一区。楚的立国，也主要是依靠卖茶和通商。

上述情况说明，统治者已从单纯依靠地租致富，转向部分地依靠市场发财。五代的后梁、后唐等各朝经济政策，由历来依靠田租开始向依靠商业税过渡。

从各国间茶、桑、丝帛贸易到海外贸易，从牙商势力膨胀到各国商税收入的剧增，从商业都市的崛起到区域市场的活跃，这一切，反映了五代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具有较大的规模。而且，这种商品经济，正在封建经济内部，向纵深发展。

三、从商品经济的发展看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地位

中国封建制度的前期发展，大体经历了两次分裂时期。由于这两次分裂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由此而引出的后果，也不大相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经历了一次转折。这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一是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二是大量个体小农和工商奴隶，变为农奴或半农奴；三是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这里，表面上看是分裂割据所致；事实上，商业的凋敝同政权的衰落以及社会的分裂，并列为一个事物的共同结果。换句话说，作为封建庄园制根本属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发展到空前强化的程度。它的对面，就是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和世家大族势力的膨胀。这使得封建经济几乎无可挽回地经历了一次倒退。

隋唐以来，庄园经济逐渐瓦解，自耕农所有制发展起来。人身依附关系减轻，商品货币关系又显现出新的生机。五代时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背景的不同，主要在此。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五代时期全国政治上的分裂，和许多地域的相对安定，便有可能成为导致商品经济活跃的一种外在条件。尽管人们通常认为，在分裂时代，关梁禁阻，商税繁重，商业该是不能充分发展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较为次要的一个方面。

只有在区域经济之间的贸易已经达到民族市场的高度时，中央集权制才能获得巩固的经济基础，才会对本国的商品经济采取极端的重视与保护的态度。实际上，从战国到秦，从南北朝到隋，从五代十国到宋，无论商业有多大的发展，也根本没有出现过统一的民族市场，南北贸易和东西交流也始终没有超出转运商业的范围。商品经济本身的力量尚不强大，无力抵抗封建政权的控制；而统一的封建专制集权，除了在封建制上升阶段有进步意义而外，在后来的阶段中，是不能长久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市场，在这类情况下，统一政权往往本质上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业本身的发展，“到处都发展着生产面向交换价值的趋势，扩大它的范围，增加它的种类”等等；并且“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⑥这种解体作用，归根到底是与封建经济相悖逆的。所以，在一个封建制度发展得过于完善和成熟的国家里，封建政权对待商业的态度，必然也是严格控制，将其纳入封建经济的轨道。这样，商品经济必定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封建政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恰恰可能成为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沃壤。这个薄弱环节，包括某些王权的衰落和统一帝国的分裂。五代十国的江南地区，则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

五代商品经济前承隋唐，后启两宋。唐代以邸店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的封建性，在这时有所减轻；贩卖日用品的商业活动，则不断增多。在某些分裂局面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商业，一旦繁荣到新的高度，便会反过来否定那动荡和分裂的局面，要求新的安定

和统一的环境。各国之间的商业往来，促成了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于是，在封建经济结构内部，又酝酿着政治统一的因素。而且，商品经济本身的发展，也要求一个统一市场。这就为宋代的统一和商品经济进入空前活跃的新时期，奠定了基础。它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不是倒退，而是一大进步。

宋代这种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导致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前期向后期的转折。而在这个转折过程中，五代十国的历史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它在商品经济发展上对日后社会的贡献，虽然仅仅是历史全局中的一个方面，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① 《范文正公奏议》卷上《管手诏条陈十事》。

② 《十国春秋》卷八九《僧契盈传》。

③ 《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武肃王世家》（下）。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八八五页。

⑤ 《东溪试茶录》。

⑥ 《吴越备史》卷二《武肃王》（下）。

⑦ 《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武肃王世家》、卷七九《文穆王世家》。

⑧ 《十国春秋》卷十五《南唐列祖本纪》。

⑨ 《五国故事》上。

⑩ 《能改斋漫录》卷八《地理》。

⑪ 宫崎市定：《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

⑫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

⑬ 陆游：《南唐书》卷十八《浮屠契丹高丽列传》。

⑭ 《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马殷传》。

⑮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

⑯ 《五国故事前蜀王氏》。

⑰ 《五代会要》卷二六《市》。

⑱ 《资治通鉴》卷二八一，胡三省注。

⑲ 《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人资本历史的考察》三七一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凌峰



我的文学批评观

——广东青年文学批评家十人谈

张奥列（作家协会广东分会）：

当今文学批评，已经同哲学、美学紧紧融合，具有宏观的气度，思辨的色彩。批评回到了自身，不再是创作的附庸。它具有独立的意识，自身的价值。但是，文学批评的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是否又潜藏着某种令人思虑的东西呢？

文学批评观的多元，是批评个性的寻求。今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批评模式，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去进行文学批评。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可以是鉴赏评判的，也可以是哲学思辨的；可以远距离审视，也可以近身切入。但不管何种方法，都离不开批评的研究对象——创作本体。

然而时下一些批评，在强化哲学思辨中似乎失之于抽象、空泛，失之于概念的玩弄。这样的批评对于创作究竟有什么作用？对读者有多大影响？文学可以与哲学交叉，但哲学不能代替文学批评。

我以为，文学批评应该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一起进行的精神创造活动。

批评不光是创作的继续，在文学的大系统中，批评和创作是对应、互补的，是共时态的活动。批评也不是一般情感的宣泄，它是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的自我表现。批评又不仅仅是生活的阐释，它更是审美的价值判断。

可以说，作家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审美情感，批评家则借助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来阐述现实生活的认识和审美价值判断。因此，创作与批评是各自独立的、平等的而又紧密相关的，是一种共同的创造。

文学批评的个性和功力，是在创作现实转化为理论批评现实的过程中实现和显示的。

郭小东（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

我没有什么批评观，我觉得我一向是凭感觉，即印象写，或者说是凭体验在写。如果说，文学是一种不动声色的体验，那么，批评更是一种体验。我赞成并鼓吹批评应该是批评家经过痛苦的人生体验后的一种人生态度，是这种人生态度对对象的宣泄。

我有些怀疑，我们今天的某些文学批评，对于人民的生活，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曾经或者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人民看不懂。我们扪心自问，也觉得缺乏一种真诚。一种来自对人民痛苦、欢乐与要求的体验。我们，作为一个青年评论工作者，我对这种批评的前景不乐观。与其写脱离或悖离生活体验的文章，倒不如写点切近人民的小说。

我觉得我愈来愈不会批评，作家有敏感区，批评家也应有敏感区，要依据自己体验的独特性，去发见自己的敏感区，这样，批评的个性化就成为可能。

但话说回来，作为批评主张，我以为文学批评应以宽容——承认批评是以对文学创作互补为目的的选择，而不仅仅是一种裁判——的愿望为最佳心态，它是对文学创作尊重、理解、知之深并使之对象化的最短之桥。批评的苛责与恃刚因此消弥，批评的睿智与良苦、博大的胸襟由此产生。它与泛爱论无关，而是一种宏观的思想，它将在批评的微观过程产生难以言喻的烛照。

文学批评家宽容的至境，是瓜熟蒂落，百川归海式的精神大观，它显示批评能透过文学与人生的纷扰充分地理解阴晴圆缺，是学者的宽容。它的鼓与呼的热切，解剖与评判的严厉，与谆谆善诱、客观公正是为同义语。它因之能使文

学批评，既站在生活与文学之间，又介入文学也介入生活，同时又超越其上。它的选择，更多是直观的、描叙性的，又是宏观的，多向多元的考察与检视。文学批评越是以宽容的愿望为出发点，它就越能获得良好的评判效果，越深刻地认识对象并被视为诤友。

陈志红（广东省文联理论研究室）：

我认为，文学批评既是一种情感体验，又是一种理性评判。它不是纯思辨的，它的批评对象是文学作品这个特殊的世界，批评家必须具备良好的艺术感受力，必须有丰富的情感层次，才有可能接收作品发射出来的情感信息。但批评家的任务并不在于把作家已叙述过的情感再叙述一次，而在于将这种情感体验进行一种观念意义上的描述、概括和升华。因而它同样是一种创造。现在一些批评文章，只停留在情感体验的一般叙述，缺乏一种再创造的精神，显示不出批评的理性力量。文学创作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思维过程，它的活动轨迹往往是非连续性的，偶然因素非常多，具有一种模糊性和不稳定性，这给文学批评所必需的科学性描述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文学创作的思维过程究竟有无规律可寻？文学批评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我觉得国内批评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还没有新的进展，不管结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能引出二律背反的论据。文学批评确实不是一碗好吃的饭，它向批评家们提出的要求是理解、顿悟和理性思辨的综合能力，这样大概能够达到一种既渗透作品又能超越作品的境界。

陈剑晖（海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批评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建构。

批评不仅仅是一种选择，不仅仅是一种阐释，也不仅仅是一种评判，从人类历史文化哲学来看，批评乃是一种历史文化活动的认同。艺术家借助现实和自然同世界对话，而批评则是借助艺术这第二自然和世界对话。

历史文化建构的批评包括四个层次。一是批评家要有历史文化的观点、胸怀和眼光，并以此作为参照来确定批评的位置。二是批评家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这样才能在当前纷衍复杂的文学面前确定自己的位置。如对当前的“寻根”小说的批评，就需要具备历史知识。三是对于个性

化的创造活动的渴求。从人类文化哲学的系统来考察，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活动，它的存在正在于它的创造、它的发现。历史文化批评的第四层次，是对人生真理的追求。因为批评不但是一种二度创作，而且是一种人生追求的方式。批评家不单单是作者的代言人，而且是它的时代和社会的代言人，是代表一种历史文化在发言。

总之，历史文化批评是一个系统，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引进历史文化批评的方法，将可以使新时期的文学批评获得一种全方位的观察角度，使批评从以往的狭小框架中挣脱出来，以一种宏大的新姿呈现于人们面前。

贾益民（暨南大学中文系）：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尴尬的难题。在世界范围内，二十世纪被公认为是“批评的时代”。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理论、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批评等各种派别，无不以独自の审美方式观照文学。新的理论姿态和精神风貌展示着人类文明的丰富、发展，形成了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独特个性。但文学批评作为批评家的审美感知对于种种文学现象的审美观照，在我国近年来的批评论坛上是否形成了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批评观”，对此，我感到惶惑不安，况且每个人对“批评观”的理解迄今尚存有若干分歧。然而作为批评观的建构还是可以探讨的。我认为文学批评观的建构应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干预性的人生态度，这是批评观最重要的美学内容。批评一方面要用整个生命去拥抱文学，一方面要通过文学来观照历史和人生。文学首先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精神结晶，如果把文学从社会历史中抽出来，将其悬浮于空中进行自我玩味，便失去了批评的美学价值。因此，批评家必须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通过批评不仅使批评对象获得新的艺术生命，而且要塑造一个理想的、日益丰富的人生世界。二是开放型的思维方式，这是批评观不可缺少的逻辑内容。文学批评所展开的新的人生观照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批评意识和思维方式，用以捕捉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情感体验，多层面、多角度地感觉、认知和判断各种文学现象所展开的艺术情景和人生世界。因此，要敢于冲破僵化的旧思维模式，开拓更广阔的新思维天地，使各种

批评思维自由驰骋。唯其如此，文学批评才能充分显示出积极的主体意识。三是批评文体的更新。这是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的干预性人生态度和开放型思维方式的感性显现；它不仅标示着一个批评家独特的批评个性，而且也展示着时代文明的精神风貌。同时，我还认为，以上三个层面的有机联系，必然是更为深层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批评观念的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能建构起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观。

潘智彪（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艺术批评是人们整个艺术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价值就在于发现艺术作品的美，或者是帮助人们去发现艺术作品的美。艺术创作是对美的发现，艺术批评也是对美的发现。最高的批评也就是创作。艺术作品只是一种潜在的美，只有经过鉴赏与批评，艺术的美才能实现。人人都可以从作品中发现不同的美，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莱特。所谓批评就是从各自的角度谈出自己对艺术作品的真切感受与体验，而专业批评家的审美感受则可能更为敏锐些，其语言表达更为系统些。唯其敏锐、唯其系统，艺术批评才有可能揭示出作品的美，才有可能既指导欣赏，又反过来指导创作。

艺术批评的价值有三个层次的存在。第一层次是指导欣赏，以其美感的敏锐帮助广大群众发现艺术作品的美。好的批评甚至其本身也能给读者以审美的享受。其次是指导创作。批评家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向作家提出更高的审美要求，提供反馈的信息。再次是批评理论的探讨，也包括批评的批评。我们目前的批评大多还处在第三层次，一些是处在第二层次，但第一层次即以批评指导最广大读者的欣赏这一工作可以说还没有普遍受到重视。青年批评界存在一种追求玄思的风气，有的甚至把具体的文学作品当作是批评家本身艺术观念的注脚，以冷冰冰的哲学家的态度来拆解作品，条分缕析。一部活生生充满情感的作品，经批评家的批评，便变得四分五裂，只剩下几点干巴巴的理论教义。

艺术欣赏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本质的评价。这种评价可以反过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但往往一旦进入这一阶段，评论家的审美态度就不见了，他们变成了教父。理性的评价不能还原为直觉的感受与体验，这种评价对艺术便毫无意

义。因为艺术欣赏中最可贵的就是对作品中蕴含审美情感的直觉感受与体验，艺术的特质在于情感而不在于理性的认知。

何 龙（暨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文艺批评应是对对象的感性描述。对美的事物的深切感受能力是批评者的基本素质。批评者应能神游广袤的作品天地之间而记其名胜。这是批评的基本层次。在这一层次里，批评者既是翻译家也是解说员。他把形象思维翻译成抽象思维；他为读者解说作家的意图和作品的意蕴。文艺批评又是对批评对象的知性透视。对美的事物的深刻知解能力是批评者的特殊素养。批评者应能探视深厚的作品底层而掘其矿藏。这是批评的第二层次。在这一层次里，批评者运用知性悟力，对作品进行判断选择，捕捉从作品上折射出来的时代意识，社会风貌和作者、读者心理。这两个批评方式是我国古代常用的“感悟”式批评，由于它停留在感性和知性阶段，缺乏系统意识和整体观照，固限较多，因此，文艺批评应上升到对批评对象的理性概括。这是批评的最高层次。在这一层次里，批评家以哲学家的博大，思想家的深刻，社会学家的恢弘，未来学家的敏锐以及探险家的勇敢，俯视文艺现象、文艺思潮和文艺规律，回眸于作家、作品、读者、社会现实乃至天地宇宙之间，对批评对象作宏观概括和发挥。这是一种超越自我，超越现象的批评，它通过作品这一运载火箭到达太空，向星球和宇宙探秘。

感悟式的批评起启美启知的作用，理性概括发挥式的批评起启心启智的作用。一个“重量级”的批评家，他就不应该在作品的堂奥里流连忘返或徘徊不前，而应能从人类学的高度君临批评对象，把对象置于超越时空的参照系中进行判断选择和发挥。

谭加洛（广州师院中文系）：

我认为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是一种创造。

既然批评观是批评家世界观、哲学观、美学观等等的综合体现，那么批评也可以说是批评者的自我表现。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是一位批评家，都有权利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作品，而一部作品可提供给读者的感受越丰富，这部作品的魅力就越大，价值就越高。所以，文学创作应该是读者和作者共同完成的。批评是创作的延续。作为一

个教师，我痛感现在大学文学课枯燥乏味。评价什么，往往先有既定不变的结论，然后才是逐层阐释、说明。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常常被肢解得只剩一具尸骨。现在的学生缺乏想象力，和我们（从中小学就开始）的破坏美感的文学课教育有很大关系。

批评家应该有敏感的现代意识。站在什么审美基点上进行批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考虑一下。香港片《似水流年》上映后，内地评论多表现出一种困惑。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用美丑，善恶，忠奸的尺度去衡量作品，而西方从十九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就已经放弃了古希腊以来传统的以“美”为中心的审美观。求真，成了西方现代派的审美基点。这是否代表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向，我不敢妄下结论。我只是觉得时代在变化，我们应该努力使自己站在时代的潮头上。

李挺奋（海南文联《天涯》杂志社）：

批评的导向功能（当然只是批评的诸多功能之一）的提出，可能引起非议，甚至为某些作家所不屑和愤慨，但在整体性的文学航轮中，它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刚冒胚芽，别林斯基便慧眼独具，为其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把握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前景，导来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潮。

马拉美于法国象征主义诞生伊始，便认为它代表了未来诗歌发展的方向，果然，象征主义经过几十年，终于成为风靡全球的文艺运动。

导向不是臆想，不是强加于人。它是批评家的富于穿透力的美学预见，是对于文学史的必然趋势的把握，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俯瞰文学，预测文学大河的流速及走向。

这才是批评的最高层次，才是批评的主体意识的充分体现。居于这个层次，批评家们就不仅是赏花行家，而且可能是某一盛大花会的设计师；就不仅是创作大军的服侍团及并肩作战的战友，而且可能是大受作家尊重欢迎的“参谋长”。

创作主要是感情的，批评则主要是理智的。批评家往往比作家更冷静和清醒，更善于对文学作整体的观照和把握。

批评的导向功能，可以表现在对于某一艺术流派的发现和鼓吹，对于某一区域文学的考察和设计，对于一个民族文学未来面貌的构想和描绘，甚至可以表现在对于整个世界文学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把握。

有更多的批评家们重视导向性的文学理论建设，批评便愈会显得举足轻重，我们的文坛才有可能出现别林斯基式的、马拉美式的、歌德式的大批评家。

陈实（广东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在我看来，文学的认识功能无非是“再现”与“表现”，而批评的作用则在于回答文学再现了什么，又是怎样表现的。

“批评”的希腊文本意是“判断”。批评的本质是一种心灵的理性思考，是批评家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来对文学创作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由于个人知识、智慧和艺术感觉能力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批评个性。作为一个真正意义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始终是为了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而发的，它不能失去对人生、生活、生命价值的清醒感觉，不能失去整体的社会感。换句话说，批评是有指向性和目的性的，批评家同时应该是思想家，他阐释并发挥作品的思想意义，唤起贮存在人们意识底层的主动精神，并以这种精神去塑造他们的环境。

批评家又不能仅仅满足于作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缺乏艺术家的素质，缺乏艺术的感觉力，缺乏艺术的敏感和胆识，他就容易变成一个面目冷峻的法官，从而使批评丧失艺术的活力，成为一种毫无感情的精神折磨。从这一点来说，批评家必须具有强烈的艺术热情，他应该宣泄自己，表现自己，释放内在的自我，在作品庞大繁纷的表征中发现那幽暗闪光的艺术魅力，唤醒人们心中的艺术审美情感，使人们浸润在艺术的温泉中，去享受和品味那舒适的美。

至于批评的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我主张不同的作品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哪一种方法能把作品批评得透彻，就用那一种方法。

责任编辑：张硕城

关于岭南文化艺术的历史观察 与美学思考(研究提纲)

许翼心

(一)问题的提出

1. 有没有一个岭南文派?

在今年初的广东中青年作家创作实践研讨会上,老作家吴有恒作了题为《应有个岭南文派》的发言(见1986.8.10,《羊城晚报》),他提出:“既然有岭南画派,有广东音乐,那就应有个岭南文派”。“岭南文派有一个特色是开放,是新潮。”“岭南文派应力求以新奇取胜,而不以古朴见长。”“岭南文派,应该有,但尚未有。似有实未有。它还未有足够数量的作家,还没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作品,关键在于新起的一代。”这就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岭南文学的命题提了出来。

2. 近年来对岭南文学的研究状况

广东对于岭南文学的研究一直处于不自觉状态。近年来,情况有所转变,但基本上还只停留于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谢望新、李钟声的《岭南作家漫评》,集中评价了老中青三代二十四位当代岭南作家及其作品,“反映了岭南文学界的一个大体的轮廓,”可惜欠缺一篇宏观的总体研究文字,更未能提出文派的问题。

首先被当作流派提出的是岭南散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陶铸同志的倡议下,广东文学界曾就以秦牧、陈残云、杜埃、杨石、韩北屏和林遐等六家为代表的岭南散文开展讨论,但很快便由于政治的原因而中止。前两年,郭小东发表专文探讨岭南散文的流派风格,也未能引起深入探讨。

近一年来,《岭南历代诗选》(陈永正选注)和《南国诗潮》(陈颂声、邓国伟选编)的出版,是对岭南诗歌研究的重要成果。两部诗选的前言与后记,对岭南诗歌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思想、艺术风格进行了初步的概括。

对于具体作家、作品与个别文体的研究还有待扩展和深入,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形势已要求我们从微观走向宏观，这就必须对整个岭南文学乃至岭南文化进行历史的和美学的总体研究。

3. 对于岭南文化艺术研究的我见

近几年来，在研究香港地区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港粤文学的不可分割，我开始发现与思考关于岭南文派的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香港新文学传统》一文（1986.10，《广东文坛报》）中，我以黄谷柳的《虾球传》、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和陈残云的《珠江泪》等为例，认为：“值得重视的是，一批岭南作家的作品的出现，以鲜明的南国色彩和浓烈的海洋风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1985年4月，我在提交“香港文学研讨会”的论文《香港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刊1986.1，《广东社会科学》）中，明确地将四十年代的岭南作家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提了出来，文中除了列举包括小说、剧作、诗歌、散文的重要作家作品，及其在题材、艺术形式与风格等方面的共同特点之外，进一步提出：“这一批岭南作家和作品在香港文坛的涌现，及其特有艺术风格的展露，实际上显示一个长期来被文学史家所忽略了的现代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对后来的香港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应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与特殊的地位。”

从这里出发，我向上寻根至古代、近代的岭南文学，向下联系当前文学实际，横向及于岭南画派、广东音乐、戏曲等各个文化领域，请教了包括吴有恒在内的许多文艺界前辈，进行了对岭南文派和岭南文化艺术的历史观察与美学思考。

（二）岭南文化的历史传统

4. 中原文化入主岭南

岭南古为百越之地，古百越民族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然千百年来，文献欠征，除了“越人好歌”之类片言只语，我们只能从文物考古与民俗调查中去追寻。

秦汉以来，国家统一，人民南迁，先进而强大的中原华夏文化传播岭南。唐宋以降，以韩愈、苏东坡流迁岭南为标帜，韩潮苏海，席卷岭外，岭南文学正是在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据文献记载：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被推为是“粤诗之始”，唐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公认为岭南文学的一代宗师；两宋间，余靖以其朴老之作，“净洗西昆铅华”，赵必瑑慷慨悲歌，“颇近文文山”，但都未能真正做到“一空依傍，自立门户”。

5. 岭南文坛从结社到成派

宋明以降，城市经济和市民文学的兴起，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中原文化大受冲击，而地处岭南的广东文坛，却在有明一代先后出现了“南园五子”、“南园后五子”和“南园十二子”，由结社而成流派。但其文风依然是“上追三唐”，“还之风雅”。

真正建立岭南文派的是由明入清的“岭南三家”，其中屈大均以《广东新语》一书述评

总结岭南历史文化，其诗作才气纵横，意象雄奇，开一代新风。其后，黎简、宋湘等人更刻意求新，流风及于近代。

前人评价岭南文风，褒之者赞它“尚得古贤雄直气”，贬之者斥为“偏方之音”。王士禛以为“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薰染，故尚存古风耳。”（《池北偶谈》），可谓的评。既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又不超越中原古朴遗风，这正是岭南文化的传统特质。

6. 岭南通俗艺术的地方特色

如果将眼光从诗文转向民间通俗艺术，岭南传统文化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就更加明显。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市民艺术的兴起，这在率先开放的岭南影响尤深，民间戏曲、讲唱文学都极富地方色彩，自成一格。明中后期的三本潮调戏文《荔镜记》、《苏六娘》、《金花女》和两部粤语木鱼书《花笺记》与《二荷花史》，尽管尚未脱去才子佳人的套套，却以向封建礼教作更大胆反叛的风格而流传中外；招子庸的《粤讴》不仅继承了“粤俗好歌”的传统，而且更具有强烈的市民意识；乾隆间的章回小说《岭南逸史》和《三春记》把岭南民情风俗作了集中的展示；而禺山老人编的《蜃楼志》，更是一部描绘岭南开放以来洋场官商风貌的难得作品，它上承《水浒》、《红楼》传统，下开《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先河，对近代岭南文派的影响甚大。

（三）近代岭南文化的形成

7. 从西学东渐到文体革命

从广东开始的鸦片战争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之门，洋枪洋炮迫使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道路引来了西学东渐，进而倡导变法、革命。率先对外开放的岭南，理所当然地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发难于岭南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终结，它在政治思想上并未具备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文化上也没有新的建树。倒是因太平天国的牵连避居香港二十二载，自称“半个岭南人”的王韬，“不啻为前路之导”。他译书办报，介绍西方文化，鼓吹变法图强，并创造了报刊政论的新文体，直接影响了黄遵宪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为宣传变法改良主张，不仅发展新文体，进而倡导诗界革命、小说革命和戏剧改良，他们从岭南发端，推向全国，揭开了中国文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序幕。

8. 近代岭南文学的重要地位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包括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岭南人才辈出，思想开放，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革新潮流。

倡导这股文学革新潮流的不是康有为，而是梁启超，并且主要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尽管后来他的政治思想日趋反对革命，但他的文学主张，包括求变求新，重实重

俗，强调文学为政治变革服务，强调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的作用等等，都为革命派所接受并加以发扬。

近代岭南文学成就最卓的有八大家，除康、梁外，有诗界革命的巨擘黄遵宪和自台湾回粤的丘逢甲，有以小说《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和《九命奇冤》称著的我佛山人吴沃尧，和作《洪秀全演义》的革命小说家黄小配，以及粤籍的南社诗人苏曼殊与黄节。近代岭南文派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不仅领导新潮流，而且占了半壁河山。

9. 近代岭南文化艺术的全面变革

在文学革新运动的影响下，岭南文化的其他领域在辛亥革命前后也发生巨大变革：在戏曲方面，革命党人陈少白、黄鲁逸等创作新粤曲，编演白话新剧，继而改良粤剧，唱平喉，用粤语，吸收西洋乐器，影响及于潮、琼、汉剧；在音乐方面，与戏曲改良同步，“何氏三杰”与吕文成等改造传统乐曲，吸收西洋音乐的乐器与演奏方法，创造具有时代感的广东音乐；在美术方面，同盟会员陈树人和高氏兄弟提出国画当随时代而变，吸收西洋画笔法与东洋画技巧，创造崭新风格的岭南画派。

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与共同繁荣，开拓了岭南文化的新局面，以其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南国色彩与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屹立于近代中国文化之林。然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不彻底性，特别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框架，也给岭南文化造成明显的局限。

（四）现代岭南文派的崛起

10.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岭南的影响

五四运动在广东产生巨大的反响，推动了后来的工农运动、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它对岭南文化的影响却并未引起巨变，成效迟微。究其原因，正是民主革命中心的环境所造成：一方面，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无暇顾及文化，正如鲁迅指出的，在革命高涨中，人们忙于革命行动，便没有革命文学；另一方面，广东社会的民主、开放风气，不同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上海，人们缺乏强烈的要求文化解放的变革意识。因而，尽管当时也出现过一些新文艺小团体，但岭南文化的主流仍然是近代文化的延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连这点新文艺的星火也几乎被反动派扑灭下去，进步文化人或转赴上海，或避居香港、海外。

11. 现代岭南作家群的形成

三十年代初广东进步文化活动重新恢复时，还只限于“左联”、“社联”等秘密团体；到1936年在抗日救亡高潮中成立“广州艺协”，岭南新文艺队伍才初具规模。随着北平、上海沦陷，文化人纷纷南下，广州和香港先后成为抗战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岭南的新文艺队伍也逐步成长壮大。

解放战争时期，进步文化人再度荟集香港，香港成为解放区与国统区以外的一大文

化中心。其中，一批从内地南下和海外归来的岭南作家，包括黄谷柳、司马文森、陈残云、黄宁婴、陈芦荻、楼栖、林林、杜埃、华嘉、秦牧、黄秋耘等，他们经过八年抗战的洗礼，思想、生活和艺术已走向成熟，成为当时活跃于香港文坛的骨干队伍；他们在南方党的领导下，以《华商报》副刊、《文艺生活》和《中国诗坛》海外版以及“人间书屋”为阵地，组成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岭南作家群。

12. 现代岭南文派的成就与特色

现代岭南文学是否已形成流派？答案是肯定的。作家队伍的情况已如上述。还应指出：这批岭南作家当时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解放区革命艺术的学习，已形成了共同的明确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创作实践上，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很突出。除了《虾球传》（黄谷柳）和《珠江泪》（陈残云）等当时具有全国影响外，其他代表作尚有《南洋淘金记》（司马文森）、《南洋伯还乡》（残云）、《贱货》（秦牧）、《在吕宋平原》（杜埃）等小说，《民主短筒》（黄宁婴）、《旗下高歌》（芦荻）、《鸳鸯子》（楼栖）和《阿莱耶山区》（林林）等诗集，以及华嘉、秋耘、秦牧等的散文。

关于现代岭南文派在创作上的共同特色，我曾初步概括为：“在题材内容方面，生动地反映省港与粤闽水乡、侨乡和华侨社会的生活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地方特色；在表现形式方面，注意借鉴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学，尤其善于从通俗文艺中吸取养料，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倾向；在艺术风格方面，富于热情开朗的海洋风情与流畅明快的南国色调。”（见《香港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13. 现代岭南文化艺术的不同路向

近现代岭南文化是一个兼容善变的复合体，当革命形势发生巨变之后，便呈现出不同的路向。大革命失败后，除了岭南文学走向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流，还出现纯艺术与商业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

以岭南画派为代表，一些画家从民主革命潮流中退避出来，转而追求纯艺术，艺术形式上的不断创新与内容方面的脱离时代精神成正比例。一部分广东音乐也如此。

以粤剧省港大班为代表，在商业社会的竞争中从求新善变走向商业化道路，从通俗化走向庸俗化，明显地打上殖民地文化的印记。

这与恶性“海派”文化颇相类似并相互影响。部分广东音乐、戏曲、曲艺、粤语影片以及通俗文学，情状亦大抵相同。

（五）近现代岭南文化艺术的美学特征

14. 近现代岭南文化的特质

近代岭南文化和现代岭南文化是两个不同革命阶段的精神产物，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与时代特点；然而它们又同属于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在文化精神和美学风格上有着不可分割的承传关系与共同特征。

近现代岭南文化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文化形态，它形成于率先开放的南

方商业都市与革命中心，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变革精神的溶入，使它明显区别于比较保守凝固的传统京派文化，而更接近于现代海派文化。

岭南社会与海外华侨社会的血缘关系以及岭南文化独特的传统色彩，使它更具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求实作风，民族心理与地方特点，因而又明显区别于海派文化，表现了自己的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

15. 民主开放的时代精神

近现代岭南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精神。民主革命的要求，对外开放的态度，追求新潮的取向，构成了近现代岭南文化的精神特质。自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来，从《九命奇冤》到《珠江泪》，从《日本纪事诗》到《在吕宋平原》，乃至陈树人的《灞桥诗思图》，何氏叔侄的《赛龙夺锦》，无不洋溢着浓烈的时代精神。

迅速反映现实，不断追求新潮，是艺术生命常新的保证。然而，只顾当前现象，过分追求变异，而没有与深刻的历史反思相结合，就往往会流于浅薄。鲜明的时代精神而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可说是近现代岭南文化的“二律背反”。

16. 求新求俗的创作态度

开放变革意识表现在文化创造上，就是求新求俗，这也是从梁启超等在倡导文体革新时所极力鼓吹的主张。注入新的内容，吸取新的技法，运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形式，成为近现代岭南文化的一大特色。从黄遵宪的《今别离》到楼栖的《鸳鸯子》，从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到黄谷柳的《虾球传》，求新求俗的创作态度一直传承下来，岭南文化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求新求俗，应当同对美学理想的执着追求相联系，才能开拓新的艺术境界。片面的竞相新奇，会使艺术走向商品化；而过份的趋时媚俗，又会导致艺术的庸俗化，三、四十年代粤剧艺术的歧路，以及恶性海派文化，前车可鉴。

17. 开朗明快的艺术风格

岭南社会地处亚热带，面向海洋，传统的“雄直”文风与近代的开放精神相结合，形成的岭南文化热情开朗、流畅明快的艺术风格，无论诗文、影剧、音乐、美术都共此特色。

西方的传统美学，把美的范畴分为悲壮美（壮美）与秀丽美（优美）两种；我国的传统美学评价，则区分豪放与婉约两派，北国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南多缠绵悱恻之情。以此来评价传统的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恰如其分，但用它来衡量近现代岭南文化，就很难适从。

美的范畴应当是多元而不是二元的。明快美，是区别于悲壮美与秀丽美的另一种独特的美。它情绪热烈，气度开朗，旋律流畅，节奏轻快，应当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追求的一种新的美学规范。岭南文化正有此优长。但必须注意，过分地追求轻快也容易流于轻浅粗疏。

作者单位：广东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张硕城

詹安泰词论追记

邱世友

祝南(詹安泰)先生离开我们将二十年了!先生讲授诗学,以高迈之识运宏博之学,考证、评论、深揭诗歌的底蕴,读者从《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见《古典文学论集》)略可知之。先生在治诗的基础上治词,词学学术深造自得,于词的源流正变、风格流派乃至技法韵律,条分缕析,对词的内部规律、词的特性和特点有较全面较透彻的认识。今所刊行的《宋词散论》、《詹安泰词学论稿》、《李璟李煜词》、《古典文学论集》中有关部分,以及将刊行的《花外集注》,可以见到先生的词学修养和业绩。可惜的是,先生的词学讲稿和著作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散失了。今仅据当日先生讲学的笔记残编并参以现已刊行的著作,概述如下。

有清一代,考据之学盛行,乾嘉两朝成绩辉煌。桐城文派又倡为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之说,虽未尽付诸实现,但影响并不小。先生学术发轫于辞章。而辞章合考镜史实、究明诂训和阐发义理四者,先生称为经史子集之学。如先生谈到词集笺释时说:“要明故实、辞藻、音训、义理。前者为史,次者为集,次者为经,最后为子。”这是说经史子集的特点都应为词学所包容。显然,先生之学是在这个学术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词学,单就考据方面说,除历史考证、文字训诂,还有校勘、版本诸方面。但词的考据作为一门学科,是直至晚清王鹏运、朱祖谋诸人才确立的,而且发展颇为迅猛。先生尤重历史考证,这是为了探明词的历史背景、历史事实,从而探究作者的词心所系、阐明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的。“词选”一科,讲到南宋词多寄托,宋末词人尤多兴亡之感时,先生为了证明所寄托的具体历史事实,曾作了如《杨髡发陵考辨》(见《古典文学论集》)这样翔实的有学术价值的考证。给研究和评论这一时期的词人词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与历史考证有密切联系的是词的寄托。先生素重词的寄托。周济倡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论,况周颐有即性情即寄托之说。先生于词的评论和创作都本二家之言而加以发展,并兼采浙派的空灵醇雅,认为性情所发,寄托乃真,意境空灵,寄托始深。先生很不满意张惠言言寄托的穿凿附会,对王国维否定张氏之说也不以为然。先生认为张氏之失乃时代之失,盖其时虽考据之学盛行(张氏《词选》成于嘉庆二年),而词学考证之科还未确立。张惠言失于考证,是难免的。这就提出了研究词学应有历

史观点的问题。先生认为，有寄托之词可当历史读。这是因为，“作者之性情、品格、学问、身世以及其时之社会情况，有非他史所能明言者，反可于词中得之。”这说法较周济“诗有史，词亦有史”更为具体深入。这不但见于《论寄托》一章，也见于当年先生讲授词学。但先生释词又往往不斥言寄托，不指实史事，而于浑涵中令学生感到有寄托又无寄托，空灵蕴藉，意旨深微。先生释词如少游《踏莎行》“雾失楼台”二句，曰：“用‘失’用‘迷’，固以造暗淡苍茫之境。然主观情意亦寓其中，政事亦作如是观。”这正是先生考证了当时党争所导致的政治暗淡和少游贬谪郴州的身世遇遭后所作出的分析。又释史邦卿《双双燕》云：“‘还相’两句画工，‘红楼’两句化工。自今日观之，化工较画工高。托意甚深，时主昏庸，权奸误国，以及人民热望，皆可作如是看。”先生不从贺裳之论而从白石、静安之说。但二人未言化工之妙在于寄托。先生既揭示寄托之意，且又有讽于当时国统区的政治，于“自今观之”一语可知。寄托有具体的史实可稽者，先生既引证而论说之，但又作浑涵点示。如释白石《庆宫春》过片“正凝想明珰素袜”，只云：“有寄托”，“由身世之感联想家国之恨。意者指两宫北上事乎！”所谓“明珰瑶瑟，素袜香尘。”因有寄托而似无寄托，故先生评云：“空灵荡动，一片神行，绝无钩勒痕迹，真是化工之笔。”或云此词为怀念小红而作，柔情绮怀，能为高调，“可知见仁见智在于浑涵耳。”又释稼轩《菩萨蛮》云：“稼轩有志于匡复，而周必大妒其才而止之。词中托言鸬鹚行不得也哥哥；”并且说：“家国之感，后主显而稼轩隐，其位各别。”这正是先生言寄托能入能出处。能入，把周必大的妒才，视为该词的历史具体事实；能出，把家国之感隐然寄于词外。能入，故“精力弥满”；能出，故空灵跌宕。又咏物词当以有寄托有感慨为上，若仅以题红刻绿，摹写物状为能事，与方物略、群芳谱何异？浙派末流动辄和《乐府补题》咏蝉咏蕤而殊无寄托，惟协律、侔色相尚，犹自以为宗南宋，朱、厉嫡冢。其实正如谭献所评：“《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篋中词》评厉鹗语）古意者何？如先生所称，宋末词人身经亡国，托物寄意之谓。先生释词既遵常州派比兴寄托，亦本浙派空灵醇雅，上闡玉田的清空，下扬复堂的“别有怀抱”；取精用宏，构建己说。如先生论碧山咏物词的成就，于《寄托论》一章及《花外集注》可见。南宋将亡已亡之时，咏物词最多，既非题红刻绿，而有寄托，但先生教人不可胶柱鼓瑟，字字都合乎当时的事实，如鲇阳居士释词，把艺术真实和历史事实混同起来。这虽然是从周济论寄托演衍而来的，若无现代典型论依以阐发，也不可能提出如此明确的观点。先生同时代步伐一起前进，发展了常州派的寄托论，这是显然易见的。

主南宋者以为“词至南宋而深”。先生尝从南宋词寄托的特点理解这一“深”字有深隐之义。先生谓北宋晏同叔《踏莎行》、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固然是有寄托之词，但寄托不怎样假思索就能或知其所寄的党争，或知其所寓的不幸遭遇。所以北宋寄托不可谓之深隐。而南宋后期出现了表面上咏物而实际上是影射国家大事的词篇，以无知的物类抒发对国家重大问题的观感，隐含深意。稼轩《摸鱼儿》晚春“斜阳烟柳”固不待言，碧山《天香》赋龙涎香、《妩眉》咏新月、刘辰翁《宝鼎现》、《兰陵王》丙子送春、张玉田《疏影》咏荷，

以及前所列诸阙都写得隐轸回曲，若即若离。表面是描写景物，但联系到时事的实际情况，深入观察体会，又可窥知其意托所在。即使如此，由于词的意象的多层次性，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理解，止庵所谓触类多通，浑化无痕。前面说的白石《庆宫春》，或指两宫北上之事，或为小红而作，见仁见智，理解的角度极为不同。这样做，固然是词人为了避文网，也表明这一时期的词作，艺术向纵深发展，创造出转折层深的意境，体现了“极其工极其变”（朱彝尊《词综发凡》）的时代特点。先生释“深”字无疑是独到的，和典型化理论有关，因为典型化愈强，就愈具普遍性，词的意象就愈多层次，词的隐轸回曲不止在于词的技巧。

二

词如绘画，最重虚实。在词的技法方面，如能成功地运用虚实的辩证关系，无论构思、结构、布局、描写和造境，都可以获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对词的虚实相生、相足、相映，以实写虚，以虚写实，先生体会颇深。稼轩《念奴娇》“野塘花落”阙，“楼空”两句不说旧游都杳，而云飞燕能说；不说自己不见，而云行人曾见。以热闹的景况发“楼空人去”寂寞之感。愈热闹愈寂寞，以动态表静境，运思奇创。过变“帘底纤纤月”三句写往时所爱者的纤步犹为行人所见，疏宕空灵；“旧恨”两句则以持重之笔顿住，而今昔之感寄焉而深，虚实运用极为成功，健笔化为柔厚。先生曰：“读此词可悟虚实相生法。”先生释白石《八归》送胡德华阙：前片“送客”二句入题旨，属虚写，用“重寻”用“水面琵琶谁拨”，便觉情思惆怅，无穷别感。过片“渚寒”三句，写离别实景，与上文“送客”句相呼应，“而虚实相足，并不犯复。”送别既非胡德华一人，故在虚实相足中，亦具抒情的典型性。所以“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顿觉天地变成暗淡，寄慨无穷。韦庄《谒金门》上片“相忆”四句，空灵，虚境；下片“满院落花春寂寂”，浓艳，实境，前后互相映照，故能引发出结句“断肠芳草碧”的凄黯情调。先生之论如此。倚声填词不可通篇皆实，也不可通篇皆虚。若前后皆实，中间须作虚写，而后气局乃开。白石《扬州慢》前片依小序写实景，沉郁悲凉，后片“二十四桥”三句写凄冷境界，极为精警，与“桥边红药”两句相映发，与“废池乔木”相遥应，都是实景。所以过片写不堪回首，以杜牧事替代，先生云：“此等处最须玩味，盖前后均写实，若不加变化，则气局不宽，运笔涉滞”，“正其空灵排宕处，非力弱也。”论者或以为波心冷月，荡着的是青楼绮梦，其实这是不知虚实照映之法所生的误解，读先生之言必有启发。美成《浪淘沙慢》第二叠，“嗟万事难忘，惟是轻别”和盘托出题旨，拙重之至，为一篇关键，其上“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二句极精细，从想望中特举最难堪的情事作凄清的渲染；其下“翠尊易泣，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三句又极空灵。复堂所谓：“以无厚入有间也。断字残字不轻下”（谭献《词辨》），止庵云：“‘翠尊’三句空际盘旋。”（《宋四家词选》）。可见“精细、拙重、空灵配合观之，可悟慢词作法”，先生教人如此。实境虚发也是取得空灵动宕之美的技法。美成《西河》第三叠：“燕子不知何世，人间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而前著“想

依稀王谢邻里”则成虚发了。先生评云：“第三叠纯写怀感，由‘伤心东望淮水’生实境虚发。”这种写法最得吊古神理，词境惆怅迷离，引人无穷之思。《通鉴》谓梁燕巢林，为最乱之世。柳永《雨霖铃》前片“念去去”三句，以空灵之笔写出实景，苍茫感慨从虚处生发，盖虽虚而本实。过片先生分三层言之：“多情”句以古人衬说，正写远别，前此“执手”两句刻画真切动人，为“念去去”三句蓄势。此为第一层。“更那堪”以时令衬托说，为第二层。“今宵”句，以景物衬托说，为第三层。此三层均以虚处着力，总说所以远别的难堪，于“念去去”两句为渲染。先生所谓虚处着力，即虚境实写，为情造景之意。与虚实同类性质的还有疏密关系。先生论词的疏密关系颇得辩证之趣。自从张炎倡清空重疏宕，则以梦窗词的密丽为质实为晦涩。这种看法影响数百年之久。周济撰《宋四家词选》，认为“梦窗每于空际盘旋”，“若其虚实并到之作，虽清真不过也。（《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麦儒博云：“秾丽极矣，仍自清空”（《艺蘅馆词选》）。陈洵又云：“实处皆空”（《海绡说词》）。诸家评梦窗词，皆指出其密丽秾挚中见疏宕空灵。先生囊括前人之论从而阐发之：“读梦窗词，须于浓密中见疏淡。梦窗意多辞练。”辞练则导致浓密，意多须求疏淡。又释《风入松》“愁草瘞花铭”句云：“五字中三层意，密丽中自见疏宕。”先生论梦窗词这个疏密统一的艺术特点，是值得重视的。

词人用笔，技法无限。虚实相生，已造种种妙境。他如扫处即生、操纵繁会、透过一层、渲染衬托，乃至勾勒、用字，无不因情写景、情景相融，而种种词境亦由此而生。白石《琵琶仙》前片“十里扬州”三句用杜牧事，以包括许多当年情事。止庵云：“顺逆相足。”先生则云：“扫处即生”。二者相辅见意。这种扫处即生法因空而见实，故“前事空说”，令人无限低回。又《念奴娇》前片着重描写荷花，冷香飞动，情致别出。下片着重写感怀，“似有寄托”；前片写旧时情事，后片写现况，而今昔之感，正在过变处抒写。即“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数句使前后气机互相引动，不致脱节。先生云：“可悟操纵繁会之法”。渲染和衬托是词家常用的技法，而所造意境的浅深、艺术的高低，又系于作者的修养，论词亦然。孙光宪《浣溪沙》，先生释曰：“揽镜”、“凝情”两句为引端，“一庭疏雨湿春愁”为渲染，过片“杨柳”、“杏花”两句为比衬，最后结出本意。“一庭”句为《花间》健笔，写疏雨连绵，一种纤微的凄清况味撩拨着别后的春愁，用“湿”字轻轻粘着，使春愁具体化，所以渲染作用很强。与冯正中《南乡子》“细雨湿流光”同工。白石《霓裳中序第一》“亭皋正望极，乱落江莲归未得”两句已摄全神，多病无力，流光过隙，缅怀伊人，能不兴叹。“纨扇”、“罗衣”、“淡月”系渲染，“双燕”系衬说。“许多层折总由‘归未得’三字生出。”所以渲染衬说愈精妙，则其词境愈转折层深。先生论词的技法如此。又白石《惜红衣》“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论者以为拟人而赏其设想诞妙。其实拟人只是修辞格耳，故先生云：“两句渲染岑寂时的凄凉情味，用笔幽隽，格韵高绝。”透过一层写法往往使词意层深，矫健有力。于美成《夜飞鹊》前片结句可见：“花驄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离别的难堪以“花驄会意”映托。先生云：“透过一层写法。花驄如此，人意可知。”词就送人铺写，曲折周至，情意深厚，纯用赋体，是清真词的特

色。这种写法，自是从《离骚》脱化而来：“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又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过片：“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应难留。”先生释云：“用透过一层法，作尽头语。拙致深重。凡手至此，觉以下再无可说矣。”以下借实境生发，愈转愈深，显然是从透过一层转折而来，亦虚实相生的转机，无易安笔力妙思终不可得此境界。清真最善于钩勒。止庵曰：“他人一钩勒便刻削。清真愈钩勒愈浑厚。”（《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清真《满庭芳》：“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歌筵畔为勒转，自安于地卑山近之境。“故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又《氏州第一》：“渐解狂朋欢意少。奈犹被思牵情绕。”止庵曰：“钩转‘思牵情绕’，力挽六钩。”（《宋四家词选》）只此二例，可见清真善于钩勒。先生论词派，以为白石是骚雅派宗主，继承清真而去其典丽代以情韵。至于钩勒，犹得清真法乳。如《凄凉犯》“绿杨巷陌”至“寒烟衰草淡薄”，写淮水前线兵后的荒凉景况，西风画角，衰草寒烟，令人不胜凄黯。先生释云：“正说当时情景，纯用钩勒。‘似当时’两句，一加衬说，便觉沉郁有远味。”沉郁有远味，正是止庵所说的浑厚。清真的钩勒如此，白石的钩勒亦复如此。惟风格不同罢了。先生于《霓裳中序第一》起调数句亦云：“白石此词，沉郁顿宕，多用钩勒，极似美成羁旅之作。”

词的结拍是词家向来最重视的。张炎早在《词源》中评少游《八六子》、白石《琵琶仙》说：“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有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乃为绝唱。”此即杜工部篇终接混茫之义。也是司空表圣味外之旨。词的结拍也以有馀不尽为贵。先生平日释词最重起结和过变，而犹重结拍。如释《浪淘沙慢》“弄夜色空馀满地梨花雪”：这是清真把别情层层推动，以景结情的结果。梨花如雪，在空际写怨，且以倒装出之，不作平钝之笔。而先以“恨春去”作动荡，健笔绝伦。故“弄夜色”以下“以景结情，留无穷之味。”考清真他词，结拍多以景结情，情味无穷。即使以情结的，也回味无穷。《夜飞鹊》结拍“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深远之情可见。所以先生评云：“双起双结，犹存馀味。”白石词，结拍也有馀不尽，得味外之旨。《惜红衣》结拍“问甚时重赋，三十六陂秋色。”将人事景物融成一片作结，俊爽绵远，客怀岑寂之意不尽。先生评曰：“自具有余不尽之味。”《翠楼吟》结拍“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亦以景结情，托意南宋时局，既忧虑国运之近黄昏，又盼望一个“西山晚霁”的清明局面。所以先生云：“‘西山’两句收束，气机流贯、意味深厚。”他如稼轩、碧山乃至飞卿诸家，先生于结拍亦重有馀不尽之味。稼轩《贺新郎》“谁共我、醉明月。”先生云：“别出醉明月一境，留深长之味”。盖前“啼鸟”两句，回应起笔，沉痛已极。故一归到自身，便无由分说了，别出此境以结之，章法既完密，离别之感又深长可味。碧山《齐天乐》咏蝉歇拍：“漫想薰风，柳丝千万缕”。以薰风时节作结，虽哀而不伤，回首前尘，无魂可断。其曲折含蓄，言外多“家国之恨”（周济《宋四家词选》）。先生亦云：“结之正所以哀之也。有言外之音。”他如温飞卿《菩萨蛮》歇拍“心事问谁知？月明花满枝。”先生云：“‘月明’句以景结情，味更隽永，系加倍写法。飞卿最喜用之。”

尤须指出的是，先生承复堂论绪，评词以柔厚为归，往往以结拍点出，真乃仁者其言藹如也。如白石《八归》结拍：“归来后，翠尊双饮，下了朱帘，玲珑闲看月”。先生云：“‘想文君’两句，从对方（指胡德华）著笔，清沏可味。末以室家之乐作结，深得柔厚之旨。”结句得柔厚之旨，不仅词品高，且情味无穷。先生不但评具体的词作重柔厚，评词人作者亦重柔厚。少游词境凄婉，是人所共悉。而先生云：“秦观柔厚中含凄婉。婉美派宗主”。柔厚则指出了少游词旨的实质。无疑，这是先生论少游词的深到处。

三

词的声律、音韵和调谱，先生最为专门。今刊行的《词学研究》（见《詹安泰词学论稿》），“论声律”、“论音韵”、“论调谱”三章可见一斑。这些专门之学，非我所可追述。而学者苟得其一端，则大有启迪。先生当年讲授《宋词研究》，为诸生胪列专题甚夥。如“宋词平入互用考”、“宋词入声演变考”、“宋词去上分用考”、“南宋词音谱拍眼考”、“词调演变与法曲”、“诸宫调说唱考”和“宋词词名变易考索”，等等。先生讲授，常就专题的关键处加以点醒，从而启发学生用功研究。如“宋词去上分用考”这一专题，先生提示云：“宋词分去上始自柳永”。易安论词，称耆卿协律，“大得声于当世”。检《乐章集》，去上分用，其目的在于调扬抑于两仄，不惟平仄所当参究。如《雨霖铃》“骤雨”、“帐饮”、“泪眼”、“纵有”、“更与”等是。又“此去”为上去，则为抑扬，其作用也几同去上；即“暮霭”的霭，也不读与暮同去声，而应读入声。“大抵两上两去，在所当避。”（《词律发凡》）其后万红友著《词律》，以去上分用为定则。杜文澜云：“词用去上，取其一扬一抑，得顿挫之音”（《憩园词话》）。厉樊榭又云：“（吴焯）其掬谱寻声，兢兢于去上二字之分，尤不失尺度”（引自《词苑萃编》卷八）。先生从词的创作实践出发，综合清以来去上之论，提出去上分用的专题研究，无疑是有学术价值的。先生在释两宋词时，也经常联系自己的词作，指出去上分用得声律扬抑之美。如释吴梦窗《莺啼序》，第二叠“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谓“后者当用去上”，即去上去上格。先生自作《莺啼序》吊李冰若阕，同句亦严遵之：“莫问当年，醉醖露顶。”至如美成《齐天乐》“绿芜凋尽台城路”阕：“静掩”，“尚有”、“眺远”、“醉倒”、“照敛”；白石同调咏蟋蟀：“似诉”、“暗雨”、“漫与”、“更苦”，须用去上之类，虽自清以来，人所共知共守，但并不一定能审其扬抑之美；而先生却于自作词中，于朱、厉词中，得审而赏之。先生论证句律既如上述《莺啼序》，又认为如《疏影》结拍“几时见得”白石“用上平去入”，不可改易，改易则不谐畅。并证之以诸家同调词：吴文英“两堤翠匝”，陈允平“小舟泛得”，黄升“满庭绛雪”，张炎“此时共折”，邵贞亨“可能再得”。此与《甘州》结拍前句同一消息：柳永“倚阑干处”，吴文英“上琴台去”，张炎“有斜阳处”，可知东坡“不应回首”为不律。又前引《翠楼吟》“新翻胡部曲”，曲字应入声，不可易以他声，先生论律如此。其所自作同调“填词图漫题一阕”首，同句“红桑惊换劫”，亦严遵入声。先生既严于韵律，因此纠正《词律》的地方不少。如《词律》以为《翠楼吟》押去声韵，但白石此词上去声韵同协。“层楼高峙”、“叹芳

草萋萋千里”两句，先生曰：“峙、里分明作上声也。”先生自作《翠楼吟》，不从《词律》，而取上去同协。如下片：“月楼沉恨远，几荒乱鸡呼眠起。吴宫燕市，膾冷谷栖香，冰丝调水”，用上声韵与“千花弹泪，对万咽风蝉，长条曾系”等句去声韵相押。《庆宫春》，美成、梦窗皆用此调，字数句法均同于白石，但押平韵，且在过变处用暗韵。先生云：“二调殆有消息可通也。此调（指白石词）必须用入声韵，王碧山、周草窗均依之，不得改用上声韵。”这是因为，平入声韵可相代，上去声韵不可代平声韵。先生引自作《庆宫春》悼黄任初教授阕，用平韵：“伤心重到、半盞寒泉，空荐花轮”，“夜台幽篴，料不似红尘泪纷，”等可见。亦如白石《满江红》“仙姥来时”阕，押平韵，其理可悟，且有小序为之解释。

以上追记，不无谬误，且鄙陋如我，不能体其道之大全，诚有损于先生；所引当日先生讲学的笔记残编，又不能正诸九泉，这一切责任当在笔者。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刘斯翰



《采薇》并非“以哀景写乐”

吴观澜

清代王夫之在《薑斋诗话》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王夫之“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说，无疑是充满辩证法的艺术理论。然而他截取《采薇》“昔我往矣”四句为之例证，则似有以己意加之古人之弊。试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们如果不断章取义的话，很容易理解在这浑然一体的八句诗中，“雨雪霏霏”与“行道迟迟，载渴载饥”都是构成“今我来思”的背景，而这背景又显然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必要铺垫。

在《诗经》中，自然景物更多是一种客观的朴素的描写，很少象后代诗人一样有意识地分为哀景和乐景。在《采薇》诗中，“杨柳”、“雨雪”写的只是时间意象，言征戍春往冬归（但不一定是在一年之内），《诗经》此写法甚夥。如《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其实《采薇》前几章也运用此法。如“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暮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很明显，诗人以薇之生长过程象征时间的推移，而非以之为哀景或乐景。杨柳雨雪在诗中作用与此相同，但又稍有差异。前者写薇由“作”而“柔”，由“柔”而“刚”，状征人在盼望归去中感受到时间推移之慢，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由杨柳而瞬息化为雨雪，景物急促的转换，则状征人在归途中骤感时光流逝之速，如梦如幻，空虚惆怅。

《采薇》一诗虽写征人久戍归来，但没有大团圆式的格套，没有写乐，而描写了一种更深刻的悲哀。

“书海酌蠡”责任编辑：刘斯翰

粤词概述

陈永正

岭南地区的文化，是我国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采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岭南的词，也是随着各代词运的发展而发展的。由于岭南地处僻远，唐五代、北宋时期，文献散佚，词作流传极少。岭南词人见于载籍最早的是五代连州（今广东连县）人黄损，现存的词仅有《望江南》（“平生愿”）一首；又有南汉曲江人何成裕，史称其“尤工小词”，但词已不传。其余的词人词作俱已湮没无传了。直至南宋时期，岭南词家才稍著称于世。南宋光宗时的名臣广州人崔与之，向被称为“粤词之祖”，他的名作《水调歌头·题剑阁》词云：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对青灯，搔白首，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蒲涧清泉白石，梅岭绿阴青子，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

此词笔力老健，感情深挚，表现了词人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和守边御敌的决心。风格豪放雄浑，纯属辛弃疾一派。崔与之的词，对后世岭南词人影响颇大，开创了以“雅健”为宗的岭南词风。南宋后期的岭南词人李昉英、赵必璩、陈纪等，便是这种词风的直接继承者。

南宋宁宗时，南海人刘镇工词，以新丽见称。《草堂诗余》录入刘镇词多首。其佳句如“长记酒醒人静，暗香吹月阑干。”（《清平乐》）“襟怀静吞八表，莫登山临水易惊秋”（《木兰花慢》）“物象搜奇，风流怀古，消得文章万丈虹”（《沁园春》）等，皆清新俊逸，情味深永。宋理宗时番禺人李昉英，其词作高华优爽，沉郁苍凉，自成格调，完全摆脱了南宋后期盛行的姜夔、吴文

英的格律词派的影响。如他的名作《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

万顷黄湾口，千仞白云头。一亭收拾，便觉炎海豁清秋。潮候朝昏来去，山色雨晴浓淡，天末送双眸。绝域远烟外，高浪舞连艘。风景别，胜滕阁，压黄楼。胡床老子，醉挥珠玉落南州。稳驾大鹏八极，叱起五羊仙石，飞佩过丹丘。一笑人间世，机动早惊鸥。

此词写珠江口雄阔壮丽的景色，“情致超迈，气韵生动”，表现了词人旷远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近人有谓其“可与柳永西湖之词，东坡赤壁之咏，鼎足而三”者（周笃文《宋百家词选》）。

南宋末年，国势衰落，祸乱频仍，词人的作品中，充满了末世的哀感，“叹英雄虚老，凄其一块。回首百年歌舞地，胥涛点点孤臣血。问长江、此恨几时平，茫无说。”（赵必璩《满江红·和李白玉蒲节见寄韵》）“岁晚凄其诸葛恨，乾坤只可渊明酒。忆坡头、老菊晚香寒，空搔首。”（陈纪《满江红·重九登增江风台望崔清献故居》）。

总的来说，宋代岭南的词家虽然不多，但已有可观的建树。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当时风云万变的时代，表现了词人真切的忧乐之情，其雄健的词风更给后世的岭南词人以巨大的影响。

二

明代是中国诗歌的衰落时期。词坛更是一片荒芜，当时号称名家的词人如杨慎、王世贞、汤显祖、马洪等，“一味逞才恃博，未免浅露芜杂，于格律亦多不合”，“气骨轻浮，了无新意。”（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前言》）以曲入词，满纸纤巧绮媚之语，词格就愈趋卑下了。然而，在明词衰落之时，岭南的一些不以词名世的词

人，却能摆脱流俗的影响，承袭着南宋以来岭南雄健的词风，写出了不少好作品。如著名的学者海南岛琼州人丘濬《酹江月·和东坡题赤壁图》词：“横江一笑，眼中谁是英杰？”“鹤梦箫声随水去，只有声华难灭。静对新图，闲歌古句，竖起冲冠发。何时载酒，江心重遇流月？”豪情胜概，千古如新。又如新会人陈献章的《渔歌子·钓鱼效张志和体》词：

红蓼风起白鸥飞，大网拦江鱼正肥。微雨过，又斜晖。村北村南买醉归。

写岭南水乡渔民的生活，语言清丽，色调鲜明，也表现了这位遁迹山林的学者恬淡的心境。最值得一读的还是南海人霍韬的《水调歌头·古边情》词：

天骄横汉世，戾气满边关。一任鼓弓驰突，赤子若为安？嫚书主臣忍辱，拊髀颇牧兴叹，劲气竟谁还？贾生晁错策，炯然万世丹。匡相君，石内史，吻涎残。坐使金戈销铄，战士黎孀困。有日阴山胶劲，胡虏南驰马壮，铁甲为谁寒？我也嫫姚后，梦见燕然山。

明代边患频仍，瓦剌、鞑靼等族不断南侵掳掠，朝廷战备废弛，无力抗御。此词借汉代边情抒写当时的忧愤，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精神和守边御敌的决心。词意豪迈激昂，充满浩然之气，如此等作品，在有明一代词中尚不多见。

明末清初，广东著名的词家还有陈子升、梁佩兰、今无、梁无技、易弘等。他们的作品，或慷慨雄直，或要眇幽深，均能反映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痛苦，堪称时代的实录。如梁佩兰的《踏莎行·江上闻笛》词：“高峡云愁，清湘水咽。龙吟夜半飞寒铁。孤舟独钓四茫茫，红衫几点沾残雪。斑竹萧骚，黄芦凄切。江楼梦到关山月。关山月苦照何人，闺人泪作燕支血。”词中流露出作者内心的悲慨之情。独处江中，四顾茫茫，何处是自己的出路？只有那无情的明月，在照耀寂静的关山。海幢寺和尚今无的《满庭芳·出山海关》词，更是悲愤苍凉，回肠荡气，表现出一位志士在家国倾覆时无限怆痛之情：

地尽天穷，云寒雪重，月明画角声长。荒鸡塞远，漂泊泪如霜。城旦鬼薪何处？学苏卿、啮雪驱羊。却从来、堪怜节烈，抵死问苍苍。长城东去也，沙封白骨，雪打

皮囊。更烟流短草，雁起边墙。凄断神州抛撇，毡毳间、箕子佯狂。莫回首，秦淮箫鼓，特地又悲凉。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明末清初之际，岭南词坛上出现了一颗辉煌的巨星，那就是屈大均。屈大均，初名绍隆，字翁山，又字介子。广东番禺县茭塘都思贤乡人。是明末著名的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词人。

屈大均词，当为有明一代殿军，其比兴要眇之旨，实与屈原为近，无论思想内容与艺术上之成就，均远过于清初阳羨、浙西诸人，惜其集在清代曾被列为禁书，未得广为流传，王昶《明词综》所录七首，亦仅为屈词中二、三等作，未能代表其主要风格。屈氏生长于明清鼎革之际，目睹当时社会变乱，故其词多悲慨之音。早年之作，奇情郁勃，表现了词人反抗民族压迫，坚持对敌斗争的决心，也流露出对抗清事业屡经挫折，壮志难酬的苦闷。如他的名作《紫萸香慢·送雁》词：“恨沙蓬、偏随人转，更怜雾柳难青。问征鸿南向，几时暖返龙庭？正有无边烟雪，与鲜飘千里，送度长城。向并门少待、白首牧羝人，正海上、手携李卿。秋声。宿定还惊。愁里月，不分明。又哀笳四起，衣砧断续，终夜伤情。跨羊小儿争射，凭能到、白蘋汀？尽长天、遍排雁字，逆风飞去，毛羽随处飘零。书寄未成。”此词“声情激楚，喷薄而出”，以归雁自况，有感于身世漂泊，壮志成虚，故声厉而情哀，明季诸家中，实无与伦比者。屈大均的小令，每用比兴，言近旨远，以寄其拳拳故国之思。如《梦江南》词：

悲落叶，叶落落当春。岁岁叶飞还有叶，年年人去更无人。红带泪痕新。

悲落叶，叶落绝归期。纵使归来花满树，新枝不是旧时枝。且逐水流迟。

况周颐《蕙风词话》评云：“明屈翁山落叶词，余卅年前即喜诵之。”并谓次章“末五字含有无限凄婉，令人不忍寻味，却又不忍已于寻味”。叶当秋始落，此云“落当春”，于春日生发之时而落，故更为可悲。明亡于三月，南明绍武政权亡于正月，皆当春令，故词中以此设喻。

屈大均晚年之作，渐趋平淡，而骨子里却含着孤臣孽子绝望的悲凉。如《木兰花慢》词：“绕阑干几曲，记龙驭，此淹留。剩鶺鴒恩晖，芙蓉御气，掩映飞楼。飐飐，冷飞乱叶，似乌号、哀痛

惨高秋。多谢宫鸦太苦，土花衔作珠丘。梧州，更有瀟园愁。西望少松楸。未卜何年月，玉鱼自出，金雁人收。啾啾，岭猿个个，抱冬青、泪断郁江流。寄语樵苏踽踽，磨刀忍向铜沟。”

三

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岭南的词坛也一片兴旺。据叶恭绰编纂的《全清词钞》所录，有清一代岭南词家就有一百四十余人，远过于宋、明各代。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词坛中，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和陈其年开创的阳羨词派，争龔竞逐，左右一时词风，“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篋中词》二）而岭南词家却较少受到江左习气的薰染，保持岭南词特有的本色。如东莞词人李继燕，擅长写景咏物，奇情丽采，炫人眼目：

欲访蓬莱何处？天四倚。尽日碧浪沉沉，江上春寒起。孤帆网得珊瑚，尚渍鲛人泪。遥望、的烁华星晓相对。行更远，似隔断、三千水。倒影楼台，却是海中烟市。宝马争驰，不觉归来堕香珥。冷浸水晶盘里。

《荔枝香近·潯州珠池》

雍正乾隆年间，词坛几被浙派笼罩，肤廓恒灯，流弊益深，“降至乾隆中叶，颓靡更甚，一片荒芜。”（《全清词钞序》）岭南词人如张锦芳、黎简、黄丹书等，为词峻爽豪迈，一扫当时词坛上庸滥之风。如张锦芳的《满江红·木棉花》、黎简的《海天秋·题画》等词，都是格高调响的佳作。又如黄丹书的《满江红·木棉花》词：

焰焰烧空，谁栽遍、水村山郭？人道是、祝融行处，牙旗参错。赤羽一行摇白日，彤云万朵扶青嶂。笑纷纷、桃杏斗春妍，都纤弱。黄湾外，斜阳薄。粤台畔，狂飙作。似乱霞铺地，晚虹沉壑。野烧连冈烟欲上，清霜夹岸枫初落。尽画家、渲染有燕支，应难着。

此词极力烘染木棉花的奇姿壮采，色泽鲜秾，笔势豪宕，用各种不同的形象熔成一幅奇丽的广州木棉图。

嘉庆以后，词学“中兴”。张惠言、周济拈出“意内言外”之旨，以“寄托”为宗，创立了常州词派，影响很大。可是，在嘉、道年间，岭南的词人却开创了另一条道路，大异于江左诸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著名的学者陈澧。陈澧泛览群籍，著述甚丰，余事为词，亦卓然为一大家。

谭献《篋中词续》评其词云：“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乃使绮靡、奋厉两宗，废然知反。”陈氏为词，不主故常，不傍门户，述事抒情，一以风雅为归，纯粹清高，表现了一位学者的胸襟修养。如《水龙吟·登粤秀山看月》词：“词仙曾驻峰头，鸾吟缥缈来天际。成连去后，冰弦弹折，百重云水。碧月仍圆，苍山不改，旧时烟翠。只长林坠叶，西风过处，都吹作，秋声起。此夜三人对影，倚高寒、红尘全洗。珠江滚滚，暗潮销尽，十年心事。欲问青天，素娥却似，雾迷三里。剩出山回望，灯明佛屋，有闲僧睡。”感慨深沉，意境幽峭，何须寄托然后言工！又如：

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和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帆风急。叠石敝烟，明波蘸树，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便欲叙棹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鲈鱼兼酒美，只爱岚光呼吸。野水投竿，高台啸月，何代无狂客？晚来新霁，一星云外犹湿。

《百字令·夏日过七里流》

此词字字清俊，壮浪幽奇，兼而有之，炼字炼句，极见工力，较诸厉鹗同调之作，似更胜一筹。与陈澧同时的名家还有嘉应（今梅县）人吴兰修。他的词作也清美可诵。如《卜算子》词：“绿剪一窗烟，夜漏知何许？碧月濛濛不到门，竹露听如雨。独自出篱根，树影拖鞋去。一点萤灯隔水青，蛩作秋僧语。”雅意骚情，如空山流泉，清幽独绝。

四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各种因素的推动，广东成为全国最早产生近代进步思想的地区，也成为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首先在广东沿海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大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广东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不少广东词人，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这些历史事件。如南海人谭莹就在他的《庆清朝·题草檄图为徐铁孙司马作》一词中，愤怒地谴责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临安积习，至今犹讳言兵。”“游魂海外，中原偏任纵横。”作者渴望能抗击海上来的侵略者，为国家建立功业：“孰挽射潮铁弩？东南氛浸尚冥冥。军书急，愿挥神笔，便斩蛟鲸。”有的词人对故乡遭到敌军铁骑的蹂躏而痛苦叹

息：“乍南来燕侣，说故里烽烟。记檐外、一星坠处，海珠忽热，惊损皎眠！”（桂文耀：《扬州慢·石帚此词为竹西作。辛丑春，闻吾乡兵燹，辄借此调写之》）“乡关似梦，怕乌衣、难认人家。便北户笙歌，南濠箫鼓，都换悲笳。”（汪琮：《扬州慢》）外患愈急，国势益危，不少忧国的词人，把满腔悲愤，泄于词中，“凭城社，忧狐鼠，扰关塞，悲豺虎。怅横流沧海，几人安住？辞汉铜仙空有泪，立朝金马终无语。听哀弦、掩抑孰更张，调钟吕？”（陈伯陶：《满江红·和磨石韵》）“徙薪曲突，更无上客，蹈汤赴火，谁奋前麾？汤蔽偏工，趋炎成俗，如沸如羹事可危。”（汪兆铨：《沁园春·小除夕祀灶，时有海警》）

最值得重视的是叶衍兰、梁鼎芬有关甲午战争的两组《菩萨蛮》词。番禺人叶衍兰，与汪琮、沈世良并称“粤东三家”，词名籍甚。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节节败退，在朝野引起巨大的震动。年过七十的老词人，愤而成《菩萨蛮·甲午感事》词十首，珍念国事，意味深长：

琅璈铄瑟瑶池宴，素娥青女时相见。浊雾起楼兰，边风铁骑寒。扶桑东海树，移种荒崖去。泪眼望斜阳，关山别恨长。（其一）

淮南赴召牙璋起，紫皇宠报金如意。烽火已漫天，何时着祖鞭？清人河上乐，卿子谁借作？大漠阵云昏，凄凉烈士魂。（其五）

梁鼎芬是清末著名词人。他擅长写小令，以婉曲之笔，描述芳馨排侧的情怀，意在言外，格韵俱佳。他的《菩萨蛮·和南雪丈甲午感事》词十首，更是感念时事的名篇：

无端横海天风疾，龙愁鼍愤今何及！夜夜看明星，荒鸡听二更。凄凉三月雨，念此芳菲主，鸚鵡一声先，人间最可怜。（其四）

璇宫夜半惊传烛，西头势重貂相属。桃宴酒酣时，春残那得知？寒芳情绪各，不念花开落。庭院这般荒，有人空断肠。（其八）

同时代著名词人还有汪兆鏞、曾习经等。曾习经词学“花间”、北宋，善为小令，尤以情致见胜。恋情词在粤人词集中似不多见，而曾氏少作却颇多绮语，极缠绵婉约之致。如《鹧鸪天》词：“钿毂香车彼一时，黄昏璧月下琼枝。可怜寂寞

春寒夜，抱影凝情却为谁？如此恨，奈何伊。露桃花底弄哀丝。试将海水量深浅，却那东流无尽期！”以健笔写柔情，无纤巧仄媚之态。

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潘博、麦孟华等都是词人。他们自觉地运用诗词这一艺术形式，为维新运动服务，为抗御外敌、改革内政服务。如梁启超的《水调歌头》词：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苍生病，稽首礼维摩。

又如潘博的《贺新郎·赠子刚》词写道：“莫道英雄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词人劝勉友人，要抓紧时光，为改造国家干一番事业。词中充满着位改革者的历史使命感：“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问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还要一提的是近代广东著名词人陈洵。洵字述叔，新会人。少时与顺德黄节齐名，并称“陈词黄诗”。朱孝臧尝称新会陈述叔、临桂况夔笙（周颐）为“并世两雄，无与抗手”，并为题其《海绡词》云：“雕虫手，千古亦才雄。新拜海南为上将，试要临桂角中原。来者孰登坛？”具见推挹之意。陈洵词早年学吴文英，字面浓厚密丽，用笔亦腾查有势。中年以后，稍参周邦彦之浑厚和雅，华妙精深。如其《六丑·木棉谢后作》词，借花起兴，哀乐无端，尤善用重笔，以抒发个人失意之感，下字用意，皆法度深稳，极见工力。五十之后，其词洗尽铅华，运密入疏，寓浓于淡，其可谓“神骨俱静”。如《南乡子·己巳三月自郡城归乡过区萃吾西园话旧》词：

不用问田园，十载归来故旧欢。一笑从知春有意，篱边，三两余花向我妍。哀乐信无端，但觉吾心此处安。谁分去来乡国事，凄然，曾是承平两少年。

陈洵词艺术成就颇高，可惜其生活面狭窄，思想守旧，故所为词反映社会现实者不多。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清末民初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词作，其中以廖仲恺的成就为最高。如《如此江山·题白云远眺图》词，表现了词人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孙中山先生的敬爱：“滔滔浊流注海，浪花淘不尽，今古王气。日暝云寒，风翻叶乱，那更萧萧秋意。孙郎去矣，只目断鱼珠，几重烟水。天堑长存，恨阴霾未霁。”胜概豪情，可想见词人的襟抱。在《一剪梅·题五层楼》词中，作者怒斥革命叛徒的罪行，表现一位革命者临危不惧的志节：

迭阁层楼倚晚风，山上烟笼，江上霞红，兴亡阅遍古今同。文只雕虫，技只屠龙。莫问当年旧主公，昔日名隆，今日楼空。跳梁小鼠穴其中，昼静潜踪，夜静穿墉。

五

岭南的词跟岭南的诗歌一样，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正如王士正《池北偶谈》中论述岭南

诗歌时所指出的：“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岭南文人较少机会与中原人士相接，往往少受或不受每个时期流行的文风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正如岭南诗歌以雄直的诗风著称于中国诗坛那样，岭南词的风格是偏于雅健的。境界雄伟，气势劲厉，音调高亢，直抒胸臆，得“阳刚”之美，在凌云健笔中有一股清雅之气，因而便不会流于叫嚣直率。从南宋的崔与之、李昴英，到明末的屈大均以至清代诸名家，都有不少豪放高雅的词作。岭南词，虽然还未能象岭南诗那样，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流派，但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条主脉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刘斯翰



刘兰芝自请遣归说辨伪

陈一平

在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的研究中，长期以来流传着所谓“刘兰芝自请遣归”说。说者多认为刘兰芝是不能忍受焦母折磨，自认为无法在焦家生活下去，在焦母没有公开提出驱遣的情况下，自请遣归的。表面上看，刘兰芝确乎说了“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话，“自请遣归”说似乎言之凿凿。但仔细研究，便可发现这种说法很成问题。

从诗歌的描写看，焦仲卿听了刘兰芝的述诉后马上去找母亲。一见母亲便恳求不要赶走兰芝。显然是焦母提出驱赶在先。否则，焦仲卿没头没脑地哀求，岂不是搞错了对象？焦母呢？责怪儿子不理解她的苦心，并且当即向儿子交了底：“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她要赶走兰芝，已是蓄谋已久的了。我认为：早在兰芝向丈夫诉苦之前，焦母已经对儿子下了赶走媳妇的命令了。甚至焦仲卿此次返家都可能是专为此事而回。焦仲卿闻讯很吃惊，便向兰芝询问实情。刘兰芝在这种情况下，才向丈夫吐出了满腔苦水，而且激愤地对丈夫说，你去告诉婆婆吧，要赶就快点赶走算了！诗人删去前面的起因，直接从刘兰芝诉苦写起，正是诗人剪裁之妙：一则制造悬念，吸引读者；二则内容可以前后互见，显得结构更加紧凑。殊不知这番苦心被许多人误解了。

本来，诗的序文也讲得清清楚楚：“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论“多向型”审美意识

蔡 列

新时期的大众审美意识已越来越朝着“多向型”发展，这是新时期审美意识更新的一个重要标志。

多向型审美意识，就是指人们对审美对象的选择、评价、比较的过程中，主观意识与审美对象的原有的关系发生分裂：原来的单向联系变为多向联系，并使原有的单向联系的性质发生一系列适应性变化。所谓单向联系，是指审美主体的主观意识与审美客体的某种属性的固有的对应关系。例如某人认为“大海是壮美的”。这是一种评价性的对应关系。当这种对应关系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时，它就会发生动摇和分裂。即从“大海是壮美的”变为“大海是壮美的/大海是凶恶的/大海是迷茫的……”等等。于是，原来的单向联系（主体→壮美→大海）就分裂为：主体→壮美/凶恶/迷茫……→大海。这就是相对而言的多向联系。在一组多向联系当中，原有的单向联系有可能与新质的单向联系长期并存，也有可能改变性质或者消失。在审美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多向联系既是单向联系分裂的终点，又是产生更进一步的新质单向联系的起点。单向联系与多向联系循环交替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审美意识发展的一种模式，即多向型审美意识。

多向型审美意识有下列四大特征：

（一）群体性。

在单向联系审美意识发展模式，个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多向型审美意识的发展模式中，个体的作用不再占主导地位。因为，一方面，单向联系在其自身的裂变的过程中具有排除个体性的特点，因为个体性越强，多向性就越弱，两者是成反比例的；另一方面，个体没有能力承担需要高能量的裂变任务。个体的权威力量不得不被大大削弱。多向型审美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群体性，它要求群体参与和群体制约。近年的报纸和杂志都喜欢开辟读者专栏，电台、电视台也有了听众点播节目，等等。这些做法，除了加强信息反馈外，还为广大群众参与更高一个层次的审美活动提供了机会，减少了群众在审美活动中的被动性。同时也使到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与更广泛的群众审美需求结合起来，使到单向联系的裂变具有群体性的特征。广东实验话剧团创作的舞厅话剧《爱情迪斯科》，让观众参与创作。在演出中，观众时而回答剧中人的提问，时而与演员一同翩翩起舞，时而对剧情提出建议。演出者也随时采纳观众意见，设计出剧中人物的不同格局，并且分场演出给观众看。在这里，多向型审美意识的群体性体现得最集

中、最具体和最明显。

此外，随着通讯、新闻和出版事业的发展，筛选个人意识和形成群体意识的条件大大改善了。如一大批文摘性的报纸杂志的出现，既反映了审美意识裂变的规模和成果，同时又使那些缺乏群体基础的新质单向联系得到及时淘汰。可见群体性既是裂变的条件，又是裂变的有效的控制手段。否则，无限裂变下去，其结果自然不可想象。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始终没能争取绝大部分读者，也说明群体性对多向型审美意识的制约作用。

（二）系统性。

多向型审美意识的系统性，表现在审美意识在各个领域内同时发生全面的互相联系的裂变。每一种单向联系的分裂都不是孤立地进行。在艺术生产中，出现了题材、风格、手法上的互相渗透同步变革的趋势。最早引进现代派手法的是文学，接着便影响到电影和舞蹈。出现了《海滩》一类的电影和象征性舞蹈。又例如文学受到电影《城南旧事》的启发，掀起了1985年中篇小说“文化热”的创作潮流，出现了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孩子王》等作品。生活上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连锁反应，人们开始有条件同时把审美的眼光伸向生活的各个角落：衣着、住房、环境、甚至食品包装。于是时装行业、美容行业、装饰行业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变化，都不是简单地以B代替A，而是以B、C、D同时代替A，只有这样才体现出裂变的或多向联系的特点。另外，多向联系的出现是一组连着一组、相辅相承的，例如武侠小说的出现连着武打电影，迪斯科舞的出现连着迪斯科音乐，等等。这表明了单向联系的分裂不是随意地进行而是与别的单向联系的分裂有机地联系着的，是系统地、全面地、多领域地同时进行的。

多向型审美意识的系统性，还体现在某些新质单向联系的多义性上，这是新质单向联系与旧质单向联系的主要区别。例如在由旧质单向联系“主体——→革命——→红色”分裂而成的多向联系“主体——→革命/热烈/危险/温暖/食欲……——→红色”当中，新质单向联系“主体——→革命——→红色”不但已经在社会意识中降低到适当的地位，而且具有多义性。即由“主体——→革命（单义：纯粹的革命）——→红色”变为“主体——→革命（多义：象征性的、非等同的、有特定适用场合的革命）——→红色”。

（三）深刻性。

多向型审美意识的深刻性表现在单向联系的裂变是高容量和多层次的。高容量主要是指多向联系的数量（这点在谈系统性已谈到），而是指多向联系中单向联系的数量惊人增长。例如服饰方面，过去的观念是“主体→整洁→朴素→衣服”。因而人们长期地只局限在唐装和中山装的范围内。现在的观念多向化了，如“主体→整洁/合适（包括款式）/活泼/严谨/风格风度和气质/多种美感（如刚美柔美）……→衣服”。因而就有了工装、柔姿装、蝙蝠装、迷你装……等等。文艺方面，单是一个才建社五年的花城出版社，就已经出版各类文艺书刊近千种，这种出书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高容量在审美客体方面的体现。在主体方面，高容量也同样得到体现。例如喜爱健身运动的人数正高倍增长，这除了说明人们对美的追求更加自觉外，还说明了每一种有意义的新质单

向联系都拥有坚实的主体的基础。多向型审美意识的深刻性，在其裂变的高容量单向联系中体现了数量上的优势。

在质量上，多向型审美意识的深刻性则体现于其裂变的多层次性上。从裂变的规模来看，可以分为一般裂变、裂变再造和综合裂变再造三个大的层次。一般裂变就是由一种单向联系分裂出第二种单向联系，如受台湾校园歌曲影响而产生的大陆校园歌曲，就是一般裂变的产物，这是一种较低层次的裂变；裂变再造就是两种由一般裂变产生的单向联系的结合，例如伴舞演唱，就是将舞蹈的音乐性和抒情性从舞蹈中分离出来，将演唱的运动感和时间性从演唱中分离出来，再将两者结合而形成的。综合裂变再造，就是多个裂变再造的综合体，它可以是多个裂变再造的叠加，也可以是它们的一般结合。例如粤海实验剧社演出的现代组合戏剧《魔方》，就是将哑剧、舞蹈、形体造型等结合在一起。此剧得到青年们的好评。而沈阳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搭错车》，则将电影的剧情和流行曲《酒干淌卖无》进行再创造，伴以歌舞和钢化玻璃电动转台等表现手段，使这出“音乐舞蹈故事剧”获得成功。

（四）变动性。

多向型审美意识的变动性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流行性变动。这是一种平行变换。如流行曲、流行时装、流行色等等。它们的特点是群体时效性强。来得快去得也快。例如流行曲，近年来流行的高峰期已由二、三年缩至一年。流行色彩现在也几乎是一年更换一种色彩。这说明人们开始摆脱传统“标准化”审美意识的约束，敢于大胆追求多种多样的美了。

第二种变动性是观念性变动。相对地说，多向型审美意识的探究心理胜于守旧心理。人们在心理要求上表现出较大的变动性，反映在观念上就是扬新抑旧。近年来戏剧不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戏剧观念的守旧成分大于求新成分。1985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的十一台戏中，有九台是传统题材剧目。这说明中国戏曲观念更新速度太慢。相反，一首接着一首的流行曲却吸引了绝大多数青年人，同时一个接着一个歌星很快被淘汰，这说明了人们观念上的求新求异。这也正是多向型审美意识的特征。它除了表明单向联系不断形成和某些单向联系得到强化外，也表明了某些单向联系被淘汰的过程。这恰是多向联系的生命所在。

第三种变动是过渡性变动。多向型审美意识本身是属于过渡性的审美意识。它是以前单向联系简单替换为基础的旧的审美意识刚刚解体，新的审美意识大规模产生发展但尚未成熟时的过渡性审美意识。它所包含的许多新质的单向联系仍属于尝试性质，即使取得成功也可能是阶段性的，因而从总体来看是过渡性的变动。例如最初出现的轰动一时的小说《班主任》和戏剧《于无声处》等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其价值不在于艺术成就的高度而在于其开创意义。由此可见，一个时期的某种新质单向联系的固定性是暂时的。正因为如此，多向联系才能更进一步发展。

多向型审美意识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只有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才可

能带动审美意识发生群体的、系统的、深刻的分裂和变动。例如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白话文代替古文，现代戏剧冲击古典戏剧，西装和中山装同时取代长袍，等等。新时期多向型审美意识的产生的社会基础，我们概括为下面四点：（一）社会结构由闭关型变为开放型。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国外的文化包括审美意识必然渗入，传统的审美意识受到外来审美意识的影响，自然会发生一系列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审美意识就有可能发生多向裂变：分裂传统的或分裂外来的，然后再重新调整其自身的结构，将传统审美意识的精华部分与外来审美意识的合理成分结合起来。（二）社会意识由保守型转变为改革型。我国不但实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进行文化改革包括审美观念的改革。审美意识的改革如果不与社会总体意识的改革同步就会导致自身的畸形发展。当然，社会总体意识也必然对审美意识起着带动的和制约的作用。这就促使审美意识实行全面的自身调整，于是出现了探索性电影和实验性话剧。但是，这些改革不等于全部抛弃传统，而是真正地取其美的成分，是美的再创造。（三）社会生活由低信息量变为高信息量。现代传播技术和工具的发展，为人们接受高信息量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另外，接受高信息量也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需要。只有拥有高信息量，人们才有可能在更复杂更变化莫测的现代社会中把握自己并及时调整自己。美作为一种信息，也处于膨胀之中。人们对信息接受的求异性，要求美的信息不断变换，这就促使审美意识的更新。于是，多向型审美意识便应运而生。（四）经济的发展促使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消费由低消费变为高消费。高消费的一个特点是商品的流通和更换加速。美作为人的精神消费对象，它的生产过程也加快了速度，尤其是美的产品种类变换的加速。人们不满足于一般的单向联系的替换，而是要求裂变式的多向型变换。于是多向型审美意识就以其变动性的优势产生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张硕城





董仲舒未持“天变，道亦变”的观点

周乾澂

读过立早同志《董仲舒是地主阶级保守派思想家吗?》^①一文，很受启发。它从地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不同，指出他们在阶级利益的共同点之下，其间还存在矛盾，从而论定董仲舒有关经济、政治以及选人等主张，都与保守势力相抵牾，这是卓有见地的。但在分析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时，却认为他的思想中有“天变，道亦变”的观点。其理由是：一、董仲舒提出“天有十端”的命题，十端便是构成天的十种因素，由它们构成的天，“有意志，会变化”。二、董仲舒以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经是常，权就是变。三、权是变，“天谴论”就是这种变的具体形态。灾和异是天变的一种，天变之后，道便跟随改变。这个观点却值得商榷。

要讨论董仲舒这一命题，首先就要弄清他讲的“天”和“道”是指什么。对于“天”，在董仲舒的意识中，有把它看做自然的意思。“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②但他讲这些的用意，不在于解释自然，而是用来比附以说明人事。“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进而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③这样，天就不再是自然，而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者，于是，本来是自然的天就被蒙上神秘的神学面纱。“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把天看做百神之首，所以他说的天实在是神，是封建君主所于以受命者，是封建制度的源泉和保护神。

对于“道”，董仲舒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④所谓道，乃是治人之道，而且是最合适的治人之道，也是为王之道，它必是行之有效的。道建立于圣人，而圣人所根据的则是天，“圣人法天以立道”。于是，道便被奉为天经地义的了。

以董仲舒的原意对比立早的文章，其立论显然不充分：

一、“天有十端”，十端是指金、木、水、火、土、天、地、阴、阳和人。把十端做为构成

天的十种元素，但其中既有天、地、而且还有人。董仲舒的立意是混乱的，既然是天的十端，天应是总体，何以天又做其一端？显然说不过去。文章把十端看作十种元素，显然不妥。

二、解经为常，权为变，是不错的。但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权变与天变毕竟是两回事。他说：“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⑤在他看来，春夏秋冬虽有所变，那是天时之变而非天变。董仲舒还有一个说法：“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经用于盛，权用于末。”“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⑥可见，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权只是为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之变更。即使是这样的变更，“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所以权虽为变，但在经的制约之下，是不曾改变经的。

三、以“天谴论”为“变”的说明，并做为天变的例证，同时把“五行变救”看做是道随天变，这正好把事情弄颠倒了。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生灾害以谴告之。”^⑦失道与天谴的因果关系说得非常明确。即使退一步讲，真的把出现灾异认为是天变，那么，天之所以变，实由于道变，是天随道变。而且董仲舒在讲“道者，万世无弊”时，已经说了：“弊者，道之失也，”即使有不合道的事发生，那也只是失道，而非道变。道是永远不会变的。不仅不能变，董仲舒还号召失道者返道，“匹夫之反（返）道以除咎尚（脱“不”字）难，人主之反（返）道以除咎甚易，”^⑧“五行变救”便是“返者除咎”的方法。“天谴论”不足做为“天变，道亦变”的例证。

① 《学术研究》1985年第4期

②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以下出自本书者，只注篇名）

③ 《阳尊阴卑》

④⑦ 《汉书·董仲舒传》

⑤ 《四时之副》⑥ 《王道通》⑧ 《玉英》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凌峰



《金生色》—理学观念的图解

阎勤民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儒教由程朱理学演化为陆王心学。《金生色》图解的正是心学家所集中讨论的“格定”（格物定志）。我们以《金生色》和蒲松龄同时代的心学家唐甄《潜书》中的《格定》等篇对照，便可明白地看到这一点。

《格定》篇云：“众人之心如木，润之则茂，燥之则灰。君子之心如金，虽遇冶则流，遇淬则坚，其质固不变也。”《金生色》中之“金姓”喻“君子之心”而“木姓”喻“众人之心”，本源出此。

《金生色》中的金生图解的是“君子之心”。何谓“君子之心”？《尊孟》篇云：“君子之心曰仁。”“天下莫强于仁”。“仁之大者，无强不顺，无诈不附。谓仁胜天下，鄙人皆笑。夫愚者见形，智者见心。礼揖不格刃，儒服不御矢，形也；刃不我刺，反为我操，矢不我伤，反为我发，心也”。金生仁者，处穷不苟，能正心诚意以待木女，故木女虽强于行恶，诈于背誓，心终不能不顺不附；仁者虽礼揖儒服，不御刀矢，但仁心的力量可以达到“刃不我刺，反为我操”，此即邻媪子代金生操刀杀贼于床下；“矢不我伤，反为我发”此即木翁代金生挟弩毙女于后园。愚者从现象上看，好象是他人所为，在智者看来，实际上根本的推动力量是仁者之心。——这就是《金生色》的主题及故事构架，“金生色”即“仁心的光辉”。

木女图解的是“失道君子”之心。何谓“失道君子”？《格定》篇云：“君失其道，听命于臣；心失其道，受役于物”。因此“失道”就是被物欲所役。“彼不自觉其为役，方自以为得主，不知其为物狗心，遂诱于物也”。这就是木女以欲为志，堕落败伦的原因。“御寇易，御物难，破阵易，破物难。寇，毙我者也；物，遂我者也。中之者甘之，若将以为生，不得不可以为生；若将以为人，不得不可以为人”。这就是木女甘母所劝，涂泽自衒，

引贼入室，甘之如饴的原因。“物毒于寇，惟大勇者能御之；诱险于阵，惟大智者能破之”。这就是金生仁者之灵现，木女“患难道心生”，棺木震响，“良知”猛省，遂如金生之毅魄附体，势如飘风疾雷，直往焚烧木家的原因。木女在小说中为金生妻木氏女，即喻其心性在“金”、“木”即君子小人之间。通过木女所阐发的就是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主旨。

木媪、邻媪图解的是“小人之心”。《格定》篇云：“贪财淫色，小人之欲也……岂惟不能辨，亦不能自辨”。即说“小人”是以利欲为念，并无是非善恶之心。“以此治心，同归于灭心，以此治生，同归于乱世。”这就是木媪贪色、邻媪贪财造成害人祸己、家破人亡的原因。“道为治本，欲为乱根。世之攘攘藉藉者，皆由欲起”，所以“有欲不除，除之不尽，而欲治天下，欺天下乎！”这就是木媪、邻媪终于被县宰处以杖毙的原因。

董贵图解的是“禽兽之心”。《贞隐》篇云：“人不知道，其异于禽兽者几希矣。”“学废世衰，唯欲所恣，黷昏愤兴，不可解喻”。董贵意即“懂喷”，黷昏愤兴者也。无耻之徒。

《金生色》“异史氏曰”：

金氏子其神乎！谆嘱醮妇，抑何明也；一人不杀，而诸恨并雪，可不谓神乎！邻媪诱人妇，而反淫己妇；木媪爱女，而卒以杀女。呜呼！欲知后日因，当前作者是，报更速于来生矣。

蒲氏对“金氏子”的称叹，说穿了，不过是对“君子之心”的力量的宣扬，而以果报的图象儆戒世道人心罢了。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刘斯翰



《科学社会主义》一书特色和不足

林锦峰

孔繁锦同志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一书，已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文件的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历史和现状编写而成的。

这本书的体系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这三方面来安排撰写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概貌。本书作为一本较为系统的教科书，不仅详细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它的产生和发展，而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的理解，本书就认为，对象是认识的客体，是被反映者。任务是一种反映，是理论思维，是属观念形态的东西，具有能动性的作用。两者是不同的。前者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客观规律，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而后者则在于合乎实际地揭示和再现社会运动这一方面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并用以教育无产阶级，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武器。这种集介绍与研究于一体的写法，既通俗易懂，又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适应了不同层次的读者的要求。这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本书特色之二，是以论为主，史论结合，以

史实和现状为根据，联系我国历史经验和当前经验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读之易于上口，思之易于理解。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问题，本书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早就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当时有四季社、正义者同盟和宪章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些组织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但从其纲领、组织原则和奋斗目标上看，还不是以正确的革命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就是说缺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武装，所以，还不能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无怪乎1848年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该组织时，他们都婉然拒绝了。直到后来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才欣然参加了该盟的改组工作，把它改造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详见第三章）。又如，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本书首先以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列宁对当时对外交往的实践的总结为根据，论证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然后又论述我国总结当代国际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准则，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策略思想（详见第十章）。用这种“以论为干”，以史证论的方法来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比较具体而

不空洞抽象，使人读起来倍觉深刻。

本书的特色之三，是突出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现实之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尤其突出我党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全书除导言外，共十三章，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占五章篇幅，共七万七千多字；下篇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实际上就是讲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占八章篇幅，共十三万多字。十月革命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条件变了，地位变了，党的建设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本书第十二章专门阐述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理论。讲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必要性；阐明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提高党的素质，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发挥纪律检查机关的作用，从组织上保持和巩固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这是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关键；还着重强调必须从领导方法和领导原则上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包括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优越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矛盾转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本书都有简明扼要的阐述，并结合我国的实践经验加以说明，特别是论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遍真理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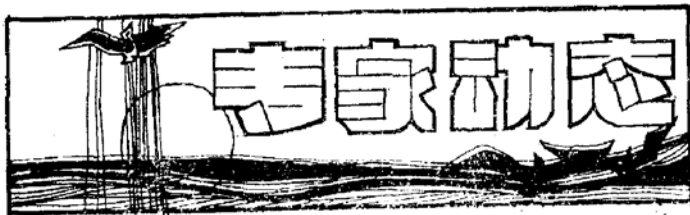
继承性、理论的创造性和对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可以看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总之，这本书指导思想明确、文体通畅、简明扼要，的确是当前青年大学生、干部和自学的朋友们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本较好的教材。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缺点。诸如，有机地、紧密地结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气势磅礴，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材料，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认真总结和概括；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有待于我们广泛收集材料，加强研究，从理论上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另外，本书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对外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方面的理论问题的阐述份量还不够多、不够突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也写得较少。在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各种“挑战”，在西方流传着“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对此，书中似乎没有进行分析批判；在国内也有所谓“信仰危机”、“共产主义渺茫”等论调，本书也没有对此展开深入剖析。这些缺陷盼能在再版时克服。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冯达才



在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刘嵘教授访问记

最近我们受省社科联和本刊编辑部的委托,特地访问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专家刘嵘教授。

刘嵘教授生于1920年5月,浙江省玉环县人,194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助教,除了1950—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外,一直都在中山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兼任过该校哲学系哲学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总支书记、系主任、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副校长等职务;退居二线后,仍担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哲学专业委员会任委员,在省社科联创办的广东社会科学大学兼任校长,在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任常务理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任顾问,在省哲学学会任常务副会长等。他长期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并已招收了四届毛泽东哲学思想硕士研究生。近十年来,他虽然担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和教学任务,但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批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略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再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毛泽东思想是科学》、《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这部专著。此外,他对中山大学哲学系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任副主编的我国高校哲学专业第一部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的问世,担负了主持、组织和团结20多所高校哲学教师的编写工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刘嵘教授在了解了我们的来意之后,点燃了一支香烟,沉思片刻,谦逊而又扼要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他首先谈了自己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思想。1979年3月他出席了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听了邓小平同志的总结报告后的小组讨论会上,他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科学并不包括错误”的观点。此后,他在为中大全校研究生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专业的研究生的讲演中,一方面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方面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科学并不包括错误”的观点,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体系。1980年6月,针对毛泽东思想包括错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他指导一位同意他的观点的研究生写出了一篇论文——《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应包含错误》,在《红旗》内部文稿上参加讨论,引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反响。1980年冬,马哲史教材会议在厦门召开,他又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要把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思想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错误违反了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新见解,并于1981年初在《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论文中阐发这个见解。上述这些观点,后来得到了哲学界同行们的充分肯定。但是在此之前,许多人反对他的观点,在大小会议上不断提出“质疑”和“商榷”。当时有一位和他要好的同志也劝他放弃自己的观点。面对社会上的巨大压力,在他处于困境之际,那时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陈越平同志却极力鼓励他坚持研究下去,“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终于坚持下来了。”刘嵘教授说到这里,消瘦的脸庞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接着,他谈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特色与体系的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和过去的哲学相比较,都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又有自己的特色。毛泽

东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伟大工具，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同时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过程中有独创性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显著特色，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这是他在《一论、再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两文中的观点。继后，刘嵘教授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的专著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新的形态。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问题，他认为“四大块”的结构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的结构，是附加于它的模式。他在1985年于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讲习班的讲演中提出了上述观点，并于1986年1月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上。他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是：1. 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2. 实事求是是对主观和客观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简明通俗而又科学的回答，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3. 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法、独立自主等等都是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获得正确思想，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刘嵘教授说：“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问题，哲学界还有争论，有待今后在实践中继续深入探讨。”

当我们问到他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过程中有何体会时，他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科学体系，又强调运用，在运用中发展，不断创新。因此，我们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时，一定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研究、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实践中的新问题。在这方面，刘嵘教授作出了很大努力，撰写了一批论文，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光辉胜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问题初探》、《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方法，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及由他主编的《现实问题的思考》一书，都是他近年来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来分析、研究现实问题的成果。他深有感触地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在现实斗争中运用。而哲学要研究、探索现实斗争

中提出的问题，就要有开拓精神，要有点勇气，要有点韧劲，才能谈得上在运用中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海增添一点水滴。”

在谈到他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体会时，刘嵘教授认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总店，是主干，他是分店，是枝叶。这个说法生动地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运用与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近年来，他提出要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以适应时代和科学发展的需要。他说，要改变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问题，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克服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单一、结构单一的僵化模式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建立不同领域的哲学的应用或应用的哲学，并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成联盟，广泛地吸收其他科学的养分，在运用中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领域中的指导作用。当然，这要经过长期的各方面的通力协作，才能做到。

最后，刘嵘教授谈到他在今后的研究项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或《当代中国建设哲学》。这是国家教委“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他接受了国家教委的委托，担任该教材的主编工作，就是想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方法），研究、探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建设新的学科。他强调指出：“研究现实问题，需要宽松的环境。但哲学工作者不能坐等宽松环境的到来，而是要去争取，要为创造这个环境而出力。学术上要创新，必然有人反对，这也是一条规律吧！我的一些观点，也经常有人反对。你说得有理，我就吸收；你说得不对，我还是坚持己见，共同探索嘛！”他不但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做，既从自己做起，也要求研究生这么做。他指导的第三届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如《论“一国两制”的构想的现实可能性》、《论生活方式的二重性质》以及《论思维方式的更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等，都是对现实斗争中提出的哲学问题，进行大胆探索的。我们还获悉，最近有关上级单位已通过他的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准备明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这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新任务。我们衷心祝愿刘嵘教授在培养专门人才、攀登新的科学高峰的征途上，继续作出新的贡献。（哲讯）



蔡馥生教授谈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

· 专家动态 ·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蔡馥生教授，是广东省揭阳县人，今年八十三高龄，但精神矍铄，仍然从事科研写作，参加省内外的学术活动。现退居二线，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

蔡老1928年毕业于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不久就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上海“一二八”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先后主编《社会生活》周刊和《正路》半月刊，编写了《计划经济》一书，介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皖南事变后，到新加坡任南侨通讯社主编，在苏门答腊任《民主日报》“新南洋”副刊编辑，积极宣传新民主主义思想。1946年与卢心远同志组织了新加坡经济学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南侨日报》和《南侨晚报》的编辑工作。1948年回到香港主编《大公报》的《经济周刊》，曾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的管理货币理论。解放后，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分区行、广东省分行的领导工作。1960年到暨南大学参加经济系的领导和教学工作，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选读、毛泽东经济思想等课程。打倒“四人帮”后，他在暨大继续担任经济系主任和经济学院院长。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认识很不一致。我们请蔡老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说：“理论界对这三种经济不仅认识很不一致，而且对它们产生先后的看法也不一致。因此要认识它们，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史和人类对自然的斗争史谈起。它们产生的次序，应该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自然经济，我指的不是传统所称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而是原始社会蒙昧时代的那种经济。那时，人类靠采集植物的果实、根茎为食物，后来使用了火和发明了弓矢，学会了打猎、捉鱼，食物扩大到飞禽走兽和鱼类。那时没有什么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的生产，完全靠自然产物来维持生活，是名副其实的自然经济。到了野蛮时代，人类学会栽种植物，驯养飞禽走兽，才开始有改变自然来为自己服务的能力，才有所谓物质的生产，即产品生产。但那时

生产力低下，生产要靠集体力量才能进行，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即人们所称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产品种类和产量逐渐增多，才有了产品交换。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产品生产和产品交换和消费的总称就是产品经济。到了野蛮时代末期，由于产品生产逐渐增多，交换频繁，又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一个商人阶级，有了商品生产，有了货币，有了商品交换，也就是说才有了商品经济。这样，人类社会便进入了所谓文明时代。”

接着，蔡馥生教授谈到商品经济和不正之风的关系问题。他说：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唯利是图的，有货币便可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切向钱看是必然的。说经济范畴和道德范畴是两码事，互不相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蔡老过去的文章，说从文明时代开始，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有一个辩证地发展的过程，我们请蔡老对此再作一点说明。蔡老说：“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个互相对立的东西。前者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与人类共长久，是永恒的；因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至于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经济范畴，它同其他历史事物一样，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什么是产品，什么是商品，马克思很早就区别得很清楚。他说一个人制造出来的东西是供自己使用，而不是通过交换供别人用的，就不是商品而是产品。照马克思的定义，传统所称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应该是产品经济。商品经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社会形态。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还处在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产品经济。到了资本主义

社会，由于科学应用于生产，商品经济飞速发展，连劳动力、名誉等都变成商品，谁有钱，谁就可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一句话，商品经济发展到最高峰，它给产品经济来一个否定。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过渡时期，有发展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的资本主义。根据列宁的判断，我国有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划出两条线，一条说明产品经济走上坡路，一条说明商品经济走下坡路；到最后，产品经济便给商品经济来一个否定的否定，人类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共同奋斗目标。一切商品万岁论的论调都是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学术界有不同的议论，蔡老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蔡老认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决定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前者从长远看问题，后者是解决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性质可作如下表述：两种公有制占绝对优势下的、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并存的计划经济。这既符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给全国人民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也符合实际。”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哪里的问题，蔡老说：“这个问题《决定》中讲得很清楚，‘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僵化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利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至于商品生产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是生产力问题，生产力提高了，产品增加了，商品率自然提高。建国以来，我们只强调政治、生产关系，忽视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力，这是事实。有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最大阻力是产品经济，提出要破除产品经济，我认为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破除不了的。因为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起来的，劳动生产力和商品率低，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但是发展商品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奋斗的目标，今天发展它是为着最后消灭它。至于产品经济，是与人类生存共长久的。马克思说过，人类不生产劳动，不要说几年，就是

几个月也要灭亡。党领导全国人民正是要争取实现物质生产极为丰富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

当前，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蔡老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以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计算价值并进行交换的。那里有商品经济，那里就有一条价值规律在起作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商品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前者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可以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后者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让市场指挥生产，任凭价值规律去摆布。”他说：“商品万岁论”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夸大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说什么价值规律是发展生产的规律，是价值规律要求等价交换，价值规律要求按比例分配劳动，价值规律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价值规律是提高经济效果的规律等等，一句话，认为社会主义价值规律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极大的优越性。好象什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都可由价值规律去代替似的。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蔡老最后说：“目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少版本，各有各的体系。我认为可按照《资本论》的体系，从抽象到具体地写。1978年暨大复办后，我组织了几位教师提出了一个大纲，要同研究生共同讨论研究。因目前大家教学任务很重，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情况变化很大，现决定再进行修改或重新写。该书除绪论分三章把社会主义经济怎样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讲清楚外，还按照《资本论》体系分三篇进行研究：第一篇社会主义资金的生产过程，主要谈怎样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加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第二篇社会主义资金的流通过程，主要谈怎样节省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劳动时间，减少原材料、燃料的消耗加速社会主义资金的循环周转；第三篇社会主义资金生产总过程，具体地分工业、农业、商业、对外贸易、金融和财政六章结合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研究。工业、农业属于生产部门，商业和对外贸易属于流通部门，金融和财政分别管理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现在我正加紧对该书进行修改和补充，争取下半年完成。”（方成）



广东社会科学界讨论精神文明建设规划问题

最近，广东省委决定要制定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规划，省社科联就此问题邀请了学术界部分同志进行座谈。座谈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科学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与会的同志一致认为，要充分认识到社会科学理论在两个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过去存在把社会科学理论当作现行政策的论证工具的现象，说明社会科学理论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还没有真正地全面地发挥出来，不少人对社会科学理论采取轻视、贬低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只凭老经验、关系网，而不凭科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许多实际的问题，搞纯理论的研究，对实际工作没有多大影响作用。上述两种倾向，都有待认真纠正。同志们指出，社会科学理论既要很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又要很好地指导两个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只有解决好服务与指导的关系，社会学理论才能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发挥其巨大的作用。有的同志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应敢于干预社会政治生活。有的同志则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只是为了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还要为政治文明的建设服务。在谈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时，同志们还联系了当前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而引起失误的许多事例，来说明没有正确的理论便没有正确的行动的科学论断。

与会的同志认为，我省理论建设规划应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要从我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我省的优势学科，大力抓好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要突出当前改革与开放问题的方法论研究。有的同志认为，正确认识广东理论建设的现状与特点，分析广东在这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优势中哪些是潜在的优势，哪些优势中包含着劣势，如何在发挥优势时注意防止劣势的出现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论建设规划符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有的同志认为，理论建设规划一要有理论学科的主要项目内容，主要项目应有短期与长期之分；二要有基本队伍的建设内容以及培养拔尖人才的具体措施与目标；三要有物力、财力的投资预算。有的同志强调理论建设规划的制订，不是一种摆设，更不是不花钱就能办到的，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投资，再好的规划也是纸上谈兵。广东经济发展比较快，完全有可能、有必要拿出相应的资金，改善本省理论研究、理论教育和理论宣传方面的各项重点设施，保证规划的顺利实现。有的同志指出，我省理论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作出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然后逐一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理论工作后继有人，繁荣兴旺。有的同志认为，社会科学上要提出一两个新观点、新见解是不容易的，既要有扎实的基础，又要有胆识，还要有容许探索的民主空气，因此要求理论建设规划要有利于学术思想的繁荣，要有许多办法激励社会科学工作者敢于创造。

（学讯）



青年学者孙中山学术讨论会论点简介

由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中山大学、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年学者孙中山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7月25日至29日在中山大学举行。收到论文79篇。会议就下列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一、关于孙中山的个人品质和政治性格问题。有的同志指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矛盾统一，构成了孙中山政治性格的重要特征。具体地说，孙中山的信仰的理想化程度愈高，其实用主义倾向也就愈广大。但其实用主义倾向的极端发展没有改变其政治性格；具体策略的错误不论多么严重，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的人格。有的同志具体分析了孙中山伟人品质所包含的政治品质、心理品质等各个方面。认为这种品质为孙中山跻于二十世纪初年时代潮流的峰巅提供了主观方面的依据。指出：与孙中山同时代的其他革命领导人或在胆略、意志、学识方面都可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然而就总体来看，却只有孙中山才真正具备充任革命领袖的最佳（相对而言）心理品质结构。有的同志指出：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孙中山个人的意志努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孙中山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有人对过去流行的资产阶级上层充当了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中下层构成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上层资本家中只有少数人倾向革命，而资产阶级中下层在当时同情或支持革命的同样也是寥若晨星。因此就整体而言，资产阶级显然是作为立宪派的阶级基础出现的。对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哪个阶层的问题也没有一致的意见。有的说“从思想上来看接近上层”；有的则认为孙中山更直接代表着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群（主要是其中的革命派）。在分析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问题时，有的同志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现实利益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众情绪等因素支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社会心理。孙中山于1911年12月自海外回到国内时，“非袁莫属”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南方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为孙中山组建临时政府提供合作的目的是要借助他

收拢南方独立各省，以便一并交给袁世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回国使中国政局又产生了某些新的变化，出现了南孙北袁两个政治中心。如果孙中山能实现统一新秩序，南方多数资产阶级还是表示欢迎的。

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把孙中山“节制资本”解释成“发展民族中、小资本，节制垄断大资本”，认为这是不符合孙中山思想的原意的。事实上，“节制资本”所要节制的正是民族中、小资本，所要大力发展的则是国家资本。对民生主义是否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问题，有些学者对两者作了比较，指出由于两者间理论的来源、思想体系的特点及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区别，不仅规定了它们各自的历史地位、发展道路和最后归宿，而且也正好说明旧民生主义“不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对于“五权宪法”，与会者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指出评判“五权宪法”思想的根本依据应是看它在反封建中是否站在同时代各种理论学说的前列。“五权宪法”是西方分权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倘若当时真正付诸实施，它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四、孙中山与国共合作。与会同志基本同意：三大政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产物，它是中国国民党接受共产党人以及苏俄、共产国际的具体帮助，于历史剧变时期积极寻找出路的重大的抉择，其中心思想是以各民族、各民主力量为革命基础的大联合思想。孙中山的新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政策”相结合，构成了完整的国际主义倾向。有的学者指出，史学家探索国共合作渊源时，不应仅仅涉及由利益、需要和情绪组成的社会心理的动态层次，还应深入到民族的传统、性格等因素组成的社会心理的稳态层次，从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的范畴，揭示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空前团结的内在根由。

五、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有的同志认为：孙中山是脱胎于近代海派文化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他不仅具有中西合璧的知识结构，而且海派文化群体的那种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在孙中

山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对孙中山的历史观，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站在时代自然科学的理论高度，通过对中国革命几十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孙文学说。这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以来一个辉煌的成果。对“知难行易”说，有的同志认为孙中山对知、行关系的解决是唯物主义的，并表现出丰富的辩证思想，尽管他的认识论“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对于“知行说”的历史作用，一种意见认为它主要是出于政治现实的目的。所以，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心理产生的影响并不象孙中山估计的那样大。另一种意见则通过对五四运动以前的国民性改造理论的探讨，指出孙中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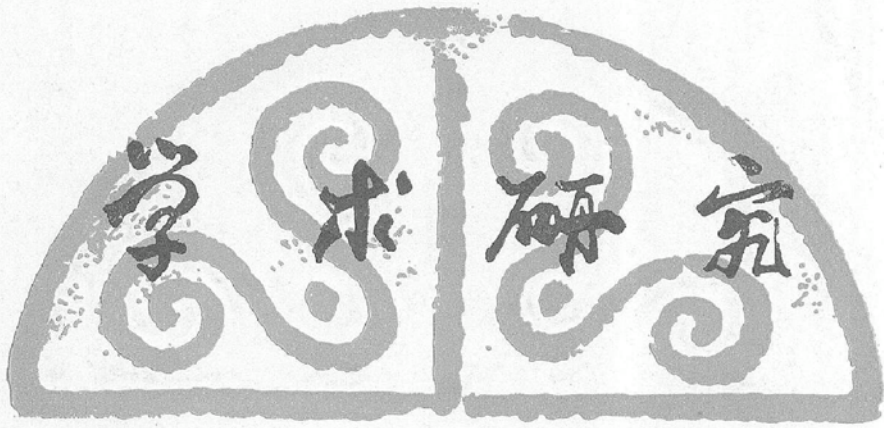
“知难行易”思想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意义，它深化了国民性问题的研究。从而在中国人自我反省的历程中达到新的认识高度。

六、孙中山的外交思想。有的同志指出，孙中山在外交方面是个实用主义者。有些同志则认为，孙中山当时没有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帝国主义是明智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并不在于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当时提出可能失败得更彻底）。作为一个政治家，有时会面临着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撞问题。在特定情况下，有时不得不牺牲前者以换取后者。妥协作为一种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

（李兰萍）





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总第七十八期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 46-64

国内定价: 每册0.50元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095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